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桥本万太郎 著
余志鸿 译

YUYAN DILI
LEIXINGX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桥本万太郎 著

余志鸿 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桥本万太郎著　余志鸿译

责任编辑：胡双宝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45千字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9209·41　　定价：1.05元

序

德·索绪尔区分共时的和历时的语言研究方法的学说，给本世纪的语言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人所共知，用不着说。消极的方面，指的是由这种学说导致的把对语言的历史研究和断代描写截然分开，看成是毫不相干的东西的倾向。叶斯泊森的巨著A Modern English Grammar，由于书名里有on historical principles而受到指责，认为描写“现代”英语而追溯“历史”是自相矛盾。汉语研究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就国外说，研究汉语的年轻一代的学者里，关心历史的比起上一代汉学家来要少得多。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

桥本先生的书冲出了这种思潮的藩篱，高瞻远瞩，一空依傍。因为站得高站得远，所以能摆脱种种障碍和约束，看到在低处近处看不到的东西。读者可以不完全同意书中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但是这部书能够帮助我们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则是毫无疑问的事。

桥本先生素以方面广、著述多为同行称道。先生方当盛年，今后肯定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我特别希望他能够

直接用中文为中国读者写书写论文 因为他的中文够好的，而中国语言学界懂日文的却实在太少，至少目前是如此。

是为序。

朱 德 熙

一九八五年初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朱德熙
汉文版前言……………………………………………………（ 1 ）
前　言……………………………………………………………（ 5 ）
第一章　语言的发展…………………………………………（ 11 ）
1.1　语言发展的研究………………………………………（ 11 ）
1.1.1　牧畜民型语言……………………………………（ 12 ）
1.1.2　农耕民型语言……………………………………（ 14 ）
1.2　基本词汇的差异………………………………………（ 22 ）
1.3　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25 ）
1.4　区域语言学和语言的波形扩散………………………（ 29 ）
1.5　区域特征和音韵对应…………………………………（ 30 ）
第二章　句法结构的推移……………………………………（ 34 ）
2.1　语言结构的连续体……………………………………（ 34 ）
2.2　句法结构的逆行和顺行………………………………（ 35 ）
2.3　南方汉语的顺行结构…………………………………（ 41 ）
2.4　“横”的推移和“纵”的演变……………………（ 44 ）
2.4.1　时·体标志的南北型……………………………（ 50 ）
2.4.2　名词短语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55 ）
2.4.3　名词短语结构的“纵”的演变…………………（ 66 ）
第三章　基本词汇的推移……………………………………（ 72 ）
3.1　“江”“河”的分布和历史…………………………（ 72 ）

3.2 否定词的区域性推移……………………………………（ 76 ）
3.3 否定词的“纵”的变化………………………………（ 82 ）
3.4 类别词的本质…………………………………………（ 85 ）
3.4.1 类别词分布的区域性推移……………………（ 91 ）
3.4.2 类别词的“纵”的变化…………………………（ 97 ）
第四章 音韵结构的推移…………………………………（ 104 ）
4.1 音节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104 ）
4.2 声调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110 ）
4.3 词素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113 ）
4.4 超语段音位的区域性推移……………………………（ 115 ）
4.4.1 音调重音音韵学…………………………………（ 116 ）
4.4.2 朝鲜语词音调的区别性特征……………………（ 117 ）
4.4.2.1 庆山方言的词音调系统……………………（ 122 ）
4.4.2.2 单音节两短音节的音调……………………（ 129 ）
4.4.2.3 朝鲜语词音调的音韵功能…………………（ 132 ）
4.4.2.3.1 构成短语的词音调派生…（ 134 ）
4.4.2.3.2 构成复合词的词音调派生（ 142 ）
4.4.3 庆尚道方言的词音调模式……………………（ 145 ）
4.4.3.1 庆西型单词音调……………………………（ 147 ）
4.4.3.2 庆东型词音调………………………………（ 151 ）
4.4.3.3 庆南型词音调………………………………（ 153 ）
4.4.4 词音调系统的变化原理…………………………（ 158 ）
4.4.4.1 庆东型和庆西型……………………………（ 158 ）
4.4.4.2 庆东型和庆南型……………………………（ 163 ）
4.4.5 朝鲜语单词音调系统的区域性推移……（ 167 ）
4.5 音高和重音………………………………………………（ 168 ）

4.6 从声调语言移向重音语言……………………（171）
4.6.1 加重重音支配的音调……………………（171）
4.6.2 声调和加重重音的相互依存……………………（177）
第五章 结 论……………………（184）
5.1 地理类型学家所说的"祖语"……………………（184）
5.1.1 词汇的同化……………………（187）
5.1.2 词汇和句法的同化……………………（189）
5.1.3 词汇、句法和音韵系统的同化……………………（197）
5.2 总结……………………（198）
主题索引……………………（205）
人名索引……………………（214）
译后记……………………（219）

第一图 日语顺行结构例……………………（37）
第二图 英语逆顺行结构例……………………（38）
第三图 英语顺行结构例……………………（38）
第四图 亚洲各语言……………………（39）
第五图 满语逆行结构例……………………（40）
第六图 临高话顺行结构例……………………（41）
第七图 顺逆行结构曲线图……………………（46）
第八图 顺逆行结构统一例……………………（49）
第九图 方言地名图……………………（62）
第十图 朝鲜语方言地名图……………………（119）
第十一图 上声词句的句式（1）……………………（176）
第十二图 上声词句的句式（2）……………………（176）

汉文版前言

作者写这本小书的意图是，阐明现代语言学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个问题，似乎只关系到历史语言学。自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倡导之后，严格区分语言的历时的和共时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近代语言学家的常识。但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回到了健康的理性主义，语言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道理：既然世界上的语言没有一个是新产生的，既然它们的结构和系统都有其历史背景，那么，各个语言共时态里所能见到的各种规律性和非规律性，应当说都是历史变化的产物。如果共时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发掘这些规律而完成对该语言最合理的结构描写的话，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个问题跟共时描写语言学直接有关，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换言之，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是它的落脚点。

为了了解语言为什么会变化，我们首先应当知道语言是怎样变化的。提出语言怎样变化这个问题，我们所要阐明的是这些变化的实际过程和机制，而不是语言结构系统变化结果的平面描写。一说到语言变化过程和机制，我们立刻会发觉，语言学家旧有的知识过分依赖印欧语发展资料了。印欧语自古以来分散到欧亚各地，很多语族各自独立地发展。但是，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东亚大

陆语言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东方文化中心地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的过程。因此，语言结构的历史变化和地域推移的对应相当整齐。作者的意图是根据东方语言发展史的事实和资料，建立新的、更为普通的语言发展理论。

本书原版印刷的时候，作者正在中亚进行野外调查，未能读到校样。书一出来，就发现有很多错字，本拟马上修改，只是一直没有时间。而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是，作者写这本书之前，没有访问过中国大陆，没有机会向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教。作为一本讨论东方语言结构发展的书，这是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欠缺。幸好，1981年秋，作者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次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之后，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教育部之间的交换协议，在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半年。两次访问期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山西省语言学会、山西省方言研究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语文学会、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兰州大学、甘肃省语言学会、兰州市语言学会、青海师范学院、青海民族学院、青海省语言学会、南宁师范学院、桂林民族师范学校等单位作过学术报告，讨论东亚各语言结构类型的各种问题，并借机就本书所述语言事实及各种问题重加讨论，同时做了可能的补充和修正，以就教于各位新老朋友。根据这些学术经历和所受的启发，北京大学中文系又提供机会，使我得以修改这本书。作者在这里对向景洁、朱德熙、叶蜚声、陆俭明诸先生以及系里其他朋友所给予的指导、关照、帮助和友谊，

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汉文本的出版，有赖于几位朋友的友谊。上海中医学院余志鸿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的时候，为翻译本书，单是跑上海图书馆，每天就要花两个小时。作者在美国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把译稿油印出来，余先生寄到西雅图一本，要作者校读。他和他的老师胡竹安先生在《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 4 期上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北大中文系胡双宝先生两读余先生的译稿，不只对行文，而且对内容也提出了很多意见，做了全面的加工。此外，北大东语系徐昌华先生校读了序言及头一章，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朱德熙先生细心审阅了译稿，并愿为写序，向中国朋友介绍本书。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国际友谊和合作的结果，与其说是译本，不如说是增订版。

友谊是可贵的，但更为可贵的是学术上严肃的切磋琢磨。因为没有互相的讨论和批评，就不会有学术上的进步。虽有这么多朋友的帮助和合作，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加以中国地大，人多，“语”博，书中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没有注意到的语言事实自然更多。所以，作者恳请读者随时提出各种意见，烦请北京大学朱德熙先生转桥本万太郎，或径寄日本国(114)东京都北区西原 4—51—21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桥本万太郎，均无任欢迎。

这本书符号繁多，款式复杂，北京大学出版社乐于出版，北京怀柔县印刷厂细心排印，作者深表谢意。

作　者

1983年 7 月13日于东京

前　言

本书所论述的，是作者1972年归居远东后，先后在朝鲜半岛(1972年)、香港(1973年)、尼泊尔(1975～76年)、苏联中亚（1976～77年）等亚洲大陆各地考察时涌现的设想，现在提供从事语言学的行家探讨；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尽量写得通俗些。

本人出生于远东，素有研究亚洲诸语言的兴趣。年轻时代在北美重新接受专业教育，后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年之后回来一看，亚洲的一切是那么新鲜，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我痛感对亚洲的无知。从这以后，不管到亚洲哪个地方，不管作何种语言的调查，每当碰到新的现象，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这些现象如果在汉语或自己的母语日语里又该怎样。作为一个亚洲的语言学者，这种想法应该是很自然的。下列文章和演讲便是我的那些不成熟的想法（以发表前后为序）：

（1）〈汉语南北方言的“体（态）”性质〉——1974年9月2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研究计划会议上宣读。

（2）〈亚洲诸语言的地理类型〉——1975年1月27日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语言学研讨会上演讲。

（3）〈汉语的历史和类型〉——1975年4月26日于

（日本）中国语学会关东支部例会（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上宣读。

（4）〈亚洲大陆语言的接触〉——1975年4月30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所内研究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第24号36页）。

（5）〈汉藏语语言结构类型多样性诸问题〉——1975年10月24日于第八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宣读（内容提要见*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3, pp.49—65）。

（6）〈语言的农耕民型扩散和畜牧民型扩散〉——1976年7月21日于第一届日美教育文化协作讨论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No.1, pp.1—14）。

（7）〈类别词本质〉——1976年8月21日于SIL（国际语言学夏季讲习会）东京讲习会（东京神学大学）上演讲。

（8）〈汉藏语中含类别词的句子的来源〉——1976年10月22日于第九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斯堪的纳维亚四国合办的亚洲研究所）上宣读（内容提要见*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7, pp.66—78）。

（9）〈亚洲大陆语言类型的推移〉——1976年10月26日于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演讲。

（10）〈东亚、东南亚的语言地理类型学〉——1976年10月29日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莫斯科）演讲。

（11）〈东干语的地理类型学特征和东干语言学的任务〉——1976年11月5日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部（伏龙芝市）演讲。

（12）"声调和重音"研究讲习会：〈关于汉语与东干语〉——1976年12月3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性研究计划主办的专题研究讲习会上演讲。

（13）〈亚洲的日语——地理类型学上的推论〉——1976年11月27日于东京都立大学方言学会第148届研究会·日本言语之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都立大学方言学会会报》第71号第1～8页）。

（14）〈语言地理类型学诸问题〉——1976年12月17日于东南亚八国合办的区域语言研究中心（新加坡）宣读。

（15）〈亚洲诸语言的地理类型学〉——1976年12月28日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讲演会（台北市）上宣读。

（16）"声调发生论"研究讲习会：〈关于汉语〉——1977年1月29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研究计划主办的专题研究讲习会上演讲。

以上都曾以公开讨论或演讲的形式，征询于大洋两边的师友同学，并承蒙给予多方面真诚中肯的意见。其中主要部分已于本书中介绍。

笔者从来不曾想把自己这样不成熟的看法汇集成书。只是由于河野六郎博士的好意，并为我创造了条件，加以弘文堂编辑部重松英树氏的热忱，才得以触力完成。如今写完一看，更感到自己是多么仰赖于师友。

"地理类型学"这一课题，最初的启示还是在学生时代

从河野博士的教诲中获得的。他说："桥本同学，如果从语言区域的角度来考虑藏语，那可真有趣！"这一下我才彻悟。他说的是这样的事实：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系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象阿尔泰语，看看它的语言地域，也的确分布在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中间。不过，为了防止误会，要特别声明，河野博士可并没有劝过我写这样的书。引述上面的话，只是表示笔者久久难忘，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说明，绝没有要河野博士为书中任何一个谬误负责的意思。笔者深恐素来在学术上严于律己的河野博士将为之蹙额。这里提到河野博士，虽然明知会给他添麻烦，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向博士致谢。

不管启示从何而来吧，把笔者终于吸引进富饶的亚洲语言学领域的是，1968年秋在新英格兰美国东部七所大学（所谓"常青籐联大"）创办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的十几位语言学界同事——其中元老包括白保罗，新手包括维廉·路易斯·巴拉德；若是没有他们同志式的鼓励和联络，我也许永远是个"性急如火的生成转换语言学者"（a fire-eating transformationalist）。我们的学会创立以来，不到几年，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组织。而今秋恰逢十周年，笔者谨以拙作表示深切的感谢。

然而，更应该对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同事和有关人员表示谢意。假如没有这个独特的研究所的推动和启发，我的这种研究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同时令人难忘的，是以往多年为我提供现场研究可能的各个机构及有关人员的帮助。

本书旨在根据亚洲语言的现象，为现代语言学开辟新的途径，并为此提供线索，揭示矛盾。读者也许会感到，以此

为宗旨的书，印欧语谈得太多了。确实如此。其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与笔者同代的人所受的北美语言学正规训练的背景；而且，既然涉及到语言研究的根本原则的讨论，那就不可能回避印欧语言学这一来自上世纪的历史产物，因为过去所谓系统的语言研究就是印欧语研究。在正文中也提及，语言地理类型学并非只适合于亚洲。不管怎么说，没有“欧洲”也就不会有“亚洲”这个概念，而且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把中亚和日本、印尼、中国等联系起来考虑。事实上，大家会注意到，作为整体的“亚洲”，至今还是个“假设”或“虚构”。在大洋两岸受过教育的我，暂时还不想谈这个“虚构”。我以为，本书至少于显示亚洲大陆在语言结构类型方面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这一点上是成功的。至于是否真的成功，当待读者判定。

在本书所展开的冗长的论述中，例外现象可以举出好些，疏忽之处也在所难免。为此，笔者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但是，不管举出怎样的例外，本书所指出的结构类型上“纵”和“横”的推移模式存在于亚洲语言中的这一事实，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规律总是有例外的。因此，只是指出几个例外并不能推进学术。假如有人要提出这个命题的对立方面，则必须先证明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因为他也负有“证明责任”。对于这样的逆命题，笔者是十分欢迎的。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的体例。为使一般读者易于入门，尽量少用记号；文字除了汉字、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外，一律用转写。汉语的方言资料，本来要用音标标记。因为在

这个讨论范围里，即使用汉字，大家也是明白的，所以就用汉字。国际音标只在记没有文字的语言的情况下才用，但也尽量用宽式。音节音调（声调）本想用五度制横竖线标调法，但考虑到印刷方便，采用五度数字表示（如55高平，35高升等），只要表示出对应关系就够了。更多的情况是，汉语用"平上去入"，台语用"ACBD"，阴、阳用a、b表示，其他语言用1、2、3等标记调类。注也省去，代之以供专家参考的文献放在括号里。只是朝鲜语重音的研究，因为历史比较新，故在卷末附一详细文献目录。① 一般读者可以不看。另外，第4章§4.1，议论到若干技术性细节，除对此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外，不妨跳过。

此外，笔者熟识的人名，不计亲疏，一律以职称或学衔相称。亲近的朋友叫某某博士等很不自然，不过也没有更妥当的方法。其他就只举出姓氏，不加特别称呼。尽管这样有些别扭，但这些细节就不予顾及了。

末了要说的是，南路方言承蒙余蔼芹博士提供了调查资料。本书的编校，蒙重松英树氏和浦辻雄次郎氏大力协助，附记于此，顺致深厚的谢意。

桥本万太郎

于横浜

1977年4月

---

① 考虑到这个文献目录对大多数汉文版读者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而且资料不易获得，所以在汉文版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据日本弘文堂版《言語类型地理论》（1978）附录查检。——作者，1983.7.

第一章　语言的发展

1.1　语言发展的研究

正如个人与家族之间有亲属关系一样，地球上的人类语言之间似乎也有谱系关系。英国杰出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偶然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在研究梵文过程中偶然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对于后来语言学的发展来说，这个偶然性的发现，既极其幸运，在某种意义上又非常不幸。

所谓幸运，是因为在琼斯当时求学的牛津大学所说的东方语，主要是古波斯语或梵语，在地理上属东方，在谱系上却属印欧语，而且是古典的印欧语；这种印欧语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最适合语言比较研究的文字及形态特征，而且在广大区域独特地扩展开来。不妨这样设想，倘若琼斯不在加尔各答当审判官，而赴任缅甸或香港的话（这决不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后来的语言学发展又将怎样呢？人类语言谱系说这个论题发端于1786年琼斯在孟加拉·亚洲协会年会上的演讲。语言谱系说只是在这个独特发展的印欧语土壤上开出来的花。因此，从世界观点来看，这是相当偶然的奇特事件。

所谓不幸，乃是人们把这一针对印欧语的议论，轻信为适用于人类语言科学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这就束缚了跟印欧语发展不相同的语言发展的研究。

客观地说，直至近代，作为近代科学的历史学，在东方还被称为“西洋史学”。因为我们出生在远东，又在那里接受教育，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来看世界历史。即使美国那样各民族聚居的“民主”国家，且不说美国历史学会这种民众性学会（在那里也有偏见，“西洋史”之外的研究，被称为“特殊”的研究），就是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这样的东部“婆罗门”（知识贵族？）学会（能否终身成为其会员是很大的问题），除美国史、“西洋史”外，竟也很少加以讨论。因此，在没有历史框框的东方，如果也有人这样看，并且把印欧语中获得成功的语言谱系研究当作唯一的方法，用以研究其他语言，我们不能不引为憾事。

相反，印欧语专家，倒认为对于不同语言的研究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梅耶便是很好的例子。既然如此，研究不同发展的语言谱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这种主张应当作为正确的观点确认下来。

1.1.1 牧畜民型语言

印欧语自远古以来各自独立发展，而分布到了广大地区：北自仰见极光的俄罗斯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斯拉夫语、日尔曼语），南到热带印度次大陆（梵语）；东起中亚沙漠地带（吐火罗语），西达靠近冰岛的爱尔兰（凯尔特语）。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大规模的区域迁移呢？我们当然得倾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意见。历史久远的采集经济时代且不去说它。主要原因应该说是有史以来说这些话的人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干燥地带放牧，必须有大片草地才能展开，不象东方靠耕种

小块土地就能生活。所以，我们把这样情况下得到发展的语言，暂名为“牧畜民型”语言。

用“牧畜民”这个名称仅仅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其概念并不超出上边表述的范围。比如在非洲，虽然某些地方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却有不同的语言发展。这不属本题的范围。但“牧畜民型”扩展到广大地区却是很明显的事实。以突厥语系为例，就西从安纳托利亚起(土耳其语)，东至新疆(维吾尔语)，北面推延到极北的雅库特(雅库特语)。当然印欧语的祖先来自何方尚属未知，也许是来自高加索附近或南俄吧。不管怎样，只要有了可资比较的在广大区域中互无接触地(日尔曼人知道印度人的存在，大概是几千年后的事)独立发展起来的古代语言资料，构拟祖语自然能够获得成功。

然而，印欧语比起别的语系来，其语言资料的年代古老得无法比拟。从事别的语系研究的学者，觉得颇不公平。比方打开梅耶的《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e'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eernes*. 8th edition. Paris：Hachette. 1937. Reprint：Alabama Linguistic and Philological series,3.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labama*, 1964.)，提供的都是梵语（吠陀梵语从公元前1200年到800年左右）或阿吠陀（Avestan）语、古希腊语、赫梯语等，全属公元前几世纪的资料。至于象先调查伊尔·特·法兰西方言（法语）、库尔斯克·奥勒尔方言（俄语），然后与现代法语、现代俄语比较，一步一步追溯祖语这样不折不扣的比较研究，竟一个也没有。印欧语比较语言学里偶尔也引用现代语材料（如立陶宛语），但那只是作为重音资料，或作为显示古代实词屈折形式的细微痕迹罢了，仅此而已。我们

如果从现代法语、现代俄语出发，印欧语比较语言学自身能否成立，也很值得怀疑。

不妨分别取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基本词汇3000个来构拟祖语（笔者自己就曾试过）。凭这样一些资料不要说拉丁语，就是连俗拉丁语也构拟不出来。例如已知拉丁语diēs（日）的形容词派生形是diurnus，意大利语的giorno看样子很象是它的后裔；可就是这个普通的例子也无法跟diurnus系统地对应。可见从现代语出发，那实在太死心眼儿了。要是读一下象雅可夫·马尔克尔教授的《罗曼语言学发展的模式》（"The pattren of progress in Romance linguistics", *Romance Philology*, 5, 1952, pp.278-295）一文中那样坦率的奉告，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顺便提一下，该文很值得比较语言学家，特别是年轻人一读）。穆来·爱梅诺博士《比较语言学里的扩散和进化》（"Diffusion and 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dia and Historical Grammar*. Annamalainagar: Annamalai University, 1959, p.1）一书的开头就引述了该文。

1.1.2 农耕民型语言

亚洲大陆，尤其是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非常不同。东亚文明的策源地是在黄河流域，还是在最近着手发掘的东南亚，这个问题且搁置一边。总之以某个文明发源地为中心（我们暂且认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非常缓慢地同化周围的少数民族该是没有疑问的。语言也通过同一方式发展起来。那么，其原始语言该是什么模样呢？好象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不大清楚的。比如如果从正面提出问题，问汉民族是什么，

那是不容易简单回答的。大致清楚的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光景，从西北方来到“中原”的周族，以某种方式起着形成汉民族的决定作用。而后经过数百年，同化了东“齐”、东南“吴”、南“越”、西南“楚”这些“蛮”族，——融成所谓“汉”族。至于汉语，又在与北方阿尔泰语、尤其是统称“北狄”的语言接触过程中，发生相当激烈的变动，不过那是后话。总之，我们在这里把这种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而发展的方式，称为“农耕民型”。这个名称同样是暂用的，重点并不在农耕上面。当然，同样是农耕，如有不施肥的所谓刀耕火种，他们每年移动耕地。如此经过上百年，村落的居民就不得不移住他乡。例如印度尼西亚有几千个岛，据人类学报道，那里竟一个处女林也不剩。人们设想，这是因为大陆东南迁来的农民刀耕火种踏遍全部岛屿所致。使用南岛语系各语言的人遍及别的民族无法想象的广大区域：西从印度洋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东至波利尼西亚的夏威夷群岛，南起美拉尼西亚，北达台湾（也许可延伸到朝鲜半岛南端的伽倻）。就当时航海技术的能力讲，那是难以想象的。这恐怕也与上述情形有关。如果排除上述所指那种急速扩展而各自孤立发展起来的语言，那么，农耕民型语言由于被其中心语言的同化和不断借用，要想阐明这种同化的组合过程，采取印欧语用过的方法，即根据比较法来构拟祖语则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说明困难的程度，且举一个实例。在印欧语同源词中，再没有比数词更稳定的了。为此，以谱系说为基础的研究习惯上先从调查数词着手。可是在东亚，则完全相反，再没有比数词更为浮动了。比如现代日语计抽象的数只用汉语的词：

ichi（一） ni（二） san（三）

但计年龄时，往往有日本原语的残余：

hatachi（二十岁） misoji（三十岁）

此外，在标准日语中，数具体事物时从hitotsu（1）开始，futatsu（2）、mittsu（3）……直到10，采用原语数词。但一到十一以上，就突然借用汉语的数词体系。这不仅是日本，也是整个东亚的现象。在越南语中：

môt（1），hai（2），ba（3），bôn（4），năm（5），sáu（6），bây（7），tám（8），chín（9），mu'ò'i（10），

mu'ô'i môt（11），mu'ò'i hai（12）……

hai mu'ó'i（20），hai mu'ó'i môt（21）……

从1开始，数10,000就转用汉语：môt vạn(万)。朝鲜语中：

ha-na（1），dul（2），ses（3），nes（4），da-seos（5），yeo-seos(6)，ii-gob(7)，yeo-deolb（8），a-hob（9），yeol（10），

yeol ha-na（11），yeol dul（12）……

seu-mul（20），seu-mul ha-na（21）……

从1开始，数到100就脱离了母语，而用汉语借词baeg（百）。泰语的数词变动更快了，nùŋ（1）以后立即进入汉语的计数体系：

sɔ̌ɔŋ（2），sǎam（3），sìi（4），hâa（5），hok（6），cèt（7），pɛɛt（8），kâaw（9），sìp（10）

整个情况如下：

越南语——9,999为止
朝鲜语—— 99为止（湘西苗语似有同样系统）
日本语—— 10为止
泰 语—— 1为止

就是能用母语数到9,999的越南语里，也渗透着许多汉语成分。34以上的4，都是汉语的借词。至于序数词，无论1还是4都用汉语。仅剩1的泰语，共1也仅仅保留在10以下，11的1或21的1，也都采用汉语。

也许有人会问，数词这样的基本词汇，在东亚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其实，这样问问题本身就是受了印欧语深刻影响才产生的。应该说印欧语的情况倒是特殊的。杰拉尔·狄福乐博士对此有令人感兴趣的经验。在他所研究的南亚语的中印半岛，各部落中有的还保留着原始共产制的经济。据说这些部族因为是原始共产制，所以通常很少有机会用数词算钱，只有在与外来商人进行商品交换时才用到数词。可以认为，这样的部族最容易接受外来的数词。按照这一说法，形成操印欧语的人的经济核心既然是古地中海的通商，所以印欧语中数词比亲属名词稳定。这个道理很简单，并非因为它是什么“基本词汇”，而是为了维持这个地中海通商圈，这种稳定正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尽管说数词比亲属名词稳定，而印欧语中诸如梵语或吐火罗语、立陶宛语这类“边缘”语言，来历不明、词根不同的词往往就表现在数词之中的理由也就清楚了。罗杰瑞博士因此建议说，把“牧畜民型”改作“通商民型”或许更妥当。

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在牧畜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里各不相同。在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苏联学者对这个问题

原书缺页

单　词	俄　语	意大利语	威尔斯语	德　语	英　语
眼	glaz	occhio	llygad	Auge	eye
膝	koleno	ginocchio	glin	knie	knee
颈	šeja	collo	gwddf	hals	neck

言），也发现至少存在"眼"和"目"，"膊"和"膝"及"骹"，"脖"和"颈"及"頷"等南北两支或三支：

单词	北方语	吴　语	闽　语	客家语	粤　语
眼	2a jan-tʃiŋ （眼睛）	3b　la ŋe-tsin （眼睛）	4b　la bak(tsiu) （目睭）	4a　la muk-tsu （目珠）	2b ŋan （眼）
膝	1b　3　4a po-laŋ-kar （膊楞盖儿）	1b　1b siʔ-mø-dy （膝馒头）	1a　1b　1a k'a-t'au-u （骹头污）	4a　1b ts'it-t'eu （膝头）	4a　1b　1a ʃat-t'ɐu-ko （膝头哥）
颈	1b po-tsi （脖子）	1b　2a dy-tʃin （头颈）	3b　2a am-kun （頷管）	2a　1a kiaŋ-kiun （颈筋）	2a keŋ （颈）

因此，我很赞赏列宁格勒专家们极有启示的主张，但是想用两变数来规定词汇特征的方法，运用于人类语言而求什么普遍类型，岂不是又回到本文所提出的语言发展两大类型上了吗？斯拉夫语不就是印欧语中最具有农耕民型特征的吗？

莫斯科语言学家们所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农耕民型语言与牧畜民型语言不同，它需要首先假设本来就有着各种各

样的不同语言。各种语言后来被同化为一种语言。也就是说，首先承认这样的假设，才能开始探索农耕民型语言发展的历史。米哈伊尔·索弗洛诺夫博士和刘克甫教授认为，阐明这种多样性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然而我们觉得，现代语言科学的探索要达到这一步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就如同生物学，已经摸清了下自超微生物上至高等动物的各种生物的构造和机能，可是一旦问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构造和机能，现代科学顿时就无能为力，从而成了高度哲理性的议论。象奥托·叶斯泊森和叶甫根尼·波里万诺夫那样在这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语言学家虽然不少，但是论述的出发点，也仅在于探求所谓"世代交替"这种浅近的现象。当语言学家描写从古英语经过中世纪英语到现代英语（或从古日语〔奈良时代日语〕经过中世纪日语〔室町时代日语〕到近代日语〔江户时代日语〕）时，他们理论上假定什么等质的原始体，从而把语言史看成是一条直线的发展。笔者虽然早就批判地指出，语言史的此等描写纯属虚构。但是认识到上古汉语（周代的语言，即古中原地区的民谣语，1122—770B.C.）和中古汉语（隋代的语言，即《切韵》时代的标准书面语，589—618A.D.）之间存在比时代差别更大的区域差别、性质差别，则是最近几年的事（例如张琨〈中古汉语语音和切韵〉，《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74年7月〉，第61—82页）。就是说，迄今为止，幻想从七世纪到十二世纪左右的古英语、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左右的中世纪英语，"纵"向寻找随着时代变异的变异体，实际上正是从西撒克逊语到受米德兰特方言影响的伦敦方言，即"横"向寻找的东西。但英国在中世纪有挪威人的入侵，因而其语

言显著地斯堪的纳维亚化了；接着有诺曼人的征服，这对英语最后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这些外因，英语的演变已经不一定完全是“横”的变异了。当然即使寻找方向偏“斜”，至少也绝不至于寻到“纵”的方向去。至于梵语、凯尔特语、斯拉夫语以及罗曼语等印欧语变体，后面还要论及。处理这些少说也有二三千年历史的语言时，如圣经那样，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首先有语言”；即我们必须有“首先有各种语言”这个前提，才能正确地了解后世变化的机制。

另外，关于丧失自己语言的数词的问题，也许有人认为，那是因为未开化社会文化低下的种族的语言不怎么计大的数，所以本来就没有大的数词。我们虽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点，但据目前所知，我们觉得这是错误的认识。中国的纳西族，身居云南深山，地处偏僻的长江源头。他们既不畜牧，也不发生大规模通商，而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一直数到99,999,999，只是到“亿”或“兆”，才借用汉语。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语。日语曾经也有momo（百）、chi（千）、yorozu（万）这类固有数词。从yorozu主要用以表示多数看，一万便是最大的数。虽说比不上纳西族，但毕竟还是有过远远大于11的数词。这种丧失自己语言词汇的情况，在各种语言里都能看到。由于尽人皆知的诺曼人的征服，造成了古英语大量词汇的永久丧失。英语的许多词，至今无法复原。罗马尼亚语也由于斯拉夫语的包围，失去了相当数量的罗曼语系基本词汇。如今不管“平原”（法语plaine，现代英语plain）还是“山谷”（法语vallée，现代英语valley）、“湖泊”（法语lac，现代英语lake），都被诺曼

语同化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古英语时代，没有过“平原”（emnet）、“山谷”（dœl）、“湖泊”（mere）等自己固有的词汇。

1.2 基本词汇的差异

语言一旦取得上述意义的牧畜民型发展和农耕民型发展，将出现怎样的事实呢？农耕民型语言，由于原先并不相同的语言逐渐被文明中心地的语言同化，因此在词汇中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抽象词汇、文化词汇都能看出它们的一致性，而被认为不易变化的亲属关系、人体名称等方面的基本词汇反倒存在差异。这里的“奇妙”打了引号，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与印欧语相对立的。

且以农耕民型语言的典型——在东亚大陆所说的语言——至今被称为汉语的五大“方言”（这是极易误解的名称）为例：

（1）北京方言为代表的“北方语”

（2）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吴语”（也可能包括湖南的湘语）

（3）厦门方言为代表的“闽语”

（4）梅县方言为代表的“客家语”（包括江西的赣语）

（5）广州方言为代表的“粤语”

因为这些语言太汉化了，所以至今一直被看作汉语的“方言”。当然这也并非毫无根据。比如“大”这个某种意义上表示抽象概念的词，“铁”这个与广义的文明有关的词，它们显示出如下完善的对应（从而构成所谓同源词）：

单词	北方语	吴　语	闽　语	客家语	粤　语
大	3 ta	3b dəu	3b tua	3 t'ai	3b ta:i
铁	2a(<4a) t'ie	4a t'iɪʔ	4a t'iʔ	4a t'iet	4a t'i:t

反之，如"母亲"、"羽毛"、"缝（动词）"、"吸（动词）"之类表示亲属关系、动物身体、人体动作等收载人莫里斯·斯瓦德什基本词汇表里的词汇，在各方言里几乎可以说完全不同：

单词	北方语	吴　语	闽　语	客家语	粤　语
母亲	2a mu-ts'in	1b nian	3b 2a lau-bu	1a 2b oi-vi	2b 2a lou-mu
羽毛	1a liŋ-tsi	3b jy-ma	1a mŋ	1a mo	3a ts'i
缝	1b fəŋ	1b von	3b t'i	1b lioŋ	1b ly:n
吸	1a(<4a) ɕi	4a haʔ	4a soʔ	4a ts'ot	4a k'a:p

印欧语的情况很不一样。印欧语中的"大"或"铁"太杂乱了，以致同系的各语言几乎找不出同源词：

单词	意大利语	威尔斯语	俄罗斯语	德 语	英 语
大	grande	mawr	boljšoj	gross	large
铁	ferro	haearn	železo	eisen	iron

相反，“母亲”、“羽毛”、“缝（动词）”、“吸（动词）”，却真够整齐的：

单词	意大利语	威尔斯语	俄罗斯语	德 语	英 语
母亲	madre	mam	matj	Mutter	mother
羽毛	penna	pluen	pero	Feder	feather
缝	cucire	gwnīo	šitj	siuwen	sew
吸	sugere	sugno	sosatj	sangen	suck

基于如此惊人的同源对应，我们几乎能够确定这些词的祖形：

母：*māter-　　缝：*sjū-

羽：*pet-　　吸：*seu-

由此可知，语言发展类型的差别，对于谱系说具有何等重大的关系！——显然，用印欧语比较法来研究农耕民型的语言谱系就非常困难。为了作公正的比较，上面分别就东亚大陆的语言和印欧语的各现代语举了实例。而事实上印欧语还有丰富的公元前几世纪的古语资料。前面说过，印欧语能够构拟祖语并不奇怪，根据的就是这些事实。

1.3 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人类语言的发展，有牧畜民型，也有前述意义的农耕民型或定居农民型。这一认识往往使我们联想到战前遗留下来的有关社会经济史的争论。奴隶制经济的古代，封建农业经济的中世纪，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近代——这一人类社会经济史的时代划分，也许是一个以印欧语民族为主体创造的典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然而，这毕竟只是生活在西欧干燥地区、以无穷精力广泛从事遗商的一群人所创造的历史；从世界范围来看，只不过是部分人的、局部的历史。把这种发展模式、时代划分迷信为全人类社会制度的普遍道路，而把不适合这个框框的东方社会制度、生产方式视为异端，称之为“东方的停滞”或“东方生产方式”。然而，这种观点本身就宣告了西欧社会经济方式的发展并不是全人类的、普遍的。用西欧这把区域性的尺度来衡量东方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的发展，犹如用英尺、英寸来测量用市尺、市寸建造的房子。这样做固然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它可以了解不同地区的人设计的不同的度量单位与人的平均体格有关。在这一意义上也是很有趣的。但如果老是这么研究下去，那就不能不令人遗憾了。

在语言的谱系研究上也有相似之处。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的巨匠们，一开始就认为印欧语属于同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是如何“证明”。在这一点上他们煞费苦心。印欧语在词（严格地说是形素）的语音结构和形态变化（屈折、派生等）方面的特征，为比较法提供了成功的可

能。自从梅耶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法》（*La méthode compar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Instituttet for Sammenlignende Kulturforskning, Serie A: Forflesninger Ⅱ. Oslo: H. Aschehoug and Co. 1925）中引用古阿尔明尼亚语数词 2 与其他印欧语的对应关系以来，各比较语言学家都把它作为说明音韵对应与词形外表相似无关的好例子。看一看下面的对应：

古阿尔明尼亚语	梵　语	希腊语	拉丁语
erku	d(u)vā	dyo	duo

我们就会觉得“音韵对应”的发现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象梅耶做过的那样，把其他数词也排列起来；这些语言将全面地显出毫无疑义的类似：

单词	阿尔明尼亚语	梵　语	希腊语	拉丁语
3	erak'	tráygaḥ	trēs	trēs
4	cork'	catvāraḥ	tēttares	quattuor
5	hing	páñca	pênte	quinque
6	vec̣	ṣáṭ	heks	sex
7	ewt'n	saptá	heptá	septem
8	ut'n	áṣṭā(áṣṭāv)	óktō	octo
9	inn	náva	ennéa	nouem
10	tasn	báça	déka	decem

然后再看看下列词的对应：

单词	阿尔明尼亚语	梵 语	希腊语	拉丁语
2	erk-u	d(u)vā	d(u)va	dvó
恐惧	erk-iwɫ	dviṣ(憎恶)	dvaēšah	déos
长	erk-ar	dīrga	darəga	dwārón

可见印欧语“音韵对应”的实现不一定太难，至少不象汉藏语那么困难。我们不妨把中古汉语（构拟音）和古藏语的数词，从1到10也同样加以对照，来看看汉藏语里的“音韵对应”。

单词	中古汉语 高本汉拟音	中古汉语 桥本拟音	古藏语
1	ʔjĭĕt	ʔĭɛd	gčig
2	ńźi	ɲiɛĭ	gɲis
3	sam	sam	gsum
4	si	sĭɛĭ	bʒi
5	ŋuo	ŋo	lŋa
6	lĭuk	lĭạd	bdun
7	ts'ĭĕt	ts'ĭɛd	drug
8	pạt	prʌd	brgyad
9	kjĭə̯u	kĭu	dgu
10	źĭəp	ʒĭɛb	bču

我们可以说，汉藏语对应规则的发现，即使不比上述印欧语音韵对应的发现更难，总不至于太容易吧。这是为什么呢？由于藏语中d和l那样的前缀，在形态上的机能还不十分清楚，说不定永远是个谜。这是因为藏语里还没发现或根本就没有象印欧语那样有条理的复杂的词形变化。这一点在此不能细说，但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它们在音位配列（phonotactics）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汉藏诸语言中词形变化的条件，往往不象印欧语那样由单音决定，而是由几个单音构成的音节来决定。

然而，这里并不想把牧畜民型和农耕民型的对立说成是西方和东方的差异。因为有的语言，即使属于印欧语，却没有经历牧畜民型的发展。比如罗曼诸语言由于相互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发展起来，故不能象独立发展起来的梵语或古希腊语那样，通过比较法来系统地构拟祖语。另一方面，就是在东亚也往往有独立发展的语言。比如客家语，因为它在近年的迁徙中扩展为东起台湾、西至云南、北由山西发祥地、南到广东广大区域，并且互相不大接触地独立发展，所以通过比较不仅能构拟其祖语的词形和调类（Kevin A. O'Connor: "Proto-Hakk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11, 1976, pp. 1—64）；而且如果顺着区域变异的痕迹推断，甚至还能构拟出实际调值（*The Hakka Dialect——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Princeton-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410—435）。这样的语言，虽然分布在东方，但可以用比较法来构拟，不失为典型的语言。因此，我们所说的牧

畜民型和农耕民型这一人类语言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仅仅根据西洋习惯、东洋风格用二分法来规定的风土产物。

现代语言学家尚未扬弃的、以奥古斯特·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谱系树”说和约翰内斯·施密特开创的“波形扩散”说的对立，就起源于这一点。我们知道，人类语言确实存在“谱系”发展的一面，因此，语言的谱系或亲属关系便成为我们所关心的目标。然而，我们也知道，人类语言确实存在“波形”扩散的另一面，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为了把这相互矛盾的两个侧面统一加以阐述，而提出作为理论出发点的，便是语言的牧畜民型发展和农耕民型发展的观点。

1.4 区域语言学和语言的波形扩散

关于“谱系树”说，后面还要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为议论方便，在此先简单讨论一下“波形扩散”说。

处理语言发展这一侧面的科学，以“区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的形式发展了起来。穆来·爱梅诺《作为语言区域的印度》（“India as a linguistic area”，*Language*, vol.XXXII,No.1, 1956, pp.3—16）是战后这个领域的先驱著作。区域语言学所关心的，是在某区域之中超越语言差别的所谓语言特征的“扩散”（diffusion）。它是与所谓“演变”（evolution）相对立的概念。爱梅诺本人也超越了弗朗士·博厄斯和爱德华·萨皮尔，他以印度次大陆语言为实证，阐明这种“扩散”并不局限于语音和单词的范围，而且包括形态特征一直到部分句法。然而他欠缺的正是这样的观点：随着各语言的全部结构的地理推移，去

深入寻求结构原理，以此来一面阐明各语言结构发展的“机制”，一面阐明区域语言学所说的“扩散”实际上并不是要素的传播，而可以看作谱系树上伸展的“枝干”。我们主张语言发展上存在着农耕民型的模式，即本文要讨论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就是牢固地立足于这种观点的分析。

区域语言学看不到这一点。但这不是爱梅诺的责任，而是由于印度次大陆未必能提供足够丰富的语言材料来让语言学家们创立这个观点。能够验证这一设想的，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区域广阔，北接阿尔泰诸语、南交南亚诸语的汉藏语的东亚大陆。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了。

1.5 区域特征和音韵对应

必须提一提与区域语言学相关连的“区域特征”（area features）。比如到亚洲大陆的东南部，发现汉语（粤语或客家话）、台语（傣仂语或掸语）和临高话等不同语言里，否定词都有完全相同的成音节鼻音［m］。一般人可能说，这不就是“区域特征”吗？非洲语言中也有。区域一接近，没有谱系关系的班图语（加菲尔·索托语族）和柯伊散语（布须曼语或霍屯督语）里，就能听到相同的吸气音（所谓“搭嘴音”）。这也可算是“区域特征”的典型。

但是，“区域特征”这个术语有点危险。遇上这种现象，追问它是怎么产生的，阐明它们的内在机制，本来应该是语言学的任务。可是有了这个术语，往往满足于把这些现象看做“区域特征”就完了。这不是反而束缚了探索者的手脚吗？正是因为这个理由，笔者曾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提议

废止“区域特征”这个术语。詹姆士·马蒂索夫教授也说，确实存在容易把它理解成象“气候”或“风土”这样地区特征的危险。废止这一术语的目的也就在此。

比如日语，方言众多，但不管在哪种方言里，破裂音（闭塞音）间的发音方法的主要不同点是清浊的对立：

p(‘)a：ba，　t(‘)a：da，　k(‘)a：ga

各个方言中远清浊的分别不一定整齐。例如单词“驿（车站）”，东京念[eki]，东北部念[jegi]。不过各方言里的音位对立关系并不改变。当然，日语的清破裂音和俄语、法语的不同。因为日语是稍带送气的送气音，所以可能根据情况把［pa］和［ba］的对立，解释为音韵学上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对立；或者因为浊塞音的闭塞非常弱，故而也可能把它们看作是紧音（tense）和松音（lax）的对立。这些音位学上的解释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不管音韵学上的解释如何变化，日语闭塞音间存在的一定是二项对立。不过，同一日语方言里，如琉球方言（冲绳方言）最西南的与那国方言里，就存在清不送气：清送气：浊音三项对立。例如：

[ta]（舌）：[t‘a]（田）：[da]（家）

[ti]（月）：[t‘i]（手）：[di]（字）

这在中国大陆实在是只能在与冲绳邻近的方言里才看得到的现象，严格地说是长江下游的吴语和中游的湘语（吴语和湘语曾经明显地构成同一个方言地区，很可能后来在客家南下时从中间分割开了）里存在的。跟与那国岛紧邻的闽语，在语音上也有三项对立，但其性质有点不一样。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跟日语接近的朝鲜语——其中最靠近日本的半岛东南部方言（严格说，是庆

尚道方言及其邻近地区的极少数方言）里，有日语式的重音系统。确切地说，不仅庆尚道方言，半岛东北部的咸镜道方言也有相同的重音系统。最近罗伯特·拉姆塞教授调查了这些方言，证明咸镜方言不止有重音系统，而且发现它的系统具有古代类型，接近于中期朝鲜语（〈咸镜庆尚两方言cui aeg-sen-teu研究〉，《国语学》第二辑，1972年，第105—132页）。不过，咸镜道的居民是在李朝时代有计划地从庆尚道移居去的，历史记载清晰无疑。移民的语言比“本土”语言更有保留古代类型的倾向，只要比较一下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美国洛杉矶日语和标准日语，马上就会明白。

上面指出与那国方言破裂音三项的对立和庆尚道方言日语式重音系统的存在，善于处理牧畜民型语言的语言学家对这类事实的反应是一致肯定。例如塞缪尔·马丁教授就亲口说，不仅与那国方言和包含古代语的日本内地方言之间的音韵对应十分清楚，而且简直连内地方言到与那国方言的变化的各阶段也都可以摸索得到。举/sita/“舌”为例，它的第一个音节在东京方言也已成了清化[ʃi̥]的[ʃi̥ta]；在靠近与那国的八重山方言里，成了[s]的持续音[s̩ta]。于是，与那国的[ta]，当然可以认为不过是辅音群的同化罢了（s̩ta＞tta＞ta）。但处理农耕民型语言发展的人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况，能处理语言发展“怎么样”，却不能搞清“为什么这样”这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即使能描写事实，也不去关心科学上必须提问的“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想一想：为什么在为数众多的日语方言中，只在最西南面有和[t'a]（田）相区别的[ta]（舌）呢？甚至对明知处于中间过渡形态的[s̩ta]也不问个“为什么”。到这种地步，我们不得不重新

探讨牧畜民型语言中所谓的“音韵对应”究竟是什么呢。

“音韵对应”的发现，在语言科学方面只不过是语言事实的整理和分类。作为人类知识劳动的产物，是相当低级的。它只是研究的起点，绝不是终点。如果把它作为终点，那么语言学将变得多么浅薄！尤其是印欧语这种结构的语言，发现音韵对应并不十分困难。更何况有关古代印欧语的工作，除吐火罗语或赫梯语在本世纪才被发掘或解释以外，大部分都已在上一世纪就完成了。

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这里补充一句。上述关于琉球方言辅音三项对立的论题，本人早在1966年春、夏学期，于夏威夷大学任教时就进行过了。

第二章　句法结构的推移

2.1　语言结构的连续体

亚洲大陆各语言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突破了上世纪所谓的“语系”差异，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连续体(continuum)。这不仅在普通区域语言学关心的词汇或形态特征要素的片断上看得到，而且在句法或词汇结构、语音系统等语言总貌上也能看到。上世纪的类型学家因受牧畜民型语言的束缚，所忽略的正是这一点。虽然面对丰富的天然语言资料，但是上世纪对亚洲大陆语言的分类，多半只着眼于有无音节音调（声调），词是孤立型还是粘着型等等，而没有能超越半区域学·半类型学性的分类，也正是因为没有注重这一点。

人类语言显示出区域上的类似性，这一事实毫不足怪。如果从瑞典，经挪威、丹麦、荷兰、德意志，到瑞士北部，或从法国、西班牙，到葡萄牙去旅行，实地听一听当地人的话，即使不是专家也会切实感觉到这点。赵元任博士说过，如要考察语言伴随地域变化，从上海逆长江而上，经南京、汉口、沙市，到重庆，会体验到从低地德语区(Plättdeutsch)到高地德语区（Hochdeutsch）的变迁（*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33）。然而这些随着地理变迁的语言，确实属于日尔曼语或罗曼语的同族语，或下位语族里

的变体。但是，在区域和人口远远超过欧洲的范围（注意，仅仅中国就比整个欧洲还大）里，从语言结构的全貌上检验类型特征的区域性变异的过程和原理，把它与共时性变异统一加以处理，这样的研究，迄今为止，无论是历史语言学家还是区域语言学家，也无论是方言地理学家还是所谓汉学家，都从来没有尝试过。

2.2 句法结构的逆行和顺行

在人类语言的句法里发现"层次"结构的特性，引起了语言学家的关注。这是由于五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心理学家注意到人类心理能力之一是在瞬间记忆（spot memory）方面存在一定的"广度"。因为那个时代信息处理技术有了快速进步，通信理论和通信工程学也随之发展起来。这当然有信息处理机械技术上的实际需要。

且举一个解析人类语言结构的例子。人类语言表面上是一系列排列的语言要素。一个词由于一系列排列的音位而成立；一个句子由于一系列排列的词素而成立。因为这些要素都是按系列排列着的，我们如果让一个自动监控机解析一个句子的结构，并让它了解这个句子的内容，这个机械不得不先寻找这个语言的"层次"结构。它把这按系列排列着的词素（如词），一个一个"读"下去时，如果其"层次"整个是向左分枝的逆行结构（regressive structure），这样机械每走到一个"节"上，便不得不"贮藏"这个"节"上的信息。这种"贮藏"能力本来有限，所以这样的人类语言结构长度也应该有一定限制。相反，如果

是向右分枝的顺行结构（progressive structure），那么自动监控机不需要贮藏“节”上的信息（正如人脑能利用瞬间记忆一样），机械也就不受限制地继续这样的了解活动。这样的人类语言结构便也能不受限制地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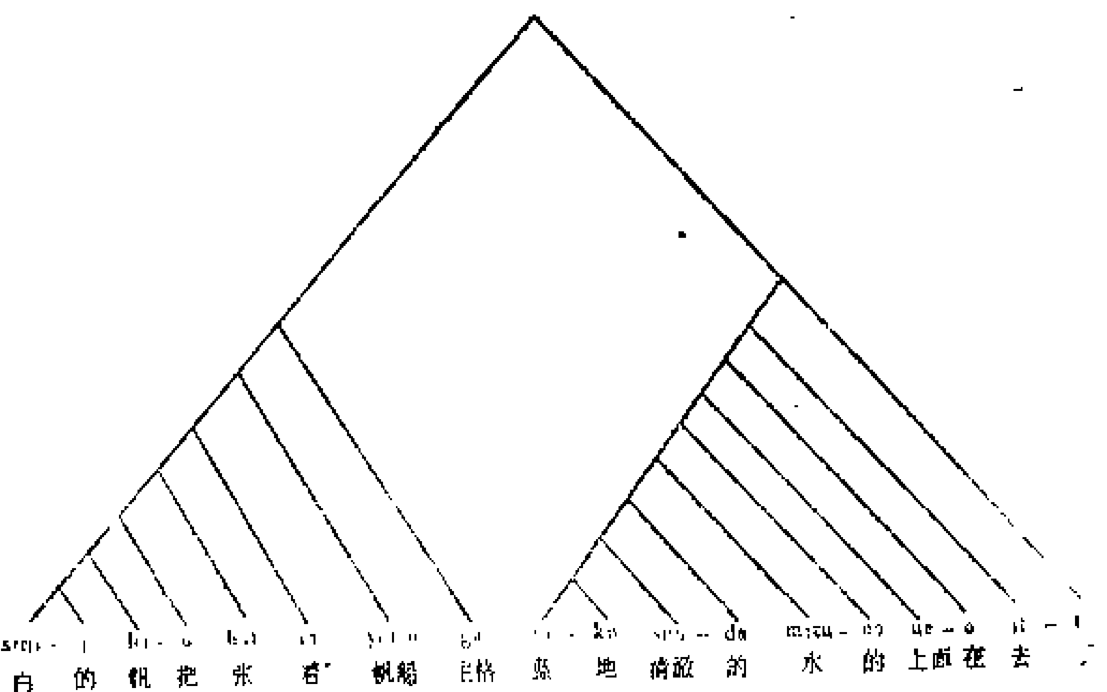
关于这种自动监控机的动作方式和理解语言时人的心理、生理活动形式及特性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情况还不清楚。但是，在某种自然语言的各种结构里，某些部分是顺行结构的话，其他部分也常常是顺行结构；同样，某些部分是逆行结构的话，其他部分也常常是逆行结构——至少这种统一的趋向是可以确认的。即使找出一个语言有两种结构相混的反常例子，多数也能以历史的、区域的推移过程中产生的过渡现象加以解释。

下边第 1 图是日语的例子。日语是典型的逆行结构语言，一个句子的左半和右半都是向左分枝。英语的情形不同。第 2 图是英语句式，左半是向左分枝，右半是向右分枝，可以看出逆行结构和顺行结构是如何混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把表层结构加以整理，抽象出英语名词短语的底层结构，就可以得出众所周知的公式：

NP = DET + 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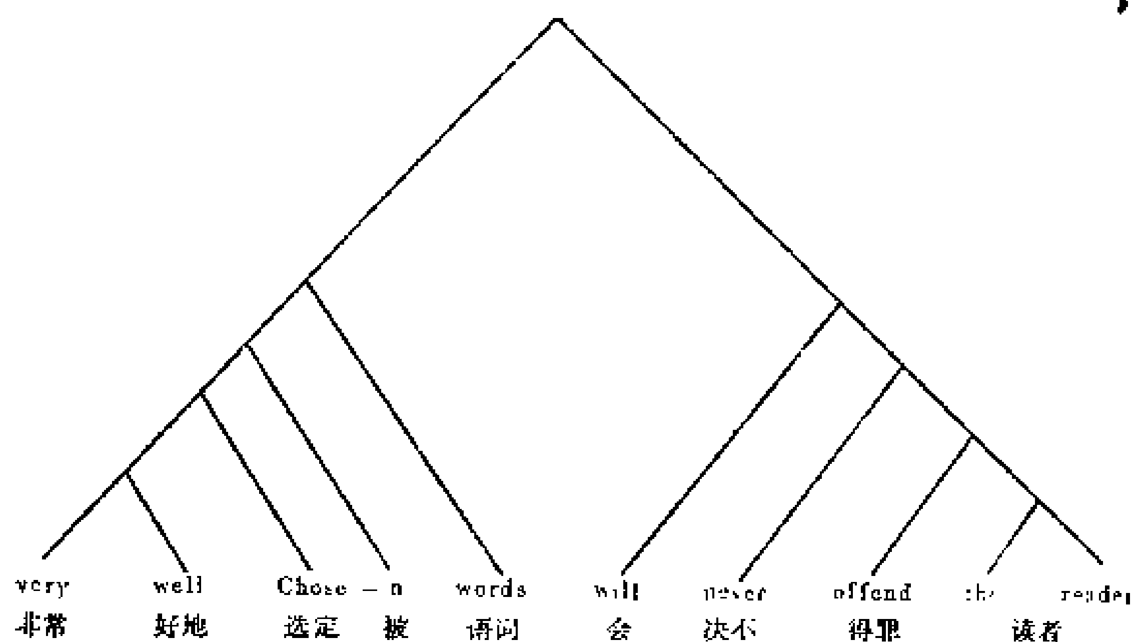
（NP = 名词短语　　DET = 限定词
N = 名词　　S = 句子）

那么第 2 图里的逆行结构部分rery（非常）well（好地）chosen（被选定的）words（语词）也就可按第 3 图那样，解释为基本上是顺行结构：只不过在表层它变成了第 2 图的逆行结构罢了。虽然是逆行结构，但是构成英语名词短语的“节”，最长只能覆盖三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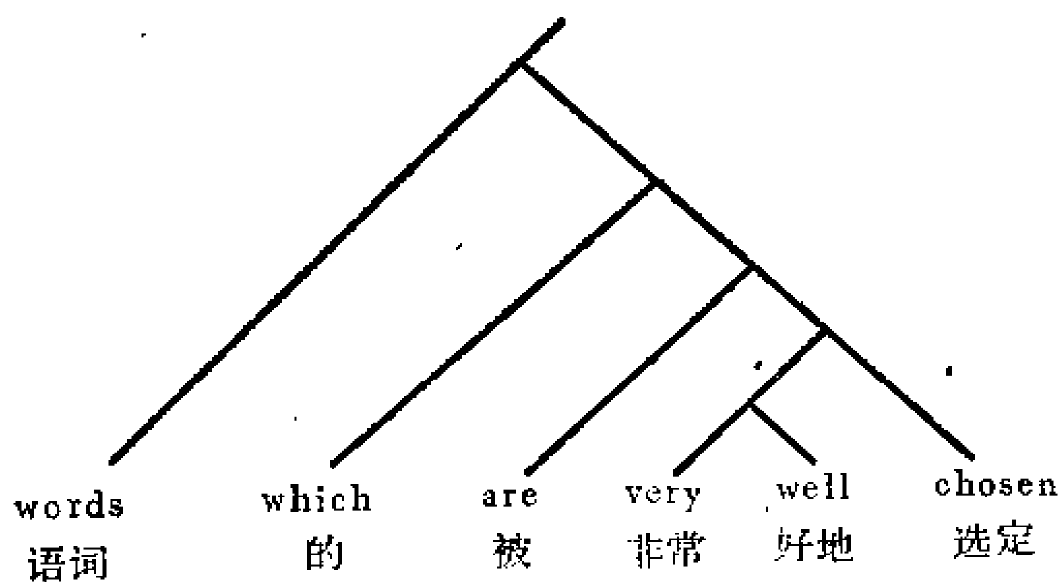
（张着白帆的小船在清澈的水面划行）

第一图　日语顺行结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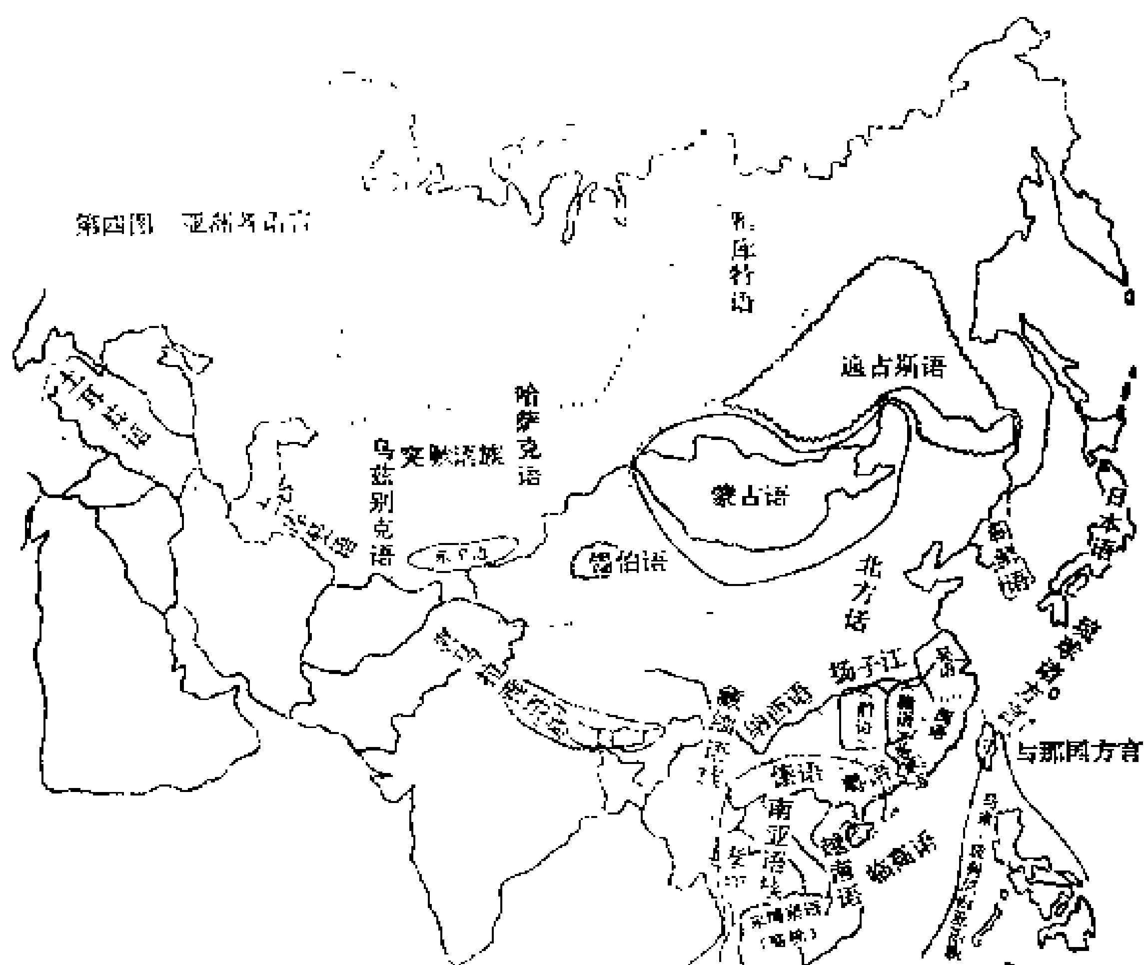
（经过精选的词句决不会得罪读者）

第二图 英语逆顺行结构例



（经过精选的词句）

第三图 英语顺行结构例



第四图　亚洲各语言

{冠词}+{副词}+{形容词}+{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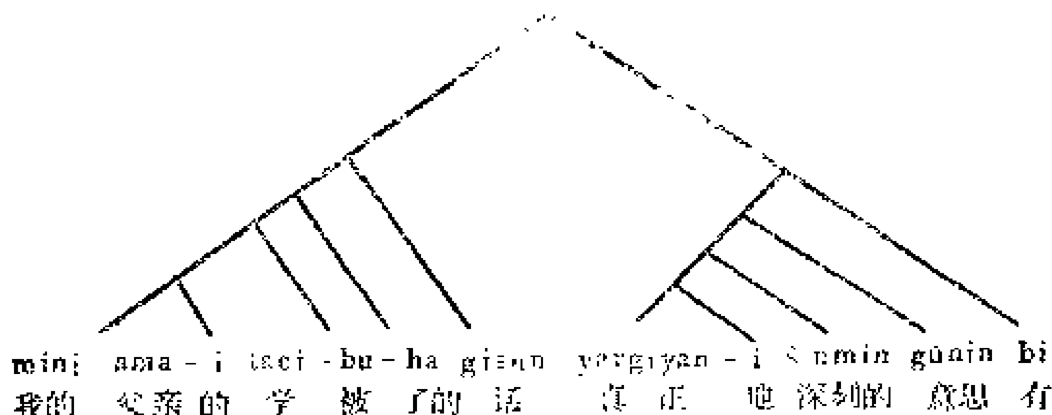
（请注意，象a very pretty, quiet girl“一个非常美丽的、娴静的少女”之类句子，乍看仿佛有更多的“节”，不过事实上它只是形容词的重叠，与严格的名词短语结构的抽象形式无关。）因此，尽管是逆行结构，仍然没有超出人的瞬间记忆充分加工的范围。只有如下的结构是例外：

my brother's son's wife

（我的）（哥哥的）（儿子的）（妻子）

这类“的”字结构的方式，虽然有任意连续的可能性，但在实际运用时则往往以常识习惯的长度为限。

这一方面令人感兴趣的是亚洲大陆语言（见图四）。北部的通古斯语、蒙古语等一律是逆行结构。这里举一个满语书面语的例子（如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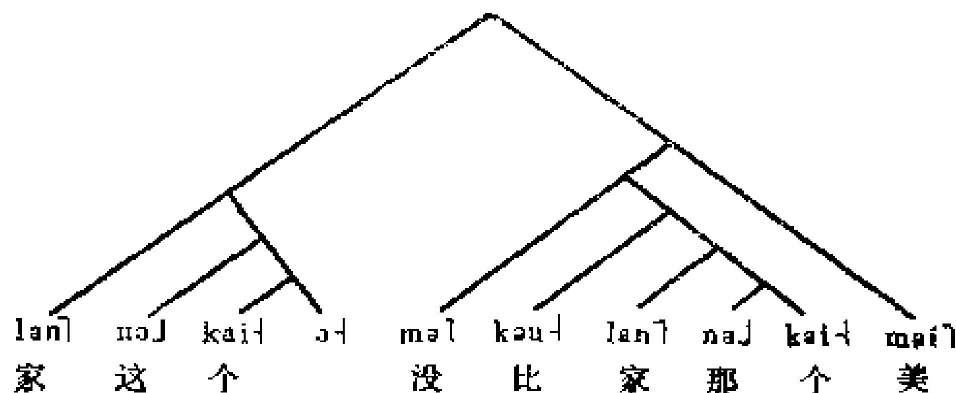


（父亲教我的话真有深刻的意思）

第五图　满语逆行结构例

相反，南部的大多数语言，无论台语、孟高棉语、越南语，都以顺行结构为基础。第六图所示的便是临高话的例子。最

令人感兴趣的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汉语绝不是等质的。越往北就越可看出阿尔泰语式的逆行结构，越往南就越可看出南亚语式的顺行结构。



（这个家比不上那个家好）
第六图　临高话顺行结构例

2.3　南方汉语的顺行结构

为了论述方便，就先从至今不太被重视的南方汉语的顺行结构谈起。

所谓顺行结构，就是不论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凡修饰语都依次置于被修饰语之后的结构。过去语言学家认为，汉语尽管有许多方言，不过这些方言的不同只限于发音不同和与此相应的词汇不同；至于词序的差别是很细微的（李方桂教授："Languages and dialects"，*The China Year Book*. Commercial press. 1937，pp.59—65，Shanghai；赵元任教授：*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7; 王力教授:《中国语文讲话》,北京,开明书店,1950,第11页)。近年来"方言"的记录趋于精密,调查工作从汉字发音的不同转向当地语言的音系结构、词汇和句法等方面。于是,句法上也存在重大差异的这些现象变得清晰起来。

比如下面两个例句,目前在普通话里似乎同样通行:

我+到+学校+去

我+去+学校

不过,前者是北方语,后者基本上是南方语型。就是说,北方语有把动词修饰语("到学校")放在动词之前的趋势,而南方语则尽量放在动词之后。① 修饰动词的成分放在动词之后的情况,最南的粤语尤其显著。在广州话里除"去"、"来"以外,还有:

1.副词

我+俾+本+书+佢+先

(北京话:我+先+给+他+一+本+书)

买+几+斤+香蕉+添

(北京话:再+买+几+斤+香蕉)

---

① 也许有人会说"我去学校"的"学校"是宾語,不是动词的修饰語。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去学校"的"学校"是一种方位状語,并不是及物动词的宾語,因为无论是在普通话里还是在南方话里,不说"*学校被我去"。另一个是:怎样定义"修饰語"这个术語。如果"毛毛腾腾地去"的"毛毛腾腾地"是方式状語,是修饰"去"的方式的话,"我去学校,他去工厂"的"学校"或"工厂"可以说是在动作的方位上修饰"去"的句子成分。

2.比较句

你＋高＋过＋佢

（北京话：你＋比＋他＋高）

坐＋飞机＋快＋过＋坐＋火车

（北京话：坐＋飞机＋比＋坐＋火车＋快）

此外，还有许多后置于动词的副词，如：

住（先）、翻（更）、过头（太）、乜滞（几乎）、得滞（很）

同样的情况在粤语东北方的客家话里也有：

食＋多＋滴（北京话：多＋吃＋一点）

看＋一摆＋电影＋添（北京话：再＋看＋一会儿＋电影）

客家语北边，在闽语区北端而与吴语区毗邻的平阳方言，差不多是这一类结构最北的例子：

企＋一下子＋添（再＋站＋一会儿）

比它更北的，就目前所知是安徽歙县方言。如：

想＋一下＋添（再＋想＋一下）

浙江的温岭方言，似乎也有：

你＋走开＋先（你＋先＋走）

一些皖中方言（如六安方言）里“在”字放在句尾，恐怕也属于这一类现象。例如：

他＋睡＋着＋在（他＋在＋睡＋着）

有趣的是厦门方言中相当于北京话“你＋先＋去”的说法，可以有如下两种：

你＋先＋行

你＋行＋在先

很清楚地显示出北方语型和南方语型并存的事实。同样的情况在比较句里也有。在闽语中，位于南端的海南岛方言或汕头方言，还完全是粤语式的。但北上到厦门方言，虽然宾语在动词之后，而比较前置词却到了动词的前面：

你＋较＋高＋伊（你＋比＋那＋个＋人＋高）

再往北，到平阳方言，一个句子里如果没有表示程度的副词，比较宾语放在动词之后：

你＋高＋伊

一旦加上程度副词，就变成了道地的北方语型，如：

你＋较＋伊＋高＋一滴（你＋比＋那＋个＋人＋高＋一点）

句式变得和客家话的“你＋比＋佢＋过＋高”一样了。可是看一下词素，客家话正是粤语型和北方语型的融合；若联系客家人来自北方移民的历史，那可真有意思，很值得深入探索。

比较短语（比较前置词＋宾语）位于中心形容词后的最北方的方言，据目前所知为安徽省长江沿岸的安庆和东流（今属东至县）方言：

这＋个＋好＋似＋那＋个（这＋个＋比＋那＋个＋好）

2.4．“横”的推移和“纵”的演变

上节已述，汉语的动词短语基本上是顺行结构——即宾语或补语之类修饰动词的成分，无论如何都放在所有动词的

后面。而事实上，现代汉语（北方话，特别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中相当多的动词修饰语出现在动词前。要指出的是，汉语并不都是一个样的，南方语还保留着保守的顺行结构基本性质，而从北方语来看，上面所举的动词后置成分的例子是相当特殊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北方语由动词“到”、“比”发展来的成分都到了名词宾语的前面：

到＋学校（＋去）

比＋他（＋高）

既保持了汉语的基本句法（词序）原则，又使这种动词修饰成分整个地转到了中心动词的前面。敏感的读者一定会想起，本世纪初维尔海姆·施密特完全凭经验已经观察到：宾语后置于动词的语言，多带有前置词，反之，宾语前置于动词的语言，多带有后置词（*Die Sprachfamilien und Sprachenkreise des Erde*, Heidelberg, 1926）。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古代汉语的标准语里，修饰动词的成分，除因为强调或倒装，都放在动词之后。比如①：

宾　格：树＋吾墓＋槚

方位格：吴＋败＋越＋于＋夫椒

比较格：霜叶＋红＋似＋二月花

被动格：劳力者＋治＋于＋人

夺　格：出＋屋

向　格：子禽＋问＋于＋子贡

① 下面的“宾格”等名称，因无相对应的汉语语法术语对译，均采取直译。——译者。

现代北方语都移到了动词前面：

宾　格：把＋楸树＋在＋我的＋坟墓上＋种下

方位格：吴军＋在＋夫椒＋把＋越军＋打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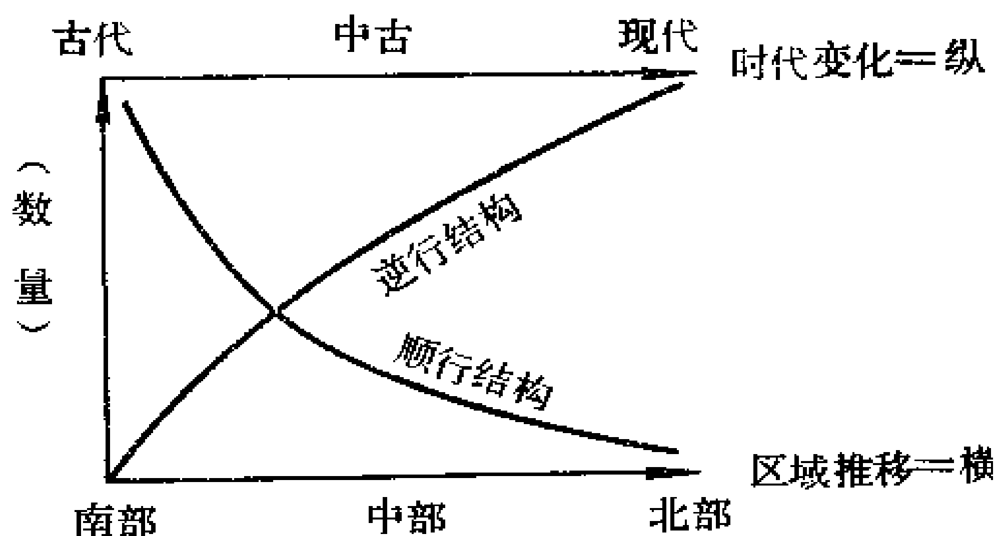
比较格：霜叶＋比＋二月花＋更＋红＋一点

被动格：劳动的人＋被＋别人＋统治

夺　格：从＋屋子＋出来

向　格：子禽＋向＋子贡＋发问

句法上古代语向现代语的“纵”的演变(longitudinal change)，和句法类型上南方语向北方语的“横”的推移（latitudinal transition），正好相对，互为验证，而形成图七那样出色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不只是在南北或古今的两极，连结古代和现代之所谓“纵”（时间）的变化的中间阶段，也和处于南方语北部、北方语南部所谓“横”（区域）的中段相对，从而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域性推移当作历史演变的反映来考察。



第七图　顺逆行结构曲线图

比方，倘若把顺行结构和逆行结构的对立解释为动词的修饰成分后置和前置的对立，结果给我们这样的印象：从顺行结构向逆行结构的推移或演变，就是修饰成分移位（placement）的问题。但是其实际变迁的机制，如上所述，并不是采取破坏某语言句法原则的手段，而是采取两个动词连接的形态。我们以下列格式为出发点（NP为名词短语，V为动词）：

$$NP_1 + V_1 + NP_2 + V_2 (NP_2)$$

括号里的NP表示任意要素：NP_2出现，V_2是及物动词；不出现，V_2就是不及物动词。V_2前的NP_2，往往既是V_1的宾语，又是V_2的主语。因此，为了表示更深层的结构，就以V_2前的NP和其后的NP（直接宾语）的同一性为条件而构成这样的句子。以宾语前置（动）词为例，看杜甫（713—771年*A.D.*）的诗句：

（NP）+醉+把+茱萸+仔细+看

（〔主语名词〕醉了，把茱萸拿在手里细细地看）王力教授（《汉语史稿》中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第412页）和太田辰夫教授（《中国语历史文法》，东京，江南书院，1958年5月，第260页），似乎都没有特别提出明确的形式上的根据，把这句话当作两个动词的连用。然而，被包蕴在这一句式中的句法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它本来是这样的：

$$\frac{\text{把}}{V_1} + \frac{\text{茱萸}}{NP_2} + \frac{\text{看}}{V_2} + \frac{\text{茱萸}}{NP_2}$$

后来第二个“茱萸”根据同素消除（identity erasure）的原则而删去了。

下面白乐天（772—846年*A.D.*）的诗句，便是不能把V_1+V_2当作两个动词连用的明确例子：

$$莫+\frac{把}{V_1}+\frac{杭州刺史}{NP_2}+\frac{欺}{V_2}$$（劝你不要欺侮杭州刺史）

这里的“把”已不能当作及物动词，而必须是前置词。就是说，到这个时期（7～8世纪）才开始出现明确的宾语前置词。这样来看结构的一贯性，我们就可以了解，现代北方汉语里提到动词前的宾语，开始时并非仅仅是直接宾语移位的纯语法作用的结果。

纵然是同样的结构，但NP_2并不后置于V_2的句式为如下结构（PR＝前置词）的来源，这已经是毋庸赘述的事实了：

$$\frac{比}{PR<V_1}+\frac{他}{NP_2}+\frac{高}{V_2}$$

$$\frac{从}{PR<V_1}+\frac{房子}{NP_2}+\frac{出来}{V_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V_1+NP_2+V_2$中，V_1和V_2之间有使役关系的句式是怎样发展来的。

古代汉语中使役态可用一个汉字的动词来表示：

洁＋之（使之洁）

死＋之（使之死）

相应的现代汉语则是：

洗＋干净＋它

杀＋死＋它

显然是表动作的动词词根与表动作结果的形容词（在汉语里具有动词功能）的结合。从杜甫诗中，我们还看得到这种句型的演变过程：

$$\frac{石角}{NP_1}+\frac{钩}{V_1}+\frac{衣}{NP_2}+\frac{破}{V_2}$$

$$\frac{烧}{V_1}+\frac{烛}{NP_2}+\frac{短}{V_2}$$

至于“钩破＋衣服”、“烧短＋蜡烛”这种V_1和V_2的结合形态，许多语法家都公认是宋以后的事（王力教授前引书第40页；太田辰夫教授前引书第280页）。但是，V_1和V_2怎么会形成复合动词的呢？至今还没有对这一变化归纳为结构变化提出理论解释。

我们把它解释为顺行结构向逆行结构统一的一个方面，用图八来表示其结构变化。因为这种使役结构，确实跟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古汉语相呼应，也出现在从顺行结构（南方）向逆行结构（北方）区域性推移的中间阶段的方言里：



第八图　顺逆行结构统一例

客家话（海陆方言）：讲＋佢＋唔＋赢
（说＋不＋过＋他）

吴　语（上海方言）：话＋伊＋勿＋过
（说＋不＋过＋他）

这都是否定式例子。吴语绍兴方言里，普通的使役式也有同

样的词序（詹伯慧教授，《现代汉语方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打＋伊＋败（打＋败＋他）

类似的话，在北方语里，据笔者调查，北京方言、开封方言（河南）、朔县方言、五台方言、汾阳方言、安邑方言（以上山西）、东干语（伊尔德克方言）都是下边这样的结构：

说＋不＋过＋他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第328页；1983年第二版，第321页）尽管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包含着的地理类型涵义，但是报道了这种方言现象后指出，北京方言口语里也存在这样的说法：

说＋他＋不＋过

假如这不是从南方方言中借来的，那就可以认为，北京口语里恰恰残存着中世纪以来的分离型使役结构的痕迹。但为了引起注意，这里补充一句，即使桑德拉·汤普森和李讷也指出（"Interaction of diachronic processes in syntax: development of the causative in Mandarin Chinese"，1974，p. 11），下面的词序在现代北方语里当然也完全是违反现代汉语句法的：

*钩＋衣服＋破

*收拾＋房里＋干净

2.4.1 时·体标志的南北型

人们也许还记得五十年代末约瑟夫·格林伯格教授的调查。他选择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美洲印第安的30多种语言，统计了有关宾语位置以及助动词位置的资料（"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Universals of Language*. Cambridge: The M.I.T.Press, 1963, pp.73—113)。格林教授的调查，虽然因其类型判断的天真朴素而经不起今天的推敲，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探究的线索。在格林伯格教授调查的19种语言里，宾语和助动词在句中位置的相互关系形成醒目的对比（S＝主语，V＝动词，O＝宾语，Aux＝助动词）：

	SVO	SOV
V＋Aux	1	8
Aux＋V	7	0

格林教授当时认为的Aux，今天已查明多数是在句子层次结构中处于高位的主动词，所以上面的统计已无法全盘照搬。比如"体"（严格说是Aktionsart）和"时"的标志，汉语的各"方言"就提供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材料。

我们问有没有进行过某一动作或行为的事实，把具有这一意义的当作"时"（也就是说，存在这个事实的就作为语法范畴的"过去式"，没有的就作为"非过去式"。——同一个"时"的概念，在不同语言的语法范畴里是否具有同样的语法、词汇的意义，这里不作讨论）；问是否在某个瞬间内完成某一动作或行为，把具有这一意义的当作语法范畴的"体"（完成体和未完成体）。那么，汉语南方方言的"时"和"体"，就井井有序地区分开来。例如：

粤语（广州方言）

1）过去时

佢＋有＋冇＋去＋学校＋啊？　有/冇

2）完成体

佢＋去＋咗＋学校＋未＋啊？　去＋咗/未＋去

闽语（汕头方言）

1）过去时

伊＋有＋无＋去＋学堂？　有/无

2）完成体

伊＋去＋咯＋学堂＋未？　去＋咯/未＋去

客家语（梅县方言）

1）过去时

佢＋有＋去＋学堂＋冇？　有/冇

2）完成体

佢＋去＋了＋学堂＋未？　去＋了/未

在这些语言里，表示“时”的词素通常出现在动词之前，并且只用这些词素的肯定式或否定式来回答；而表示“体”的却一定以动词的词尾来显示，因此没有动词词干就无法用肯定式或否定式来回答（客家语的“未”不过是紧缩形式）。

与此相对的北方方言就没有这种区别。这正好象古日语有“时”（用软腭音系的辅音ki、keri来标记过去时）和“体”（用齿音系辅音nu、tu、tari、ri来标记完成体）的区别，但现代日语中只用一个ta来统一一样（因此，现代日语的ta既可解释为过去时，也可解释为完成体）。然而，现

代北方汉语表“过去”和“完成”的标记，前置于动词的“时”的词素“有”和后置于动词的“体”的词素“了”，作为形态学上的替换形式出现。这可能是曾经有过区别的证据。如：

	非过去/未完成	过去/完成
肯定	他＋买＋书	他＋买＋了＋书
否定	他＋不＋买＋书	他＋没＋有＋买＋书

非过去时/未完成体的肯定式是“买”，否定式是“不买”；既然过去时/完成体的肯定式是“买了”，那么其否定式本来应该是“不买了”。但在北方汉语里实际上说成“没有买”。这个词素“有”应该是词素“了”的替换式，只是放到了动词的前面而已。于是，北方汉语的过去时/完成体的词素有两种替换形式——在动词前是“有”，在动词后是“了”。唯一不同的是：这个过去时/完成体词素在动词前面时，该句中的否定词“不”用“没”替换。

和“了”～“有”在肯定·否定句中的用法相对应的，反复疑问句也有完全同样的替换用法：

非过去/未完成：他＋买＋书，＋不＋买？

过　去/完　成：他＋买＋了＋书，＋没＋有？

该句的非过去时/未完成体说“买书、不买（书）？”既然过去时/完成体说“买了书，……”，那么这一句过去时/完成体反复疑问句的反复部分应该是“不有买（书）？”诚如前述，一旦与动词前的词素“有”相逢，否定词“不”就换成“没”（William S-Y. Wang: “Two aspect markers in Mandrin”, *Languege*, Vol.XLI, No.3, 1965, pp. 457—470）。也就是说，现代北方汉语里的“了”和“有”

已被统一化了；所以北方汉语的“了”～“有”，既可以解释为过去时，也可以解释为完成体。

关于“时”和“体”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可归纳如下：

（1）北方SOV型的满语不区分“时”和“体”，如-∅（afa‘攻击’）：-ha/-he/-ho（afa-ha‘攻击了’）那样，依靠动词后的成分，只用一套标记来表示非过去/未完成和过去/完成。相反，南方SVO型的泰语区别“时”和“体”，“时”用前置于动词的成分表示，“体”用后置于动词的成分表示，如：

完成体

khăw（他）+kin（吃）+khâaw（饭）+lǽæw（了）

过去时

khăw（他）+dâay（过去）+kin（吃）+khâaw（饭）

（2）后置于动词的成分越过语言的差别，显示出惊人的相似：

蒙古语　-лаа/-лээ/-лоо/-лөө

北方汉语　-la（<liau），-l(i)o

吴　语　-lo

闽　语　-lau，-lou

泰　语　-lǽæw

临高话　-ʒəu[1]

(3)倘若作更深结构的分析，汉语北方话的“时/体”标记，在底层结构里也必须放在动词之前（参看William S-Y. Wang前引论文）。

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启发。我们可以认为汉语本来是南

方型的，存在着这里提到的"时"、"体"两个系统，而在北方这两个系统被阿尔泰化了，仅仅在表层形成了所谓的北方型。

由此我们也会理所当然地想到，前置词（PR）语言和后置词（PO）语言中Aux的位置。格林伯格教授在这方面的统计也有醒目的对比：

	PR	PO
V+Aux	0	9
Aux+V	9	1

可是，格林教授没有注意造成这一现象在结构上的发展过程。只要把南方动词短语的顺行结构在北方逆行化的过程，跟上一节一样作深入探索，自然会觉得这个对比也并不怎么意外。说到这里，我们才体会到§2.4里提过的这句话的涵义：北方汉语的动词短语既保持了汉语的基本句法（词序）规则，而又整个地统一于逆行结构。总之，SVO语言和Aux+V语言之间，或SOV语言和V+Aux语言之间，有着结构方面的内在联系。前节所述顺行结构中PR发生的过程，便是说明这种内在联系的例子。因而，Aux的位置或PR和PO对立的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作为动词短语整体的层次结构来考虑，而它们跟SVO或SOV的联系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侧面罢了。

2.4.2 名词短语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格林教授也曾想找出名词和名词修饰语的关系及其跟动

词与主语、宾语组合的结构之间的联系。可是结果毫无统计学价值（A＝形容词，N＝名词）：

	SVO	SOV
N ＋ A	8	5
A ＋ N	5	6

置词、后置词组合的结构之间的联系，所作统计也大同小异：

	PR	PO
N ＋ A	12	7
A ＋ N	4	7

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格林教授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法：对语言资料加以形式上的整理，先提取句法规则的普遍规律，再确定类型。印欧语大致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左右（西和东）分为SVO型和SOV型两大类；如果把名词修饰结构也加以普遍化，名词短语也可相应地分为N＋A型和A＋N型两大类。

这里所谓的“普遍化”，就是对所研究的语言的句法结构、作形式上的整理，然后归纳出普遍规律来的工作。比如英语，通常被当作A＋N型语言。但这只是从局部观察到的表层结构。只要分析一下英语名词修饰语的句法特性，马上可以发现，放在名词前的成分最长只能这样：

{冠词}+{副词}+{形容词}+(名词)

a very tall (man)"一个个子很高的人"(至于a very tall, impressire man "一个个子很高而有印象的人",只是重复形容词,并不能算作造句要素连接更长的短语)。

如果再长些,限定词以外的修饰成分就只好搬到被修饰名词的后面去了:

a man who is very tall but not too impressive.

(一个个子高而给人印象不深的人。)

所以,不把英语(和其他日尔曼语)的句法结构类型看作N+A型,乃是很大的错误。格林伯格教授在这一点上之所以失败,甚至连"统计价值"也没有,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对这类句法结构的调查并不是基于系统处理过的材料。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因为他的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当时的普通语言学家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且把确定个别语言类型的问题搁下,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面提到的印欧语的整个地理分布。关于印欧语句法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是而对规律如此强的地理分布现象,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其中的地理因素。语言学家之所以犹豫,至今不敢把这个因素放在第一位,而设法致力于印欧语"内在意向"的确立,也许是因为把"地理分布"仅仅看作直接来自周围语言的"影响",而没有去注意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实际发生了怎样的事,于是无形中把"影响"看成了气候、细菌感染这类现象,以为如同阿拉伯语对印度·伊朗语的"影响",汉语对朝鲜语、日语、越语的"影响"那样。这样的感染(="影响")当然不会给生命体(=被影

响语）的形质特征（＝句法特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从现代印欧语地理分布所观察到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这样解释"影响"不可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与此同时，印欧语在古代取得了牧畜民型的发展，但这毕竟是古代的事；随着处于横跨欧亚广大区域而发展的语言现象，仅仅用古代发展的标志来解释，就显得不够了，这一点也是十分明确的。

亚洲大陆的语言，情况也几乎相同：无非就是印欧语中所看到的那种很有规律的区域分布图及其推移情况。就拿限定词来说，从南向北或相反从北向南，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推移情况（DEM＝指示词，CL＝类别词，N＝名词）：

满·通古斯语		DEM＋N
汉语	北方	DEM(CL)N①
	南方	DEM＋CL＋N
苗·瑶语族		CL＋N＋DEM
藏·缅语族		N＋DEM＋CL
侗·台语族		N（CL）DEM

向南方移动，名词的修饰成分就移到名词之后，往北则相反，修饰成分就前置于名词，与动词短语的情况完全一致。这一关系，即使在领属格用法里也有所表现：

满·通古斯语	我的＋爸爸
	狗的＋尾巴
汉　语	我的＋爸爸
	狗的＋尾巴

①"这茶"、"这书"之类结构只能在北方汉语中见到。参见§3.4。

藏·缅语族	我的＋爸爸
	狗的＋尾巴
苗·瑶语族	我（的）＋爸爸
	尾巴＋狗（的）
侗·台语族	爸爸＋我（的）
	尾巴＋狗（的）

正显示出名词短语结构的基本句法规则。

以上所说，其实是早就十分清楚的事实。但是连结"南"（南亚诸语）"北"（阿尔泰语）的汉语，直到近年才查清它的语言结构决不是等质的。汉语在亚洲大陆语言类型特征的分布中，成为一个由南向北有机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南方型向北方型的变化（或相反的变化）似乎很早就已发生。如果排除若干例外，这南北有机联系的痕迹，我们今天只能在化石化了的复合名词构词法里才看得到。

在汉语方言中，残存着南方型名词句结构的痕迹，最南的粤语里尤其多。岑麒祥教授在1953年已经指出，广州话存在"名词词干＋修饰成分"结构的复合名词，这是与侗·台语——特别是广东西南部至今使用的壮语"交流"的结果（〈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中国语文》，1953年4月号，第9—12页）：

人客（北京话：客人）
菜干（北京话：干菜）
鸡公（北京话：公鸡）
牛公（北京话：公牛）

这样的复合词，在今日香港的粤语里也有不少残存，至今还能听到：

鱼生——生的鱼（因为广东人把热粥敷在鱼片上吃，所以事实上鱼片已经半熟。不过这个词的词义则是未经烤煮而吃的“生鱼”）。

饭焦——饭烧焦后结成的一个硬块，可以油炸。

熊人——由于熊能两足直立，象人。故以“人”修饰。邻接广州的台山方言是“人熊”，藤县方言也是“人熊”，可供探讨这种逆修饰关系可能性的人参考。在台山方言虽然“熊人”这个词是“人熊”，但另外也有修饰语后置于被修饰语的复合名词，如：$naŋ^{1a}$鸡"鸡皮肤"（$naŋ^{1a}$在壮语里是“外壳、皮肤”）.$pa:k^{4a}$-leo^{3b}“口”＋“多”＝“多嘴”（$pa:k^{4a}$/leo^{3b}在壮语里，是具有相同意义的形素，是同源词）。

其中发人深思的是“菜干”的“干”。上而所举后置于名词词干的修饰成分，现在大部分都已成了化石化的构词成分。但偏偏只有“干”这个形素，仍然没有失掉它的构词能力。例如：

荔枝干　“荔枝”＋“干”

龙眼干　“龙眼”＋“干”

牛肉干　“牛肉”＋“干”——在今天不单指“干肉”，而是一种熟食品。

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食品名称里，到了近代，biscuit传入亚洲后产生了这样的名词：

饼干　“饼”＋“干”

乍一看，这个“干”字好象已经从形容词变成具有“经脱水处理的食品”这一意义的名词词根了。确实也有人这样分析

（张日升教授〈香港粤语阴平调及变调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9月，第88页）。这是因为下意识地抱着"汉语的名词修饰成分必须放在被修饰成分前"这个固执的观念，所以不得不这样分析。事实上，这样分析的本身就表明这个"干"字的用法的非北方汉语性。

这种后置修饰语的复合名词，越往北越少，其他南方方言，则多少存在一些。常见的有下边这些（括号内是对等的北方语）：

闽语（厦门方言）

人客（客人）

风台（台风）

菜蔬（蔬菜）

历日（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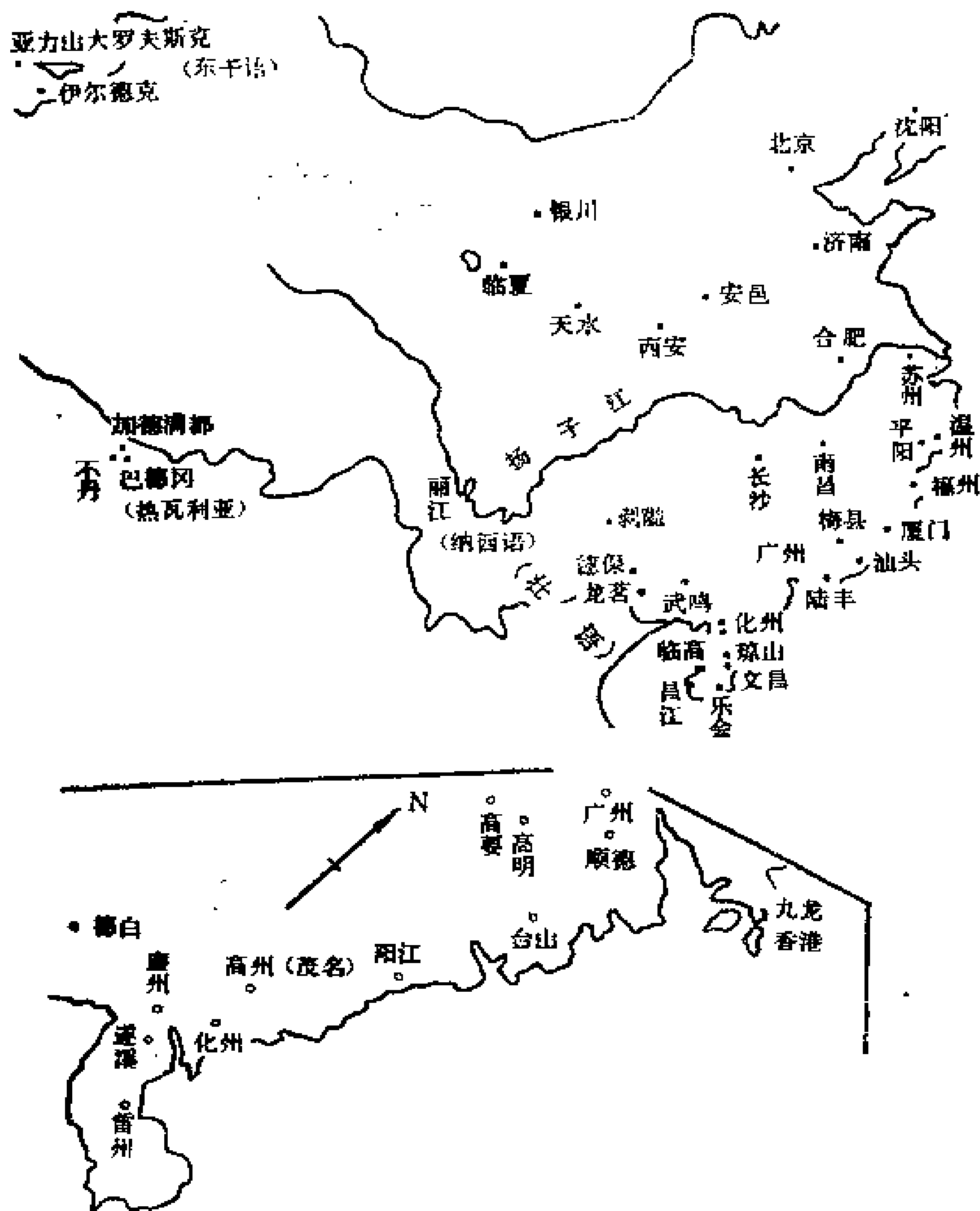
鞋拖（拖鞋——"拖"，动词）

"人客"、"风台"、"鞋拖"，北而的福州方言（闽北语的代表方言）里也能看到。但到了厦门以南的闽语方言，带名词词尾"仔"的复音节名词甚至也有后修饰成分：

汕头方言　奴仔孧　"婴儿"＋"很小"

文昌方言　牛仔孧　"牛"＋"很小"

总之，这种"被修饰语＋修饰语"的词序，在近乎词组的复合词里也可发现。这不只是闽语区南北端的语言现象，广大闽语区似乎都存在着这种句法/构词法。与吴语接壤的平阳方言里，还残留"椅子孧"（"椅子"＋"很小"）的说法。



（华南详图）

第九图　方言地名图

客家话（梅县方言）

人客（客人）——客家话也有“客人”（“客家人”）这个单词。

尘灰（灰尘）

菜干（干菜）

吴语（上海方言）

人客（客人）

乳腐（腐乳）

这类关系的南方型词序痕迹更为系统地残存于表示不同性别动物的词汇里。如64页表所列，它们显示出从南往北秩序井然的类型推移（下面加线的是修饰成分）。总之，表示性别雌、雄的修饰语（在这些词汇里正确地说是词素），在南方方言里它们经常在被修饰成分之后，但在北方方言里却规定为“修饰语＋被修饰语”的词序。这一事实引起我们的思考：汉语方言里的这些词序差异是怎样从名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后的南亚诸语的词序，和相反地被修饰语在修饰语之后的阿尔泰诸语的词序分离开来的呢？

更发人深思的是如下事实：在南方同一种方言里，同一动物有几种说法，如：

广州　猪公/猪郎

　　　鸡䳄/鸡媛

汕头　马牯/马公

　　　狗牯/狗公

梅县　鸡嫲/鸡媛

这还只是词汇的不同，并不涉及词序。但往北一到长江流域

词汇 / 方言	公鸡	母鸡	公牛	母狗
昌江	鸡头	鸡嫲	牛公	狗嫲
乐会	鸡公	鸡娜	牛郎	狗母
文昌	鸡头	鸡娜	牛公	狗嫲
琼山	鸡公	鸡母	牛公	狗母
遂溪	鸡公	鸡母	牛牯	狗母
化州	鸡公	鸡娘	牛牯	狗娘
廉州	鸡头	鸡乸	牛公	狗娜
茂名客家	鸡公头	鸡嫲	牛牯	狗嫲
高州	鸡公头	鸡乸	牛牯	狗乸
阳江	鸡公	鸡项	牛公	狗乸
含山	鸡公	鸡乸	牛牯	狗乸
顺德	鸡公	鸡乸	牛公	狗母
广州	鸡公	鸡乸	牛公	狗乸
陆丰	鸡公	鸡嫲	牛公	狗嫲
梅县	鸡公	鸡嫲	牛公	狗嫲
汕头	鸡翁	鸡母	牛牯	狗母
厦门	鸡角	鸡母	牛公	狗母
长沙	鸡公子	鸡婆子	牛公子/牯子	狗婆子
南昌	鸡公/牂鸡	鸡婆	牛牯/公牛	狗婆
温州	雄鸡	草鸡/鸡娘	雄牛/牛牯	草狗/狗娘
苏州	公鸡	雌鸡	雄牛	雌狗
合肥	公鸡	母鸡	牯牛	母狗
西安	公鸡	母鸡	公牛	母狗
济南	公鸡	母鸡	犍子	母狗
北京	公鸡	母鸡	公牛	母狗
沈阳	公鸡	母鸡	牤子	母狗
东干语	гунжи (公鸡)	мужи (母鸡)	жинню (犍牛)	мугу (母狗)

的方言，就出现了南北分界线，南方型和北方型的词序突然共现于同一方言之中：

温州	草鸡/鸡娭		
	雄猪/猪牯		
	草猪/猪娘，猪儿娘		
	雄牛/牛牯		
	草牛/牛娘		
	草马/马娘		
	草狗/草狗娘儿		
	草猫/猫娘		
温岭	公猪/猪雄		
至德(今属东至县)·青阳			公鸡/鸡公
歙县			鸡母/嫫鸡
南昌			牛牯/公牛
			鸡公/样鸡
常州			雌鸡/鸡婆
贵州	铜仁	公鸡/鸡公	母鸡/鸡母·鸡婆
	思南	雄鸡/鸡公	母鸡/鸡母
	凤冈	叫鸡/鸡公	
	湄潭	叫鸡·雄鸡/鸡公	
	习水	叫鸡/鸡公	

也许有人会说，“草鸡”和“鸡娭”意思不一样，用法也不一定相同。但这与我们的论点无关。同一方言里能存在“草”+“鸡”和“鸡”+“娭”两种不同词序的复合词，这一事实

才是最重要的。在北方汉语里，比如说“母鸡”就是“母”+“鸡”，无论如何不可能有“鸡”+“母”这样词序的复合词。因此，汉语的结构并不是花岗石一块的等质体。

这条南北分界线，在安徽省恰恰处于扬子江沿岸。例如，自西向东串连岳西—潜山—东流—怀宁—贵池—石埭—铜陵—南陵—宣城—宁国各县以北是“公鸡”。跟这些县相对的，同样自西向东串连宿松—太湖—望江—至德—青阳—太平—泾县等县以南都是“鸡公”。其中至德和青阳，如上引例为中间型。① 这条分界线，古代也许还靠北一些。打开地图，京汉铁路横穿河南和湖北省境，附近有座“鸡公山”。这山是怎么个模样，由于没有亲眼见过，说不准。但南方人一听大概很容易理解成“公鸡山”吧。而北方人或许会说，这大概是为了纪念从前某个叫“鸡公”的伟人吧。既然有姓“马”，姓“牛”的，那么姓“鸡”也理所当然喽（不过正经地说，虽然有姓“姬”的，但“鸡”并没有列入《百家姓》）！谈到“鸡公山”，四川省南部也有一座。

2.4.3 名词短语结构的“纵”的演变

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名词短语从南方语转向北方语句法

① 安徽以东、常州“鸡婆”，无锡“老猪婆”〔如果这不是印错的话〕似是南方型的北限（《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年第697页），而安徽以西自东至西，湖北英山、罗田、新洲、应山、应城、宜昌、建始、利川，贵州铜仁、沿河、务川、道真、正安、桐梓、习水、赤水是“鸡公”“鸡母”“鸡婆”等词序之北限（湖南、四川两省情况未详）。甘肃定西、会宁、通渭、靡安、清水、天水、陇西、武山、西和、武都、文县、铜靡、敦煌、龙选等地说“鸡公”“鸡婆”或“鸡母”，该算是遗留在西北角的方言岛现象（《甘肃方言概况》1960年—第5455页）。

（词序）类型的这一“横”的地理推移，很整齐地对应着从古到今的“纵”的演变。

藤堂明保教授很可能是运用徐松石牧师《粤江流域人民史》（1930年，上海）第18章“倒装辞研究”中的材料，以《尚书·大诰》中“猷大诰尔多方”一句为始，举了古文献所能见到的几个南方语式句法结构的例句（〈关于凤凰与飞廉〉，《东方学》第18辑，1959年6月，第104—114页）。“猷大诰”按传统的解释，有的把“猷”注作发语词，有的解作“诰大猷”。但对照《诗经·巧言》的“大猷”和杨雄《方言》的解释“猷，道也”（《汉书·翟方进传》的“大诰道诸侯”如何解释，另作别论），可见《尚书》的这一句理解为“大道”似乎是正确的。因此，汉孔安国的注把它当作古代的“倒装句”。藤堂博士举了《诗经》下列材料为证：

中谷（葛覃、中谷有蓷）“山谷里”

中逵（兔罝）　“岔道间”

中林（兔罝）“林子里”

中心（终风、二子乘舟、黍离、泽陂、匪风）“心中”

有人说，这一类句子在“召南”里见得多些。这不对。“召南”里一个例子也找不到，上引各篇倒不少。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邶风·式微”的第四句和第八句：

胡为乎中露

胡为乎泥中

两句明显或对。但因为第四句的“露”跟第三句的“故”押韵（上古“鱼部”）；第八句的“中”和第七句的“躬”押

韵（“侵部”），所以“中泥”不得不采取这“泥中”的颠倒词序。于是成了后世注释家的不解之谜（见毛传、鲁诗。把“中露”解作“露中”乃自朱熹始）。

古代地名、人名中的逆词序，如“丘舆”（春秋鲁地名，杜预指出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帝尧”（即“尧帝”），早已为人所注意。在殷墟甲骨文献中也屡有发现（参阅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年10月）。地名如：

丘商（商之丘，“商丘”）

丘雷（即“雷丘”）

人名如：

祖甲、祖乙、祖丙……（即甲祖、乙祖、丙祖等）

妣甲、妣乙、妣丙……

父甲、父乙、父丙……

陈梦家也承认卜辞中同位名词组合容许“颠倒”的词序（《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05页）。如：

大乙配妣丙/妣丙大乙配（妣丙是大乙之配）

为什么要把这种同位名词结构提出来讨论呢？我们说既然努尔哈赤的子孙世宗及其后裔宣宗，不必是“*宗世”“*宗宣”，那么“祖甲”、“祖乙”自然也应该就是“甲祖”“乙祖”的意思了；称雍正帝、道光帝而不必是“*帝雍正”“*帝道光”，那么“帝盘庚”、“帝小辛”自然也应该是“盘庚帝”“小辛帝”的意思了。这是汉语学家的常识。那么为什么偏偏只在先秦文献里才有这“颠倒”的词序呢？这很可能是古代汉语名词短语顺行结构的痕迹。因为这

种同位名词短语的结构，与语言的普通名词短语的顺、逆结构，进而甚至与整个句子结构的顺行或逆行有关系。格林教授把Common Noun（普通名词）和Proper Noun（专有名词）的词序形式，跟主语、宾语和动词的词序做了对比，得出了如下的统计（其实应该先对比它跟限定词与名词的组合，或形容词与名词的组合，然后跟主语、宾语和动词的词序进行对比，才能得到合理的统计）：

	SVO	SOV
普通名词＋专有名词	7	0
专有名词＋普通名词	2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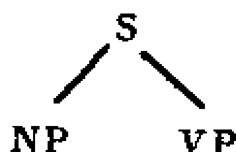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同位名词的词序毕竟反映了该语言的整个句法结构的特色，所以试作这种统计还是可取的。由于某个语言句法系统中相异部分的同化作用不一定是同一时间全面发生的，因此难免出现上表那样的参差。即使如此，该表却相当忠实地显示了同位名词结构和整句的句法结构（特别是动词短语结构）的关系。也就是宾语、补语等动词修饰语前置于动词的语言（SOV型），名词短语中专有名词（修饰语）通常前置于普通名词（被修饰的中心词）。相反，宾语、补语等动词修饰语后置于动词的语言（SVO型），名词短语里专有名词（修饰语）也后置于普通名词（被修饰的中心词）。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讨论过的，一个语言通常是顺行、逆行结构趋于统一的问题。由此，我认为如下两点是可以明确的：

（1）“猷大、中谷、丘商、祖甲”之类的说法，反映

了古汉语名词短语顺行结构的痕迹；

（2）而且，它们同时也与动词短语中的顺行结构深有联系。

这里必须提醒，如同从现代方言的“横”的分布情况中观察到的那样，要是把句子看成由主语的名词短语（NP）和谓语的动词短语（VP）组成，如下图：



那么，汉语似乎是很早就受到了来自NP“北方化”的波动。假定北方汉语动词短语接受最后的大规模北方化是在9世纪光景，因而南方方言所以还充分残留着顺行结构，那么，由于名词短语在南方方言里顺行结构的痕迹仅仅残存在化石化了的复合词的构词法中，可见名词短语一定在很早以前就接受了逆行化。古代汉语资料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名词短语顺行结构的痕迹，只能在周初(1120年B.C.)以前的资料中才能发现（地名等很稳定，留存得相当久长，其实际年代可能更古。徐松石牧师指出的古代倒装地名也很确当，参阅前引书第166页以下)。藤堂明保教授在前引论文里说，用甲、乙、丙、丁等天干命名的方法，传到春秋(770—404年B.C.)的齐国（地处山东的繁荣国家），太公子孙的命名变成了：

乙公、丁公、癸公

这就提供了与殷的（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1027年）祖甲、祖乙、祖丙等恰当的对比材料（前引书第106页）。如果认为周是从西北进入中原的一族，那么汉语的名词短语受到决定性的变化，其时间就不得不上推到公元前10世纪末。同处于春秋时代的晋文公（635—628年B.C.）在“城濮”打败了

楚国。这个地名也就因为是个地名残存着倒装词序（若按春秋时代的词序，已应该命名为“濮城”）！

或许这只不过是个偶然的巧合。但是就连英语词尾变化的消失，也是先名词，后动词（Thomas.G.Bever and D. Terrence Langendoen："The interaction of speech perception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Linguistic Change and Gene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32～95)。在英语里，这是形态学问题，也许二者性质稍有不同。但作为那种变化的补偿，名词短语里的关系分句修饰语的构成方法大受影响，可决非与句法规则无关。英语里名词短语也必须成为逆行结构。其意味也是极其深刻的。

第三章 基本词汇的推移

3.1 "江""河"的分布和历史

说到词汇，显示语言区域性推移的事实，那真是不计其数。如方言地理学那样的描写，可以画出无数条等语线（isogloss）。只是这些等语线主要表示词汇变化的细微部分，关于语言的结构类型的反映就很有限。谁都会想到否定词或类别词等具有语法功能的词汇，方言地理学对这类词就不大处理或难以处理了。在谈这一类词之前，让我们先讨论一下普通词汇里的"河流"。

汉语的河流有"河"和"江"两个词。黄河、长江为人所皆知。关于它们的词源，历来有种种传说。但看它们的地理分布，大致以长江为界，南边的大部分叫"江"：

钱塘江、建瓯江、闽江、赣江、珠江（东江、西江）

北边的叫"河"：

淮河、涡河、黄河、卫河、滹沱河、桑干河、滦河、辽河

只要打开亚洲地图，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始终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在新开发地区不免可以指

出一些例外：北方不是有黑龙江、乌苏里江吗？南方不也有南渡河（海南岛）、红水河（广西壮族自治区）吗？但是，除掉这些新开发地区的河名，自古就汉化的地区的河流名，绝大多数都存在着这种南北对立，并且以长江一线为界。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而且这些名称自远古时代就已确定，一直保持不变，实在令人惊叹。语言这个东西，它的表层尽管很容易发生变化，但它的基干竟如此保守而难以变易！

“河”和“江”的不同，从汉字的字形或字音上，有许多或新或旧的臆测。但是，只要我们弄清了“横”的区域分布上的南北关系，也就一定会发现造成这一区域性差异的语言自身的差异。

罗杰瑞教授和梅祖麟教授把“江”的本义长江，与孟高棉语族的巴纳语（Bahnar）、塞当语(Sedang)的[kroŋ]，卡涂语（Katu）的[karuŋ]，布罗语（Bru）的[kloŋ]，呵莱语（Hre）的[khroaŋ]，古孟语的[kruŋ]（都是“河流”的意思；古藏语的[kluŋ]“河流”，泰语的[kloŋ]“划”由此借来）联系起来；把“河”与蒙古语的[ɣool]“河流”联系起来（“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32.1970, pp.274—301）。作为这一论点基础的，是“江”这个词出现较晚。在殷代甲骨文里没有发现。西周金文中只见到一次。至《诗经》才开始屡次出现：五首诗里有九次，都是指长江。特别在“四月”里与“汉”结合成“江汉”（注意它的词序，是指古代流经楚国的长江支流“汉水”），只出现“江”的“江有汜”是“召南”诗，当然也是指“汉水”。也就是说，古汉语里河流的总称是

"水"或"川"（古藏语ch'u）；"河"是指黄河，"江"是指长江。

假定把汉语的"江"、"河"直接与泰语的［kloŋ］，蒙古语的［ɣool］联系在一起，恐怕还有问题。罗杰瑞博士和梅祖麟博士也指出，和［kloŋ］有明显关系的似乎是藏语的kluŋ，因为包含-l-介母，故与"江"没有形成有规律的对应（理由见后）；蒙古语的［ɣool］，也似乎与古藏语的rgal"浅滩"、rgal-ba"过河"有关。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一假设刚好与古汉语音韵体系的一些研究结果（与前面论述完全无关地获得的进展）一致。

"江"，从"工"得声。最初造字时应该具有与下列单词近似的发音：

工，功，攻……日本汉音kou＞［ko:］，北京音［kuŋ］

巩，銎，跫……日本汉音kiyou＞［kio:］，北京音［kuŋ］

但是，因为这些词的声母后面所带的卷舌音，随着音节末的辅音异化作用（参阅拙著"Retroflex endings in Ancient Chines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I, No. 2, May, 1973, pp. 183—207；〈韩国汉字音gwa中古汉语高口盖韵尾〉，《语学研究》第9卷第1号，1973年6月，第1—26页；日译文在《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7号，1976年1月，第53—74页；"Implications of Anciene Chinese retroflex endings"，*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1, March, 1975, pp. 17—23，修改稿：*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avidian Lin-*

guistics, Vol. V, No. 1, *January*, 1976, pp. 23—31), 使下列一组音发生了变化，从“-ou”（相当于北京音[-uŋ]变成了“-au”（相当于北京音[-(i)aŋ]）：

江，讲，降，虹……日本汉音kau>[ko:]，北京音[tʃiaŋ]

冈，岗，纲，钢……日本汉音kau>[ko:]，北京音[kaŋ]

河野六郎教授的著名论文〈慧琳众经音义的反切特色〉（《中国文化研究会会报》第五期第一志，1955年11月，85—88页），确切地表明这一变化发生在唐朝。如果不假定“江”等字音为kroŋ（即存在介母*-r-），我们就无法说明这一变化。

罗杰瑞教授和梅祖麟教授的假设刚发表时，意义还不十分明显。今天看来，他们正是出色地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从-ou（-uŋ）到-au（-(i)aŋ）的变化是因为“江”、“讲”等字音从前有过-r-介母，因而接受了-r-介母和卷舌韵尾之间的异化作用（其实，事实是跟这个说明相反，请参看上述论文）。

另一方面，“河”确实也有类似的启示。凡与“河”同韵部的字，在《诗经》中往往与带有-n音节的字相押韵。例如“隰桑”篇：

阿——难nan——何

同时在文字谐声方面，也往往用带-n的字来作为这一组字的声符，如

傩*na——难*nan

播*pa——番*p'iuan

只是它们与带-t的字不发生关系。因此，高本汉认为这一组字既不是*-n，也不是*-t或*-d，一定是*-r作为音节收尾辅音。如果仅仅是这一点，那还是*-1更合理。最先提出这一假设的是赖惟勤教授（于中国语学研究会1961年2月第135届关东支部例会上）。他的设想后来从不同的观点、并无直接关系地被蒲立本教授所接受。

另外，“河”字所属韵部的字，在一些现代方言里带有-i收尾音。比如客家话：

我［ŋai］，跛［pai］，簸［pai］

罗杰瑞教授注意到闽语各方言广泛存在着同样的现象，便构拟出闽祖语的如下音节（“The finals of proto-Min”，1970）：

大*dal，破*pal，沙*sal，我*ŋal，麻*m'al

言外之意，可以将“河”与蒙古语的[ɣool]联系起来。不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还是片断的。最近白保罗发表的“古汉语假借”那样宏大的设想（*Genetic Relotionship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Tokyo: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une, 1976, pp.60—100)，跟上述研究很有关联。因此虽说还是片断性的，但不可轻视，今后亦当深切关注。

3.2 否定词的区域性推移

亚洲大陆语言的南北对立和推移，在否定词方面也有明确表现。也在长江一带，北方性的变为不北不南，南方性的变为不南不北。

各语言否定词的语音形式是形形色色的。甚至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也未必一致。日语即为一例，在代表性方言中，比如想使关西方言（he）n系否定词，直接与关东系的nai对应就很不容易。然而从整体来看，还是可以找出不可忽略的、语音形式的区域性共同点和推移的系统。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南方语言绝大多数用暗鼻辅音（声学上所谓钝音grave）：

高棉语	mɯn
泰　语	mây
撒尼·彝语	ma
傈僳语	ma
拉祜语	mâ
临高语	mə

布依语　五十年代调查的39个方言中，30个是mi，9个是mei

壮　语（龙茗〔今属天等县〕方言）　mi

北方却使用破裂音（闭塞音），但也都是钝音：

蒙古语	rvй
满语（文语）	(a)ku
锡伯语	aqu

暗鼻音和暗破裂音的这一对立，在处于中间的汉语各方言里照样有所发现，并在长江流域附近由南方型移向北方型。下表所列，南方方言是成音节的暗鼻音：

广州方言（粤语）	m̩
汕头方言（闽语）	m̩

梅县方言（客家语） m̩

厦门方言（闽语） m̩

福州方言（闽语） ŋ̩

这和中央台语太相似了：

壮语（武鸣方言） m̩

傣仂语 m̩

掸　语 m̩

黑傣语 m̩

因此，有人甚至说这是“区域特征”（John F.Hartmann: “Syllabic m̩ in Tai-Lue and neighboring Tai dialects”, 1974）。一到长江流域，就成为向破裂音过渡的摩擦音：

温州方言（吴语） fu

苏州方言（吴语） fəʔ

再往北，江北不必说，还没过长江，就很快全变成了钝破裂音：

南昌方言（赣・客家语）pət

长河方言（湘语） pu

合肥方言（以下北方言）pəʔ

西安方言 pu

济南方言 pu

北京方言 pu

沈阳方言 pu

东干语 бу

如下表所示，否定词的一些派生形式的南北分界不一定没有上下线：

方言	表示禁止	表示不必要
广　州	m̩ hou/mɐi	m̩ ʃai
汕　头	mai	miŋ eŋ
梅　县	mɔk	m̩ si
厦　门	m̩ t'aŋ	(m)bian
福　州	paiʔ	ŋ nai
温　州	fai	fu hyɔ
苏　州	fiæ	(ioŋ)fəʔzɒʔ
南　昌	mɔt	(iuŋ)pət ts'ɔk
长　沙	mo	pu xan tin
合　肥	pəʔiɔ	pəʔ iŋ
西　安	pau	pu yoŋ
济　南	pie	piŋ/pəŋ
北　京	pie	pəŋ/puyuŋ
沈　阳	pei	puyuŋ
东干语	бу	бу йүн

但是，这种上下线并不影响总的趋势。特别是在与存在动词结合的形式里，除了吴语和一些闽语（不久前，鼻音声母有规律地非鼻音化的方言），其他方言包括北方语，全部变成了鼻音。

关于汉语北方方言绝大多数的［pu］，我们虽然没有与蒙古语的гуй［gui］、满语的(a)ku等作为同源词直接串起来，但想提醒一下，在“区域特征”的类似性这一问题上，它们之间具有非常接近的音形。从发音语音学角度看，双唇音（p）和软腭音（k）相距很远，往往让人觉得似乎很不同，但从声学语音学角度看，双唇音或者软腭音都是第2共振峰紧紧逼近其他共振峰的即所谓“钝音”（抑音）。要说不同特征，前者是共振峰作为整体而分散的“散音”，后者是统一于中心的“密音”。已故罗曼·雅可布逊教授认为p和k的关系，与p和t的关系一样密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Observations sur le classement phonologique des consonne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letio Sciences*. Ghent, 1939）；比他还要早得多，叶甫根尼·波里万诺夫（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для Востоковедных Вузов издания ЦИК СССР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мени А.С. Енукидзе, No. 31. Ленинград, 1928, p.106）；就观察到了日本长崎方言由p向k（w）的变化：

K^{W}′a:roŋ←—pa:roŋ（“飞龙”或“白龙”）

另外，已故桥本进吉博士在《基督教义（Doctrina Christan）》那样的中世纪日语转写资料里，找到了如下的发音记录：

shōgachi(正月)：　xopachi

kenkwa（喧哗）：　quempa

kwashi（果子）：　paxi

kwabun（过分）：　pabum

他把它们与日语博多方言里kwa（qwa）和pa相混同的事实联系起来理解，也是这个原因（《国语音韵史》，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第136页）。印欧语（拉丁语quattuor：日尔曼语*petwor：印欧祖语*kwetwer“4”）、台语（泰语kha：临高话ba“脚”）、闽语（厦门方言tik：遂溪方言tip）、朝鲜语（庆山方言ggwe-yaŋ：金海方言gge-yam“柿的一种”），凡是在不能想象有直接“影响”的语言里，都独立地发生着这样的变化。由此看来，p和k亲近，完全有发声学上的原理，因此很有确切性。说起“直接影响”，比如东干语（原来是北方汉语的一种）“猪”这个词，在其方言里有如下的变异（Aleksander und Katharina Dragunow：“Über die dunganische Sprache”，*Archiv orientální*，Vol.8（1936），No.1，p.33）：

pfu～kfu（猪）

这一现象极有启发性，因为东干语是在阿尔泰语的包围中发展起来的。

这里请注意，p～k的变化和替换，几乎总与后续元音u或半元音w有关。日语的“果子”（糕点）quaxi～paxi，朝鲜语的“柿”ggwe-yaŋ：gge-yam都是这样。至于临高话的ba和泰语的kha，表面上跟u或w没有关系，但安德列·奥德里古博士认为它是由古代唇音化腭音变来的（*Le Vocabulaire Bê*·Publication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Vol.LVII.Paris：Adrien-Maisonneuve，1965，P.138）。在考察北方语否定词pu和蒙古语ΓΥй或满语（a）ku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关于蒙古语否定词ΓΥй的韵

尾ĭ（i），我们得指出，在汉语方言里有过与北方语pu同韵母（从某一个音节里除去声母辅音后的音）而带着韵尾i出现的词，如：

不　　pai（温州）
勿　　fai（温州）
物　　vai（温州）
卒　　tsai（温州）

甚至在北京方言里非常基础的词汇，如：

没　　mei

也有i这样的韵尾。因此，蒙古语γuĭ的ĭ（i）不妨看作是这种韵尾残留的痕迹。中古汉语的韵尾-t（-d），特别是在西北方言里，都很有系统地一律变成了-i，这个现象也可以作为参考：

单词 / 方言	濇	瑟
平凉方言	sεi(ṣiət<ṣiəp)	sεi(<ṣiεt)
西安方言	sei	sei
三水方言	sei	sei
兰州方言	徹tʻεi，拆tεi，舌ṣεi，设ṣεi，热ẓεi	

3.3　否定词的“纵”的变化

亚洲大陆语言的否定词的地理分布特征，如果仅此而已，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把它和古代汉语里的否定词体

系作一番比照，真正的价值就显示了出来。

古汉语的各种否定词的精确功能，不能说完全摸清了。就我们所知，古汉语有如下六个很有系统的否定词：

不*piuə（g）　　弗*piuət　　非*piuə(d)

无(毋)*miuə(g)　　勿*miuət　　微*miuə(d)

一看就很清楚，它们大致可分两类：

（1）双唇破裂音系的"不"、"弗"、"非"；

（2）双唇鼻音系的"无"、"勿"、"微"。

其中破裂音系的"非"和鼻音系的"微"是后起字。甲骨文中没有见到。这两个是名词否定词，其他都是动词否定词，用法上的不同很明显。此外，破裂音系的"不"、"弗"与鼻音系的"勿"、"无"之间的不同，一般认为是语气强度的不同，或者认为带有请求、禁止等命令语气。但最明显的是它们都根据后面的动词带不带宾语来规定用法：如果是"弗"和"勿"，其后接动词不带宾语。故而"弗"和"勿"可以看作是"不"、"无"与其宾语的紧缩形（Angus.C.Graham："A probable fusion word:wuh＝wu＋j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No.14，1952,pp.139-148）：

弗＝不*piuə＋之*tjiə＝*piuət

勿＝无*miuə＋之*tjiə＝*miuət

因此，古汉语的否定词可构成如下的系统（见下页）。

古汉语否定词破裂音系和鼻音系的不同与现代汉语中南北否定词的音形差别，存在着某些形式上的关联，这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认为在古汉语里前者是直接否定，后者是非直接否定，这只不过说着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把

	动词否定		名词否定
破裂音系	不	弗	非
鼻音系	无	勿	微
	单纯形	宾语紧缩形	

“不”当作单纯否定，同时把“无”当作与“有”对立的否定，那么对于“无”用作单纯禁止的例子就难对付了。不知为什么，甲骨文中鼻音系的“勿”字很多，而“无”字则非常少见。原因之一，也许是受甲骨文这种专门记录占卜的文体的限制。但从上述“横”的分布看来，我们难道不可以认为破裂音系和鼻音系就是语言或方言的区别吗？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代语言资料，便是综合了那些异质的语言要素而确立起来的书面语；本来是方言或语言的差别，在这种书面语里却被搅在一起了。当然，带有不同方言背景的要素，一旦被归纳进统一的书面语，就在那个书面语的系统里发生了“分化”，实行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本来不过是方言的不同，由于在各个历史阶段只熟悉一种方言的作者往往按当时的书面语作文章，很可能使两个系统的否定词的用法越来越混杂。这也就产生了利用书面文献，特别是汉字的书面文献进行研究的危险。当时的作者一忘记是方言的差别，就完全有可能在其书面语中“创造性”地使用这些否定词，于是造成了各自不同的用法。

以英语为例（性质虽然稍有不同），有marsh和swamp，dog和hound等成对的词。在后一对里，中世纪以后，hound完全变成了dog，而至今还有foxhound等复合词。因此

现代英国人把dog和hound的差别，都看作是狗，但用途有所不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而marsh和swamp由于没有复合词之类的线索，于是有人认为前者是“海边的湿地”，后者是“河边的湿地”。这是因为法语的“海”为mer，低地德语的“海”为mare；以这些模糊知识为基础，才创造出了如上的“俗词源”。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语法学家有关否定词用法的精细考证。从各个时代的书面语系统中，精细地调查这种语言现象的功能，其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共时研究。然而我们想提请注意，仅仅靠这样的研究恐怕永远也揭示不了问题的实质！

3.4 类别词的本质

在亚洲大陆语言的词汇中，与语言类型特征最有密切关系的，应该说是类别词。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必须先澄清一下什么叫类别词。东方的语言学概论一类书里常可以看到这一类话：类别词“是东方语言所特有的，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所特有的”（如王力教授《汉语史稿》中册，1958年，第234页）。但因为人家不一定清楚类别词在类型上的特征，所以往往会误会问题的实质。

所谓类别词，在普通语言学书里通常指表示数量的“本”和“杯”这样的单位。如日语的satsu（本）和hon/pon（条、根）：

is(一)*satsu*（本） no(的) hon（书）（一本书）

ip（一）*pon*（根） no（的） ito（线） （一根线）

英语的cup和glass：

a *cup* of coffee （一杯咖啡）

a glass of water （一杯水）

在讨论亚洲语言时作这番说明，虽非无益，但仅止于此则可能有害，即往往使人误解事实的本质。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册”（本）或“cup”（杯），在日语或英语里，无论在句法学上还是在形态学上，和表示数量单位的词都毫无区别。假如一定要归类的话，它们在这些语言里都属于“数量词”，而数量词这一词类在任何语言里都有！它们和“斤”或“升”，这类度量衡单位不同在哪里呢？只是在于“satsu（本）”或“cup(杯)”用法有限制，仅能用于类别上可计数的名词。而“斤”或“升”没有这种限制罢了。不过，这还是相当表面的观察。对于这种基于自然界常识的类别，一定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制约。比如下面这句话：

*五升“象”

这么说虽然违反常识，但是，倘若那个“象”不是动物园或马戏团里的，而是塑料制的很小很小的“象”，那么上面的表述也就可以成立了，即不存在这个“象”是否构成个体的问题。同样，用“本”字来说也不是不可能，如：

*一本“象”

只要那个小“象”制成薄板状，装订几片成册的话。

格林教授一派，作为普通语言现象的一个部分而进行

的世界语言类别词研究，恰恰在这个重要的地方有严重的疏漏。按照格林教授的调查，把日语、朝鲜语、泰米尔语都列入了类别词语言，这几种语言的类别词竟有100个以上（"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Proceedings of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Bolognia, 1972, Revised version in the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No.9（November 1972），pp.1-39.）。但是，日语的"类别词"实际上大部分来自汉语，是通过汉字这种表意文字借来的。格林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无论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日语的issatsu（一本）、ippai（一杯）、ippon（一根）等几乎都是汉字词（"一册"、"一杯"、"一本"等）。这一点巴兹尔·张伯伦早已指出过了（*A Handbook of Colloquial Jaananese*, 4th ed.London:Crosby Lockwood and Son, 1907, p.111）。当然，下列由日语固有词素构成的日语"类别词"是有的。

ie（房屋）hito（一）mune（间）

iro（颜色）hito（一）iro（种）

然而，"hito mune"和"hito iro"是汉字"一栋"、"一色"的训读，是借入日语以后产生的二次派生词。日语中如下的词：

hito-*tsu*（一个）　　hito-*ri*（一个人）

大概无论如何不能当作借词吧（顺便提一下，在《佛足石之歌》里tsu是用chi～tsu替换的，如"弥曾知阿麻利布多都"，即mi so chi a ma ri fu ta tsu "32"）。也就是

说，日语的所谓"助数词"（即数量词），大部分很可能是照搬的汉语类别词、数量词。因为日语里没有真正的类别词，就把类别词和数量词这两类词无规则地借来用作了"助数词"。

据我们所知，首先分清类别词和数量词本质差异的，是苏联的汉语学者。例如前面举过的汉语带限定词的名词短语，为了突出问题的焦点，把它简化为如下模式（NP＝名词短语，DEM＝指示词，NUM＝数词，CL＝类别词，N＝名词）：

NP ⟶ （（DEM）Ⅹ（NUM）CL）N

例：　　这　　一　　本　　书

数量词也恰巧出现在这个CL之处，于是成为这样：

这三斤肉

龙果夫举了同音同形的数量词和类别词"把"字来指出它们之间的不同(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1: Части речи.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2, p.46)。"把"字用作数量词，如：

三把盐

"把"字用作数量词时，这数量词自身可加修饰词：

（在手心里抓了）三满把盐

但用作类别词时，可以说：

三把刀子

而不能说：

＊三大把刀子

即使要说"大的刀子"，也只能说"三把大刀子"。

可是稍晚一些，龙果夫自己也发觉类别词并非完全没有

这种加修饰词的说法，例如除了“一所房子”和“一所大房子”的说法外，还可以说：

一大所房子

但这情况和“一群羊”、“一大群羊”不同。这一说法很明显地强调了房子非常大。

然而，类别词和数量词更重要的不同是前面可以直接用指示词。根据上述横式分析，类别词词组可以有如下的扩展：

路
一条路
这 条路
这一条路

也就是说，类别词可以和指示词直接结合，数量词则不能。一个名词短语中，如果没有数词，数量词就不允许直接出现，例如：

肉
一斤肉
*这 斤肉
这一斤肉①

这里我们自然看得出类别词的性质了。说类别词是划分名词

① 在北方一些地方，“这斤肉”似乎可以说；“这袋米”“这斗小麦”肯定可以说，且数词不限于“一”。如：

肉	米
二斤肉	两袋米
?这 斤肉	?这 袋米
这二斤肉	这两袋米

"类别"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名词的意义性、语法性分类的标志，都不过是描写类别词究竟有什么用法。相反，要问亚洲大陆的多种语言为什么必须有类别词，可以回答说，多数是为了给这些单音节语言的名词以某种补充，从而给予象"疤"～"扒"、"牌"～"排"那样同音而不带丰富形态特征的不同类词以一定的"赘言性"（redundancy）。例如有人问：

yào bú yào pái?

我们不知道是"要牌"还是"要排（队）"。有个类别词"块"、"张"或"个"，才明确是"要牌"，而不是"要排"。语言经常需要这类"赘言性"。虽然不是在数东西，例如打扑克时，问"yào bú yào zhang pái?""张"紧接着"牌"。反之，我们谈数量时，一般通过上下文或前后关系，知道要谈的是数量，而且一定出现数词。因为数量词不允许或不需要直接和指示词共现；于是没有"*这斤肉"这样的话，其理由也就可想而知了。数量词毕竟是表示数量的单位，前后一定有数词，不需要起区别同音名词的作用。值得叹服的是，汉语类别词的这一作用远在1928年就被乔治·桑姆索爵士揭示了。他在《日语历史语法》（*An Historical Grammar of Japanese*.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第84页说：

In Chinese the classifiers serve an important purpose in that they help to differentiate homophones.（在汉语中，类别词起着区别同音词的重要的辅助作用。）

他不象是懂得汉语里类别词和数量词有着不同的用法。但是在跟日语数量词的比较中已有了这样的洞察力。桑姆索

如此敏锐的见解，由于是在《日语历史语法》这一枯燥读物里，而且只说了两行，因此长期没有受到同行专家们的顾盼。

3.4.1 类别词分布的区域性推移

上面总结的类别词的根本作用，随着亚洲大陆语言地理类型学方面的考察，更被无可怀疑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

一个语言单音节性强，类别词就丰富多采；复音节性强，类别词就贫乏，即使曾经有过丰富的类别词，其存在也只不过是躯壳而已。单音节性和复音节性的现象，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南北差异是相吻合的。大陆南方的语言，若剔除借用词，几乎全是单音节词：

mean（有） nɛək（人） mɔn（一） nɛək（人） peək（戴） vaenta（眼镜）“有一个戴眼镜的人”——高棉语

cha（父） tôi（我的） già（年老） và（而） ôm（病）“我的父亲年老而生病”——越南语

hu(我) lau（们） mei（有） sip（十）ki（几） kən （类别词） paŋjau（朋友）“我们有十几个朋友”——壮语

北方语言里虽然不一定没有单音节词，但基本上是复音节的，如：

Сувд(舒夫特) зуны（夏天的） амралтаар（利用假期）аавынхаа（自己父亲的） нутагт（宿营地） очиж（去） амрав（了）“舒夫特暑假到父亲的宿营地去了”——蒙古语

manju（满洲） i（的） cooha（军队） mangga（强）“满洲的军队强大”——满语

夹在中间的汉语各方言，越往南，单音节性越强，越往北，复音节词就越多。亚洲大陆北面的阿尔泰语、中间的汉语、南方的台语和一些南亚语言，构成了精彩的语言结构连续体。其界线固然随词汇不同而有所上下，但大致在长江流域附近明显地从南方型移向北方型，如下表所列：

词汇／方言	兔子	翅膀	害怕	模糊
东干语	тузы/тур	бонзы	хэпа	милимала
沈阳	兔子	膀儿	害怕	模糊
北京	兔子(儿)	翅膀儿	害怕	模糊
济南	兔子	翅膀	害怕	模糊
西安	兔子	翅膀	害怕	模糊
合肥	跑山子	膀子	怕	模糊
苏州	兔子	翅膀	怕	糊涂
南昌	兔子	翅膀	怕	濛
长沙	兔子	翅膀	害怕	濛
温州	兔儿	翼膀	发	糊
福州	兔	翼	惊	暮
厦门	兔	翼	惊	雺
汕头	兔	翼	惊	濛
梅县	兔	翼子	畏	濛
广州	兔	翼	怕	濛

汉语各方言的语言分布，忠实地反映出这种从单音节性到复音节性的推移。

在南方的语言里有各种类别词，往北渐渐变得单纯化，而

对没有类别词的阿尔泰语，东干语里就完全变为“躯壳”，只剩下了一个“个”字，正好与上述单音节向复音节的推移形成出色的对应：

语汇 方言	鸡	牛	船	桥	针
东干语	гы(个)	гы(个)	гы(个)	гы(个)	гы(个)
北京	只/个	头/个	只/个	座/个	根/个
西安	个/只	头	个	个	根
济南	只	个	只	座	个
成都	只/个	根/条	只	座	根
合肥	只	条	只	座	根
苏州	只	条	只	顶	根
南昌	只	只/条	只/条	度	根/管
长沙	只	条	只	座	口
温州	头	头	只	座/条	枚
福州	头	头	条	条	条
厦门	只	只	只	践	支
汕头	只	只	只	条	支
梅县	只	头	条	条	枚
广州	只	只	只	度	眼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补充两句。东干语的类别词统一于一个“个”字，因此只不过是躯壳，象是加在名词上的一种标志。但这毕竟还是类别词的情况，而数量词则依然故我地存在着各种形式。人类的生活，虽说太古时代如何不开化，但没有数这个概念是不可能的。所以存在这一现象毫不奇怪。在东干语里数量词并不少，例如：

kyə（棵）——数“树”或“草”，作“一棵”“一

株”时的量词。

жон（张）——数“纸”或“板”等平面状态东西的量词。

只是它们毕竟是数量词，而不是类别词。这一点可由下列用法来区别、确定：因为是数量词，它们能够这么说：

йи（一） куэ（棵） фў（树）“一棵树”

йи（一） жон（张） зы（纸） “一张纸”

也能够这么说：

жы（这） йи（一） куэ（棵） фў（树） “这一棵树”

жы（这） йи（一） жон（张） зы（纸） “这一张纸”

但没有下面这样的说法：

*жы（这） куэ（棵） фў（树） “这棵树”（？）

*жы（这） жон（张） зы（纸） “这张纸”（？）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东干语里的借词。如阿博杜拉赫曼·卡利莫夫先生指出的那样（“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четных слов, счетных суффиксов и ениниц Измер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унганском языке”，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Востоков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No. 12（Языкознание），1955，pp.78—82；“Счетные суффикс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унганском язнке”，*Вопросы Грамматики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Москва-Ленинт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8，pp.82—101），

借用词依旧当数量词用，只限于跟东干语的音位配列（＝音用法phonotactics）相一致的情况，如：

йи（一） жин（斤） йю（油）“一斤油”——来自汉语的“斤”

йи（一） хада（hada） тон（糖）“一磅糖”——来自土耳其语的hada

如果不符合东干语的音位配列，就把那个数量词和名词结合成整体，作为一个名词处理。如：

йи（一）/гы（个）/кило（公斤）/тон（糖）“一公斤糖”——来自俄语的кило。

这个例子明确显示出，类别词和数量词属于完全不同的语法·词汇学范畴。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表中有关东干语以外北方汉语使用的“个”。一个语言在书面语里已经建立起来的规范，和该语言在实际使用时的语言形式之间往往有差别。比如北京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要是问“这鸡”或“那牛”该怎么说，回答必然是：

这只鸡，这两只鸡，这三只鸡，……

那头牛，那两头牛，那三头牛，……

因为我们学过规范的现代汉语，已经习惯于说“鸡”的类别词是“只”，“牛”的类别词是“头”。但是，实际上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却是这么说的：

这个鸡，这两个鸡，这三个鸡，……

那个牛，那两个牛，那三个牛，……

所以一般语法书就承认了这个事实，说“只”或“头”也可以用“个”替换。因而上表所揭示的仅仅是“个”在北方方

言中可能出现的最低限变。① 就拿济南方言来说，应该这样理解表上的记录：问到“鸡”，虽然能说“个”，但因为问的是“鸡”这个词特有的类别词，所以表上列了“只”；而关于“牛”，甚至连这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即使问起特有类别词，也已经只有一个“个”字了。

关于这一点，俞敏教授有极深刻的实验报告（〈评R.A.D.Forrest：The Chinese Language〉，《燕京学报》第36期，1945年6月，第320页）；已故龙果夫教授也引用过它（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1：Части，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2，p.52，汉译本：语言学丛书《现代汉语语法研究．I：词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2页）。俞教教授问了20个北京出生的人，叫“尾巴”是一条尾巴（“条”字跟的名词如“路”、“铁路”、“光线”、“虹”、“西裤”、“围巾”、“绳子”、“带子”、“凳子”、“板”、“棍”、“褶痕”、“蛇”、“眉毛”、“生命”等等被认为是细长的东西）呢，还是一根儿尾巴（“根（儿）”跟的名词如“棍棒”、“线”、“柱”、“毛发”、“胡子”、“卷烟”，“火柴”等等表示细长而一定是带圆状的东西）呢？毋庸惊诧，20个人中居然有19个人回

① 反映六七百年前北京话的《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中，“个”的使用率比现代高，如“马、山”等，多以“个”计。又，今晋中与北京话“个”相当的通用量词xuai，比北京话的“个”使用范围还要广，北京话计整体物件的专用量词，晋中径用xuai，虽然可以用专用量词替换（而不是可以用xuai替换专用量词）。参见胡双宝《文水话的量词、代词和名词》，《语文研究》1983年第一期。

答：

一个尾巴

从这一点可以窥知，口语里大部分类别词的用法，跟不同程度上规范化的书面语有很大不同。

问题不单单是高度保守的书面语和在其语言环境中独立发展起来的口语之间的不同。在中国，现代书面语本身就并不古老。努力用白话文写东西还只是本世纪以来的事。当然，原来也曾流行过中世纪以来的所谓“白话”文学；为了确立现代书面语，近代知识分子着意模仿它。但是，“白话”的传统如果追溯到2～3世纪的话，距离可就非常大了。因此，在口语里——特别是北方话——发生巨大变化，而类别词统一为“个”字，就不能不认为存在着外在原因——白话文学以外的原因。

3.4.2 类别词的“纵”的变化

上边讨论了亚洲大陆语言类别词的多样性的“横”的推移，我们仍然把它与历史性的“纵”的演变加以对照。——与否定词的情况一样，“横”的推移模式为证实“纵”的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提供了极为精彩的线索。

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看了“横”的区域性推移的模式，大家肯定会产生下面的想法：在北方，类别词种类减少的极限就算是东干语的“个”吧。再往北一点就是不具有这里所指的类别词的阿尔泰诸语了（但数量词是不同的——它在哪种语言里都缺不了）。事实上，已故龙果夫教授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东干语是完成了汉语（这里所说的“汉语”，实际是指北方话）类别词统一

为“个”的语言。他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手帕”和“手巾”，由于北方语都用“手巾”一个词来表示，所以现代汉语充分发挥上文阐述的类别词的功能，便用不同的类别词表示这两个词的不同。如：

这块手巾（“块”跟的名词如“石头”、“方糖”、“地毯”、“地”、“瓦”等表示不论立体或平面，而形成四方形的东西）

这条手巾（“条”跟的名词，上文已述，是指整个儿细长形的东西）

如果统一用了类别词“个”，不就没有区别了吗？东干语便适应了这种状况，它在作“手帕”意义用时就加上指小词 -зы（子），从而加以区别：

жы（这）/гы（个）шу/жинзы（手巾子）“这块手帕”

жы（这）гы（个）шу/жин（手巾）“这条手巾”

比北方汉语更北的，如上所述可以说是只有数量词而无类别词的语言（阿尔泰语）了。那么南方语又怎么样呢？要是类别词的多样性达到顶点的话，具体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回答很简单，即每个名词都具有它的类别词——具有与不同名词一样多的无数个类别词。而我们在古汉语文献里确确实实见到了这种状况。

在汉语文献中可见到的最古老的类别词结构，是名词自身重复来作类别词的。如甲骨文：

羌百羌　　“一百个羌人”

人十有六人“十六个人”（这个“有”也可读作

"又"，但因与本题无关，暂从一般读法）

又如周初的金文：

玉十玉　　"十块玉"

田十田　　"十块田"

最初的结构是起首的名词作被修饰词，后面接数词和类别词，在当时，类别词是名词的重复，所以应该说类别词的数量和名词的数量一样多。因此非常烦琐，当然希望把这种重复用的名词归纳为一定的类。何况在甲骨文中还有与此并行的数量词结构，如：

车卅两　　"三十辆车"

马十匹　　"十匹马"

所以这种"类别词名词"的类别化、抽象化是很容易产生的。于是，第一步便采取重复被修饰名词或复合名词的主要词干的办法：

孚人十有五人　　"十五个俘虏"

孚牛三百五十五牛　　"捕获的三百五十五头牛"

至此已接近比如用"人"来归纳人的类别的数法了。如：

羌十人　　"十个羌人"

妇好三千人　　"三千个女人"

这样，到了先秦时代，已出现如下的类别词（王力教授《汉语史稿》中册，第236～237页）：

匹——"马"的类别词

乘、两——"车"的类别词

张——"帐篷"的类别词

个——"矢"的类别词

这种类别词在汉语里真正完善起来，语法学家们有的说在汉（206年B.C.～220年A.D.）以后（王力教授，前书，第237页），也有说是魏晋南北朝（220～589年）时代（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又据最近研究，认为是公元3—4世纪间（Изабелла С. Гуревич. 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Ш－V В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аука》，1974）。

另外，张琨教授针对笔者有关汉语类别词发生的观点，指出甲骨文中"牛五牛，羊卅八羊"等说法，也可能是这样的用法：好象现代汉语或日语记帐那样，把数量词以同格的形式放在名词之后：

书，三本

铅笔，五根儿

如果考虑到甲骨文不是谈话的实录或复述思想的日记，而是记载占卜的文句，这是充分而有力的驳论。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古汉语存在过修饰词后置于名词的短语结构，而且同位名词的词序也有如"父甲""父乙"等一般名词在前专有名词在后的排列。黄伯荣教授又报道，在现代西北汉语（如兰州方言）里数词"一"和类别词一律接在中心名词之后（〈兰州方言概说〉，《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第85页）。这并不是说现在西北的汉族是从西北来的周人的直接后裔。但这一切会使人产生别的想法。何况还有如下省略了数词"一"的短语形式：

贝朋　　"一朋贝"（据王国维说，五只贝串连为一"朋"）

璧珏　　"一珏玉"（五块玉串连为一"珏"）

实际上就是“贝一朋”、“璧一珏”。戈登·B·唐纳教授指出，先秦文献里有“箪食”“壶浆”的说法。这正是王力教授已叙述过的（见前引书240～241页），认为类别词或数量词前置于名词的倾向，在汉以后逐渐多起来。但同时引人注意的是，先秦时代这种类别词或数量词放在名词前的例子，大多只限于数词是“一”的场合。如《孟子》中：

一箪食，一瓢饮

一箪食，一豆羹

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

为什么说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台语中能看到意味深长的现象。台语限定词词序平常见到的是如下顺序：

名词＋类别词＋数词

只有在数词“一”时，才构成如下词序：

类别词＋名词＋数词

然而比这些零碎证据更为重要的，而且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语言地理类型理论的事实是：结构上符合上面所描写的类别词发生和发展范例的语言现象，原封不动存在于南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典型例子，在位于云南高原长江最上游形成N形的地带，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语中可以看得到。

纳西语与其他藏缅语一样，名词短语派生为下列模式：

NP ⟶ N（（DEM）（NVM）CL）

这个CL，实际上是名词中心词的同形反复，跟我们在甲骨文里见到的“羌百羌”一模一样：

$k'ɯ^3$（线）

k'ɯ³(线)tʂ'i²(这)k'ɯ³(线) "这根线"

k'ɯ³(线)ḍɯ²(一)k'ɯ³(线) "一根线"

k'ɯ³(线)tʂi³(这)ɲi²(二)k'ɯ³(线) "这两根线"

藏缅语的语言学家(特别是缅甸语语言学家)就从下面的形式出发:

θiʔ piŋ(树)da(一)biŋ(树) "一棵树"

sā ouʔ(书)da(一)ouʔ(书) "一本书"

名词的词干好象"回声"一样地出现,于是命名为"反响型"类别词(詹姆斯·马蒂索夫叫它"自动型类别词"(auto-classifier);参阅*The Grammar of Lahu*,Unir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Vol.75,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89)。这简直就是太古或上古汉语类别词短语的构成法。由此可以看出,藏缅语族的限定词构成法,在亚洲大陆各语言类型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性演变这一展望中的重要地位。

不仅这方面与甲骨文类别词结构一致。纳西语的词几乎全都是单音节的。一旦由复音节的借用词或词组充当类别词短语的中心词时,和甲骨文情况一样,其中的一个词干就象"回声"一样重复出现。如:

tsœ⁴-tsi²(桌子,借自汉语)tʂ'i²(这)tsœ(桌) "这张桌子"

ʐər²(柳)-ndzər³(树)tʂ'i-²(这)ndzər(树), "这棵柳树"

gi⁴(小)-k'ə²(河)tʂ'i²(这)k'ə²(河)"这条小

河”但是也发展着一般的类别词：如果指动物，不管是人还是鱼或虫等包括一切动物，都以-mɛ²1作为类别词形式：

çi²（人）tʂ'i²（这）mɛ²（CL） “这个人”

la²（虎）tʂ'i²（这）mɛ²（CL） “这只虎”

kœ²（雁）tʂ'i²（这）mɛ²（CL） “这只雁”

p'y²（蜂）tʂ'i²（这）mɛ²（CL） “这只蜂”

ŋi²（鱼）tʂ'i²（这）mɛ²（CL） “这条鱼”

总而言之，纳西语是一种有趣的语言。我们从中看到了汉语历史中类别词的“纵”的演变和在亚洲大陆从南到北“横”的推移的标本。在这里，我们好象看到了亚洲大陆语言原始结构的一部分。

第四章 音韵结构的推移

4.1 音节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一旦接触到语言结构最表层的音韵系统，其区域性连续推移的面貌便更加明显。这里我们就讨论一下各种语言的音韵，特别是关于音节结构和重音的问题。

首先，关于音节结构，若C为辅音，V为元音（包括复元音），南方诸语言一般都具有CVC结构，如：

缅甸语：

$$(C)V \qquad (C)V\left\{\begin{matrix} m\\ n\\ \text{ɲ}\\ \text{ŋ} \end{matrix}\right\} \qquad (C)V\left\{\begin{matrix} p\\ t\\ s\\ k\\ \text{ʔ} \end{matrix}\right\}$$

高棉语：

$$(C)V \qquad (C)V\left\{\begin{matrix} m\\ n\\ \text{ɲ}\\ \text{ŋ}\\ l \end{matrix}\right\} \qquad (C)V\left\{\begin{matrix} p\\ t\\ c\\ k\\ s \end{matrix}\right\}$$

越南语：

$$(C)V \qquad (C)V\begin{pmatrix} m\\ n\\ \text{ɲ}\\ \text{ŋ}\\ \widehat{\text{ŋm}}\end{pmatrix} \qquad (C)V\begin{pmatrix} p\\ t\\ c\\ k\\ \widehat{kp}\end{pmatrix}$$

台语的大多数：

$$(C)V \qquad (C)V\begin{pmatrix} m\\ n\\ \text{ŋ}\end{pmatrix} \qquad (C)V\begin{pmatrix} p\\ t\\ k\end{pmatrix}$$

韵尾都带有人类语言中被看作主要辅音群的鼻音，以及和鼻音发音部位一样的闭塞音(内破音)。相反，北方语言如锡伯语，大部分只是CV，唯一例外的是CV_N（服部四郎・山本谦吾：〈满语口语的音韵系统和结构〉，《语言研究》第30号，1956年9月，第1—29页）。

不过，这里讨论的是音韵（音位）问题，而不是各个具体的声音问题。因为这里提到的“音节”，毕竟纯属音韵学上的概念（但并不是说音节中完全不存在声音事实，而是说，仅仅从声音现象的特征上给音节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各种语音学著作中音节的定义怎么也说不清，正是因为通常对音节缺乏音韵学的理解）。且看一下满语文言的拼音：

abka	天	akta	阉
amtan	趣味	alban	事务
arga	计策	asha	翼鳍

在一个词的中间，闭塞音（浊音和清音）、鼻音、边音、颤音、摩擦音等各种辅音，似乎可以象上举各例那样出现在音

节末尾。但是我们来看看锡伯语中对应的词：

afəga	天	aqətə	阉
amətən	趣味	aləvan	事务
arəhə	计策	asəhə	翼，鳍

我们发现，除了出现在音节末的-n以外（参看下面的例词），都成了CVCV……结构。因此满语文言的拼法不一定十分可靠，不能确信它代表满语的真正语音：

满语		锡伯语	
amba	:	aɴbuu	“大的”
anja	:	aɴju	“犁”

蒙古语的音节结构需要另作研究。但北方诸语的音节类型，在日语或朝鲜语里也能看到一些。日语动词的“neru”（睡觉）和“niru”（煮）有如下屈折变化：

ne- nai (睡)(未然形)	（不睡）	ni- nai (煮)(未然形)	（不煮）
ne-masu (睡)(连用形)	（要睡）	ni-masu (煮)(连用形)	（要煮）
ne- ru (睡)(终止形)	（睡）	ni- ru (煮)(终止形)	（煮）
ne- reba (睡)(假定形)	(假如睡)	ni- reba (煮)(假定形)	(假如煮)
ne- ro (睡)(命令形)	(睡吧)	ni- ro (煮)(命令形)	（煮吧）

反之，yomu（读），kaku（写）的变化是这样：

yomanai	（不读）	kakanai	（不写）
yomimosu	（要读）	kakimasu	（要写）

yomu	（ 读 ）	kaku	（ 写 ）
yomeba	（假如读）	kakeba	（假如写）
yome	（读吧）	kake	（写吧）

其词干和词尾切分成为：

yom- anai （读）（未然形）	（不读）	kak- anai （写）（未然形）	（不写）
yom- imasu （读）（连用形）	（要读）	kak-imasu （写）（连用形）	（要写）
yom- u （读）（终止形）	（ 读 ）	kak- u （写）（终止形）	（ 写 ）
yom- eba （读）（假定形）	（假如读）	kak- eba （写）（假定形）	（假如写）
yom- e （读）（命令形）	（读吧）	kak- e （写）（命令形）	（写吧）

那么我们就能把屈折的词尾抽象于下：

未然形	-anai	（不）
连用形	-imasu	（将要）
终止形	-ru	（现在形词尾）
假定形	-reba	（假如）
命令形	-ro/e	（命令形词尾）

由于yom-ru（读）kak-ru（写）这样的动词里，日语的音位配列（音用法）不允许＊-mr-或＊-kr-那样的复辅音结合，所以解释为出现了下列的共时变化：

yom-ru ＞ yom—u	kak-ru ＞ kak—u
yom-reba＞yom—eba	kak-reba＞kak—eba
yom-re ＞ yom—e	kak-re ＞kak—e

因为日语的假名是音节文字（CV），不能标出象 yom，kak 等音位结合体，在表记上就完全掩盖了上面那种日语动词的形态学的切分。但这种掩盖是有道理的：这是根据音位配列的制约才产生的音节结合（如yom-ru>yom-u），于是 CVC-V（yom-u）成了CV-CV（yo-mu）。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为假名是最能表现日语表层语音组织的音节文字。

朝鲜语也有类似的现象。朝鲜语的助词-neun（提示主题），如果它前头的词的韵尾是元音，就原封不动地接在后面，如：

namu（树）-neun（提示主题）

gaji（枝）-neun（提示主题）

如果前头的词的韵尾是辅音，为了避免辅音＊-rn-、＊-pn-的组合，助词词头的n就脱落，照样把CVC—CVC变成了CV—CVC。例如：

pur（草）-neun（提示主题）>pur-eun>pu-reun

ib（叶）—neun（提示主题）>ib-eun >i-beun

总之，朝鲜语也根据它的音位配列原则的制约，要避开一定的复辅音组合，结果使语音组织的最表层变成了 CV-CV……结构。在现代朝鲜语里，能单独发CVC音的 Chaeg（书）和 nun（眼）等，一伴随元音出现（如提示主语的格助词i），发音就变成如下那样：

Chaeg-i>Chae-gi（书）　　　　nun-i>nu-ni（眼）

这跟不照CVC-V切分而被看作CV-CV的趋向有密切关系。可见一些北方语言的CV性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再说具有南北广大区域和众多人口的汉语，也显示了这

种从南向北的有趣的逐步推移。从南向北主要方言里的音节结构，表现如下。

粤语（广州方言）：

$$(C)V \qquad (C)V\begin{pmatrix} m \\ n \\ \text{ŋ} \end{pmatrix} \qquad (C)V\begin{pmatrix} p \\ t \\ k \end{pmatrix}$$

客家语（梅县方言）：

$$(C)V \qquad (C)V\begin{pmatrix} m \\ n \\ \text{ŋ} \end{pmatrix} \qquad (C)V\begin{pmatrix} p \\ t \\ k \end{pmatrix}$$

闽语(厦门方言)，〔只是厦门话的元音鼻化和〔ʔ〕，属于跟m、n、ŋ、p、t、k等有别的层次〕：

$$(C)V \qquad (C)V\begin{pmatrix} m \\ n \\ \text{ŋ} \\ (N) \end{pmatrix} \qquad (C)V\begin{pmatrix} p \\ t \\ k \\ (\text{ʔ}) \end{pmatrix}$$

赣语（南昌方言）：

$$(C)V \qquad (C)V\begin{Bmatrix} n \\ \text{ŋ} \end{Bmatrix} \qquad (C)V\begin{Bmatrix} t \\ k \end{Bmatrix}$$

湘语（长沙方言·双峰方言）〔在长江流域这一带，闭塞音消失〕：

$$(C)V \qquad (C)V\begin{Bmatrix} \text{ŋ} \\ N \end{Bmatrix}$$

吴语（苏州方言）：

$$(C)V \qquad (C)V\begin{Bmatrix} N \\ \text{ʔ} \end{Bmatrix}$$

北方语（西安方言·济南方言）：

$$(C)V \qquad (C)V\begin{Bmatrix} ŋ \\ N \end{Bmatrix}$$

北京方言·沈阳方言：

$$(C)V \qquad (C)V\begin{Bmatrix} n \\ ŋ \end{Bmatrix}$$

东干语：

$$(C)V \qquad (C)V_N$$

在南方，和台语一样，词尾（韵尾）不仅有{m}、{n}、{ŋ}之类鼻音，而且有同部位发音的闭塞音；但是，向北推移，种类减少，至最北的东干语终于只有一个中性鼻音。这就是说，由南向北推移，不同音节的数量逐渐减少。

4.2 声调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与音节结构的区域性推移相平行，音节音调（声调）的数量随着由南向北的移动而减少。如果韵尾的鼻音和闭塞音不当作声调的不同奏法（performance），那么贵州·广西的侗语有十五个声调：

第 1 声　高平连奏音调（55）
第 2 声　高升连奏音调（35）
第 3 声　低平连奏音调（11）
第 4 声　中降升连奏音调（323）
第 5 声　低升连奏音调（13）
第 6 声　低降连奏音调（31）
第 7 声　高降连奏音调（53）

第 8 声——高升降连奏音调（453）
第 9 声——中平连奏音调（33）
第10声——高平断奏音调（55）
第11声——高升断奏音调（35）
第12声——低降断奏音调（21）
第13声——中升断奏音调（24）
第14声——低升断奏音调（13）
第15声——中降断奏音调（31）

（第12声也可以看作低平断奏音调；第15声也可相应地看作低降断奏音调）。

云南东南部台语之一剥隘语有十个声调：

第 1 声——高升连奏音调（24）
第 2 声——高平连奏音调（55）
第 3 声——低平连奏音调（22）
第 4 声——中降连奏音调（31）
第 5 声——中高平连奏音调（44）
第 6 声——中平连奏音调（33）
第 7 声——高平断奏音调（55）
第 8 声——低平断奏音调（22）
第 9 声——中高平断奏音调（44）
第10声——中降断奏音调（31）

壮语（龙茗方言·龙州方言）变为八个声调；粤语（广州方言）也是八个声调：

第 1 声——高平连奏调（55）
第 2 声——低降连奏调（21）
第 3 声——高升连奏调（35）

第 4 声——低升连奏调（23）
第 5 声　中平连奏调（33）
第 6 声　低平连奏调（22）
第 7 声　因元音长短而分中平或高平断奏调（33/55）
第 8 声　低平断奏调（22）

随着向北而声调减少：

客家语　陆丰方言7个声调；梅县方言6个声调
闽　语——厦门方言7个声调；福州方言6个声调
南昌方言　6个声调
长沙方言　6个声调　双峰方言　5个声调
吴　语　苏州方言4个声调
北方语——西安方言4个声调，济南方言4个声调，北京方言4个声调，沈阳方言4个声调，黑龙江虎林方言3个声调、宁夏中卫方言3个声调。
东干语——亚力山大罗夫卡方言、伊尔德克方言——单调发音时3个声调，只是在形态音韵学上4个声调。

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在长江流域一带连奏音调和断奏音调的对立也消失了（例外的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夏国故地、春秋时代王朝的繁荣地区——今山西省的晋方言；参阅拙作〈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究〉，《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12号，1976年11月，11～58页）。另外，与阿尔泰语接触最久的东干语，声调数量最少（请注意，甚至连日语那样的音高重音语言里，只要是双音节词，也能区别三种左右音调，如

báshi（箸'筷子'）[5-1]：hashí（桥）[1-5]：hashi（端'边缘'）[3-3]①）

4.3 词素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上节关于音节结构和声调系统从南往北的简略化的讨论，实际上与前面论述过的词的从南往北单音节性到复音节性的推移，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密切关系。

塞缪尔·M·威廉斯在《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üan-yin*。改订版，通州，1909年）第92～97页刊载的〈圣谕广训〉的方言对译，非常具体而简明地显示了这一点。内容相同的句子，译成音节结构最复杂的粤语（广州方言）最短（即包含的汉字数最少），译成北方汉语（汉口方言）最长。现稍举一些数字，以提供必要的数理论证。据赵元任教授调查（*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粤语的广州方言约有1800个不同的音节单位（syllabeme）；北方语的北京方言，只有约1277个（虽以一个语言的共时现象为对象，但只能用概率大致说出该语言的音节单位数，因为除个人语言特点不同外，是否包括某种语助词、感叹词、拟声词，划分到哪里为止，则因人而异；另外，北京方言还有所谓卷舌韵尾的音节，这里看作带小称后缀{r}的音节而不另计数）——总之，减少了将近30%。由此可以理解，北方汉语的词怎么能不发展复音节性呢？

即使如此，实际上这个比较也不太公平。因为现代粤语

①原文以点线表高、中、低，为方便计，改以5、3、1依次表示高、中、低。下同。

只是作为口语而存在，并不具有精练的书面语；北方汉语所谓的北京方言或北京话，因为不是指北京的土语，实际是指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高度标准化的书面语。如果粤语也象这里所说意义的北京话那样，发展成为传播现代文化艺术的文学语言，那么上列比率的差距当会更大。

更公平的比较，则是“纵”的比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述音节结构单纯化和单词复音节化这一“横”的推移，实际上正是古代至现代汉语的“纵”的演变的反映。而遗憾的是缺少充分的历史资料，研究也不全面，殷周时代和现代的历史比较，拿不出科学的数据。不过六、七世纪以后和现代的比较，提供的数据有一定的可靠性。公元601年陆词（法言）编的韵书《切韵》所反映的隋初（六世纪末）标准语（虽然不能认为就是当时的口语，但至少可以说是在当时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颇能正确发音的书面语），就有3607个不同的音节单位(1007年改订增补《切韵》后的《广韵》，是3877个）。因此音节的数量，到现代北京话实际已经减少到将近三分之一。这自然要引起急剧的复音节化了。请看如下身体名称部分的基本词汇：

词义	古代	广州	北京
头	首	头壳	脑袋瓜儿
额头	额	额头	脑门子
指头	指	手指	手指头
膝头	膝	膝头哥	膊楞盖儿

汉语构词法的发展，特别是北方的复音节化，与因音节结构简化而来的词形的赘言性（redundancy）有很深的关

系。同样是跟身体有关的词，动词就不大变化，即使变化也多数照样是单音性的：

词义	古代	广州	北京
看	视	睇	瞧
闻	臭	闻	闻
吃	食	食	吃
喝	饮	饮	喝

尽管动词会有同音词，但因为在普通句子里，大多带上“体”的标记或宾语成分等，在与它们的结合中可以保持单音性，故而象“来”、“去”、“打”等基本动词，不管是“纵”还是“横”，几乎都不发生变化。

4.4 超语段音位的区域性推移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在语言的语音系统中属于最表层的音高重音、加重重音等所谓“超语段音位”（supra-segmental phoneme）。这些音位自然既容易取得区域性变异，也容易接受“影响”，同时也容易给予“影响”。

在这方面，亚洲大陆语言的南北不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南方单音节语言的各个音节或多或少具有声调（乐调重音），而北方复音节语言的每个词（严格地说是音位词或音位短语phonological word或phrase）具有强度的模式（力重音dynamic stress或加重重音stress accent）。前者一般称为声调语言，后者称为重音语言。可是到了本世纪，不仅进行历史语言研究，而且开展了现实语言的研究，如道格拉

斯·比奇那样的学者，把音调不同构成不同词汇的语言都当作声调语言（“The science of tone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Bantu languages”，*Bantu Studies*，Ⅱ-2，1924，pp.75—106）。于是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尤其是我们已经知道日语的重音基本上是音高（pitoh）的问题（即使如此，也不是说日语的重音只用音高来决定；这一点，我们只要指出在不送气音节里也能感到一定的“重音”，就足以说明了），同时，阿尔泰诸语里，无论突厥语族、蒙古语、通古斯语，还是朝鲜语，词都采取一定的音调形（参阅Nicholas N.Poppe：*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Ural-Altaische Bibliothek，XIV．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65，pp.180—181）。于是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探讨从前称之为音高重音或加重重音的现象在音韵学上的性质。不明确这一点，今天就将真正成为落在时代后面的类型学了！

4.4.1 音调重音音韵学

由于语言的不同，把音调同样看作有意义的语音，其用法也各式各样。比如英语说：

（1）He is coming！　他来吧！

（2）He is coming？　他来吗？

北京话说：

（3）Tā gǎn mà？　他敢骂？

（4）Tā gàn má？　他干吗？

在句末添了下降音调〔（1）和（3）〕和上升音调〔（2）和（4）〕，而造成不同的句子。但是英语句末音调上升与下降，coming仍然是“来”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化。可汉语升

调的má（吗）是疑问词“什么”，降调的mà（骂）与má毫不相干，是动词“骂”。也就是说，英语的升调、降调只是加于整个句子的句调要素；汉语升调的má、降调的mà差不多相当于英语mar（损伤、弄坏）和bar（酒吧间、栅栏）的不同。总之，汉语每个音节的音调模式起着象m或b那样的构词音段作用。因此，布龙菲尔德把语音单位分为m或b那样构词的“主音位”（primary phonemes），以及在单词发音时如coóntrast（名词“对照、对比”）～contráast（动词“对照”）那样改变强度重音能稍微改变整个词（或整个句子）意义的“次音位”（secondary phonemes）；英语的重音为次音位，汉语的就称为主音位（*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33, p.109）。

如果一些语言里的音调用法有英语、汉语那样的不同，那问题就简单了。但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亚洲语言中，音调用法不很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故而在观察亚洲大陆语言超语段音位结构的区域性推移之前，想先以至今研究还不多的朝鲜语为例，弄清它的超语段音位的语音学现象的情况，底层有哪些规律，在句法结构里怎样出现及参与什么作用，等等。

4.4.2. 朝鲜语词音调的区别性特征

朝鲜语向来被认为是有“声调”的。特别是在用15世纪制定的“汉格尔”① 写的“中期朝鲜语”文献里，通过加“旁点”来表示：（1）平声无点（不加点），（2）上声两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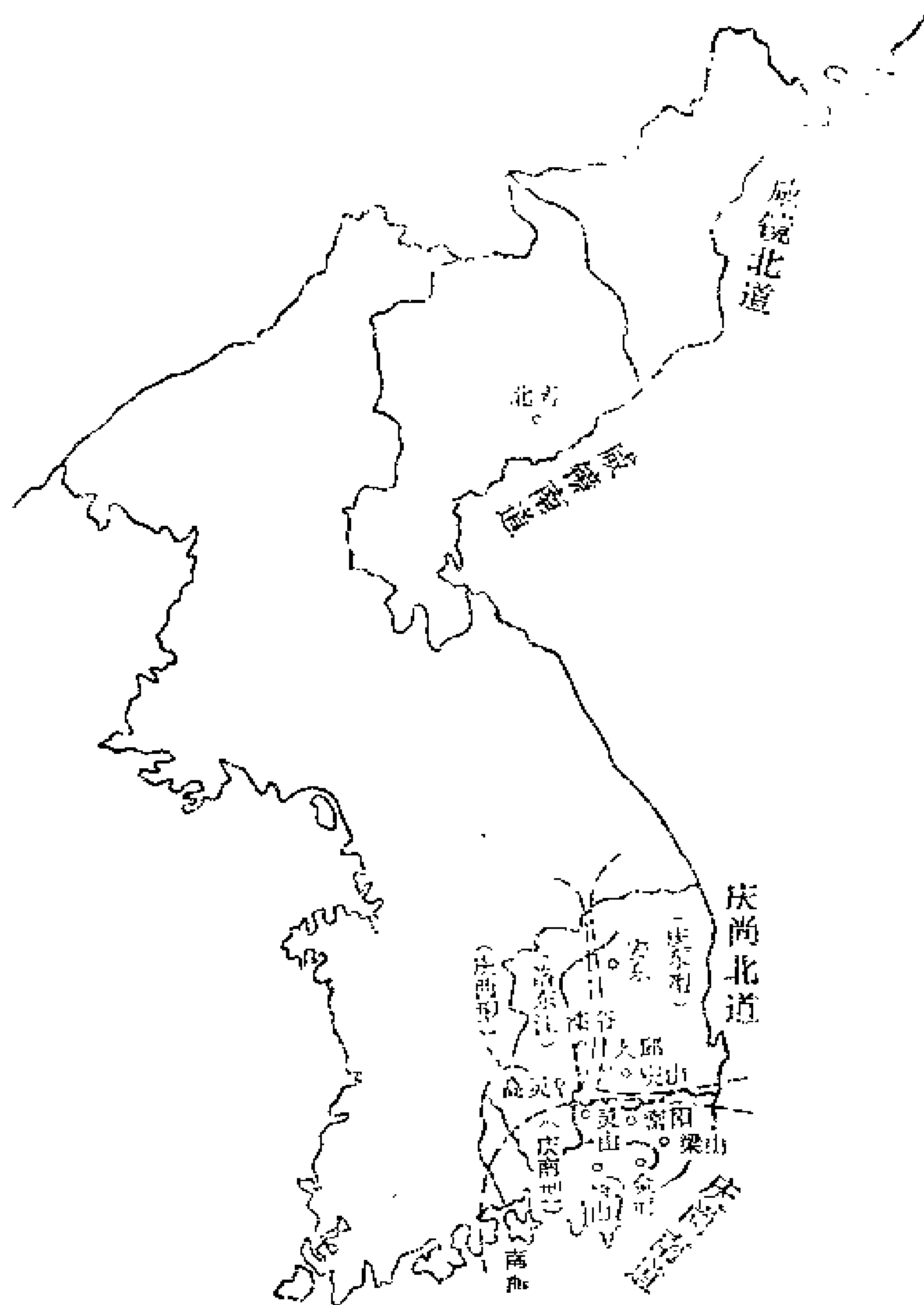
① “汉格尔”是朝文한글的译音，意为“伟大的文字”，古称“谚文”，是与当时的规范文字“汉字”相对的通俗文字。

（3）去声一点（入声音节因为末尾是闭塞音，在朝鲜语里与其说是音调不同，不如说是发音方法的不同）。最早阐明这种“旁点”的音形和形态意义的，是河野六郎博士的＜关于諺文古文献的声点＞（《朝鲜学报》第1集，1951年5月，第93—140页）。

另一方面，朝鲜半岛东南部，特别与庆尚道及其邻接地区（离日本最近的部分）的语言很早就发现有重音（后来据报道，半岛北部的咸镜道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如果认为那是朝李时代为加强守备，有计划地使庆尚道居民移住咸镜道，对此就不会惊奇了）。对庆尚道方言这种音节高低的音调进行实际描写和分析，并通过比较对应而弄清中期朝鲜语“旁点”所反映的语言现象的实际的著作，那是许雄博士的＜旁点研究——庆尚道方言声调wa eui比较＞（《东方学志》第2辑，1955年12月，第37—194页）。

这样，中期朝鲜语或现代庆尚道方言音节音调的语音学实体，逐渐明白了。对它在音韵学上的作用，第一个试作系统阐述的是郑然粲教授（＜中世声调wa庆尚道方言声调eui比较＞，《Hangeul学会50dol记念论文集》，1971年12月，第29页—46）。郑教授据文孝根教授的描写，很快认识到庆尚北道的大邱方言重音的音高特征（＜大邱方言eui高低长短＞，《人文科学》第7辑，1962年6月，第53—104页）的重要性，于是把音节音调的特征归为高低两级的系统。

不过，仅据这一点还不足以阐明从现代朝鲜语方言所观察到的超语段音位特征的音韵作用。为什么呢？自崔铉培教授的*U-ri Mal-bon*（我们的语法）（初版1929年，再版，Seoul：正音社，1953年）以来，人们报道的都是如下三类



第十图　朝鲜语方言地名图

单音节词的对立：

例词 / 音调	말	손	배
高	mal（马）	son（客）	bae（梨）
中	mal（斗）	son（手）	bae（腹）
低	ma:l（词）	so:n（孙）	bae:（倍）

诚然，中调可以解释成高调要素和低调要素的结合；据此，作为区别词义的要素或许可以归为高低两级的对立。但是遇上复音节，例如庆尚北道的庆山方言如下的声调，该怎样处理才好呢？

beon - gae（电光）——平调

ha - neul（天空）——降调

ba - ram（风）——升调

如果把它们写成这样：

beon - gae——高＋高

ha - neul——高＋低

ba - ram——低＋高

这只不过是对这些词的音调极粗糙的语音描述，还没有对"beon-gae:ha-neul:ba-ram"作出语言学上的分析和音韵学上的处理：这三个词之间音节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呢？它们的区别性在哪里，又如何区别呢？什么才是它的赘言性特征，它又在这些双音节音调的什么地方呢？

在前面举的一组双音节词里，我们得再添一个相对立的双音节词。这样做，也许使问题过于复杂了。但我们觉得还

是有必要考虑一下：

jae—bi（燕子） --升降调

庆尚北道方言里，jae—bi（燕）或gae—mi（蚁）这类词的第一音节里出现一个长元音。也许正因为它们是长元音，必须作特殊处理。假定我们固执于通常所谓的“音节”这个单位，那么尽管包含长元音，但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双音节性质，所以不得不把jae-bi这类词放在这里一起考虑。倘若我们把jae-bi（燕）或gae-mi（蚁）的音调描写成：

低＋高＋低

那么这些词就跟下列三音节单词的音调变得一样了：

go-sa-ri（蕨菜）-- －低＋高＋低

gwang-ji-ri（竹箱）-- 低＋高＋低

因此说，在jae-bi或gae-mi的第1音节里“低＋高”这个调位成立的话，那么煞费苦心建立的两级系统也就崩溃了。这首先使我们明白了，在音节中光抱住“两级系统”这一类抽象概念，还不能作出庆尚道方言音调的音韵处理。

从音韵学角度看，朝鲜语的重音首先是各个词固有的音调特征（specification）。准确点说，是构成一个语言的句法结构的各个单位的音调特征（这里所谓“单位”，有时相当于词素，有时相当于复合词，但无论如何是个词汇单位，用它可以最合理地说明该语言的句法结构）。就我们目前所知（以庆尚北道的庆山方言的体词情况来说），构成每个词韵律上的单位（即短音节）能概括如下：

（1）有没有音调上的标记；

（2）若有标记，是第几短音节有标记。

4.4.2.1 庆山方言的词音调系统

上节说明的只是原理，因此太抽象。现在再以庆山方言的名词音调为例，做一些较为具体而详细的解释。在庆山方言的名词里有如下的音调模式（音调音位系统）：

1a. gi（旗子）[1]

1b. da-ri（脚）[1-5]

1c. sa-da-ri（梯子）[1-5-5]

1d. dae-chu-na-mu（枣树）[1-5-5-5]

⋮

【上例中把gi（旗子）看作“低”，也许有人会怀疑。因为加上主格或处格助词：gi+ga（旗—主语）、gi+e(旗—补语)，gi就变成了高音，整个变为高降词组[5-1]。然而这正是加上助词ga或e的缘故，比较一下gi+bu-teo(从旗子始)或gi+bo-da-a(比旗子更）等，一加其他助词，整个发音变成[1-5-1][1-5-5]，这大概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在塞缪尔·罗伯特·拉姆塞教授1973年对咸镜道北青方言音调进行比较研究的调查以前，当代的学者在这一点上全都搞错了。笔者自己1972年调查庆尚道方言进行分析时，也还以为bu-teo（从…始）和bo-da-a（比…更)、jo-cha(连…也）这类助词能使前置名词的音调标记接引到这些助词上。】

⋮

2a. ji（耳朵）[5]

2b. mo-gu（蚊子）[5-5]

2c. to-jjae-bi（鬼怪）[5-5-1]

2d. cong-meo-gu-ri（青蛙）[5-5-1-1]

⋮

3a. （无单音节词。这有一个历史原因；因说明烦琐，请参阅拉姆塞教授的*Accent and Morphology in Korean Dialects—A De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国语学丛书9，Seoul，Tower Press，1978）

3b. na-ra（国家）[5-1]

3c. a-ji-mae（伯母）[5-1-1]

3d. go-seum-do-chi（刺猬）[5-1-1-1]

⋮

4a. （无双音节词）[1-5]

4b. beo-beo-ri（哑巴）[1-5-1]

4c. jwi-myeo-neu-ri（鼠妇）[1-5-1-1]

⋮

5a. （无三音节词）[1-5-5]

5b. ddag-da-gu-ri（啄木鸟）[1-5-5-1]

5c. a-gga-si-a-ggoch（洋槐花）[1-5-5-1-1]

⋮

6a. （无四音节词）[1-5-5-5]

6b. beo-ri-jang-meo-ri（礼节）[1-5-5-5-1]

6c. mu-reu-seu-reum-ha-da（黄色的）[1-5-5-5-1-1]

（因无适当名词，借用形容词）

⋮

7a. （无五音节词） [1-5-5-5-5]

7b. ggo-jang-ju-ga-raeng-i(西裤)[1-5-5-5-5-1]

小圈表示上列词各音节发音的相对高度，自然是近似的，其细微之处可能因不同人的描写而异。比如6a. beo-ri-jang-meo-ri（礼节），第4音节meo的高度与第2音节ri相比，恐怕有人会觉得其绝对值高一些。这也似乎是事实。我想，已故小仓进平博士所以认为大邱方言三音节词的调型之一往往是第3音节高，原因就在此吧。但是据我的调查，不能认为大邱方言该调型与第2短音节也一样高的调型之间存在音韵对立。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只是一个词中各音节的相对高度，不是绝对高度。光从这一点看，即使对beo-ri-jang-meo-ri（礼节）第2音节的绝对高度持有异议的人，我想也决不会怀疑这样的事实：第1音节和第2音节之间，比第3音节和第4音节间的音调差异更显著。

上面举的第1组词，a是单音节词，b是双音节词，c是三音节词，在理论上不管音节多长，都具有第1音节低，以后各音节高的特征。但在单音节词里，只要单独发音，人们大概会区别两组词的音高。一组是一定要发高音：

mal（马） son（客人） bae（梨） ddo（粑）

第2组则不一定发高音：

ggoch（花） mog（咽喉） jib（家） sul（酒）

但只要接上助词ga/i（主格助词）、neun/eun(提示助词)，则不管mal（马）还是ggoch（花）都一定发成高音：

mal-i⟶ma-ri [5-1]

ggoch-i⟶ggo-chi [5-1]

第2组词的特征是不管有多少音节，第2音节一定高，

第 3 音节起一定低。

与此相同，第 3 组是第 1 音节高，后面低；第 4 组是始音节低，第 2 音节高，后面低；第 5 组是第 2、3 音节高，后面低；第6组是到第4音节均高，后面低；第7组是到第5音节均高，后面低。从理论上讲，这一律规可以推延到无论多少音节的词。

综观上述词音调，朝鲜语名词的超语段语音特征顿时清楚了，即词音调的相对高度在于：

（1）在某音节降还是不降，

（2）降的话，自哪一个音节起降，

总之是在哪个音节上发生了从高而低的下降。如果能够知道1a至7b（理论上音节越长种类越多）名词的音调模式（音调音位系统）在哪儿出现下降，那么其他音节的音调也就可以预测了。比如某个词已知在第3音节出现音调的高低，那么该词的音调将如下所示：

mi-ggo-ra-ji（泥鳅） [1-5-5-1]

mi-ggo-ra-ji ga（泥鳅—主格） [1-5-5-1-1]

mi-ggo-ra-ji e（泥鳅—处格） [1-5-5-1-1]

mi-ggo-ra-ji e-seo（泥鳅—处格）[1-5-5-1-1-1]

mi-ggo-ra-ji bu-teo（从泥鳅始）[1-5-5-1-1-1]

mi-ggo-ra-ji bo-da-a（比泥鳅更）[1-5-5-1-1-1]

mi-ggo-ra-ji jo-cha（连泥鳅也）[1-5-5-1-1-1]

第 1 音节低，第 2、3音节高，以后续接上去的助词全都发低音。又如已知某个词在第 5 音节发生高低变化，那么该词的音调表现如下：

mo-ji-rang-bis-ja-ri（扫帚） [1-5-5-5-5-1]

ga-un-de-son-gga-rag（中指）[1-5-5-5-5-1]

第1音节低，以后各音节直至第5音节均发相对高音，后面接不接助词都发低音，其音调模式不变。

只是第1组和第2组稍有不同。第1组词受后接助词的控制，其音调配置如下：

gi ga（旗子—主格）[5-1]

gi e（旗子—处格）[5-1]

gi e-seo（旗子—处格）[5-1-1]

sa-da-ri ga（梯子—主格）[1-5-5-1]

sa-da-ri e（梯子—处格）[1-5-5-1]

sa-da-ri e-seo（梯子—处格）[1-5-5-1-1]

也就是除了第1音节，每个音节在助格ga/i（主格）、e（处格）、e-seo（处格）之前发高音，第1音节发低音。总之，该组词自身不具有固定的音调模式。因此这组单音节词以高音调开始，而一跟bu-teo（从…始）、jo-cha（连…也）等第1音节高音的助词相接，反而变成了以低音调开始：

gi bu-teo（从旗子始）[1-5-1]

gi jo-cha（连旗子也）[1-5-1]

接上bo-da-a（比…更）这类第2音节高音的助词，就又变成了“低高高低”型：

gi bo-da-a（比旗子更）[1-5-5-1]

第2组最特殊。起首两音节必高，其后不管接哪一类助词都发低音：

eong-meo-gu-ri（青蛙）[5-5-1-1]

eong-meo-gu-ri ga（青蛙—主格）[5-5-1-1-1]

eong-meo-gu-ri e（青蛙—处格）[5-5-1-1-1]

eong-meo-gu-ri e-seo（用青蛙）[5-5-1-1-1-1]

eong-meo-gu-ri bu-teo（从青蛙始）[5-5-1-1-1-1]

eong-meo-gu-ri jo-cha（连青蛙也）[5-5-1-1-1-1]

eong-meo-gu-ri bo-da-a

（比青蛙更）[5-5-1-1-1-1-1]

但如果是单音节名词，则往往出现自由变体：

bi e-seo（雨—处格）{[5-5-1] / [5-1-1]}

i ga（虱子—主格）{[5-5] / [5-1]}

第2组名词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它前面一旦接上第1组名词，就得把前置名词的尾音节高化，而它自己丧失了高度：

bo-ri（麦子）[5-5]
bab（饭）[5]
} bo-ri-bab（麦饭）[1-5-1]

比较：

ddong（屎）[1]
po-ri（苍蝇）[5-5]
} ddong-po-ri（臭蝇）[5-1-1]

因此我们说，第1组无音调标记，第2组音调标记在前置音节（即第零音节），第3组标记在第1音节，第4组标记在第2音节，其他各组类推。这样，上述词的底层形态可作如下的音韵描写：

1a. gi（旗子）{gi} [1]

1b. da-ri（脚）{da-ri} [1-5]

1c. sa-da-ri（梯子）{sa-da-ri} [1-5-5]

1d. dae-chu-na-mu（枣树）{de-cu-na-mu}

[1-5-5-5]

⋮

2a. gi（耳朵）{˥gi} [5]

2b. mo-gu（蚊子）{˥mo-gu} [5-5]

2c. to-jjae-bi（鬼怪）{˥to-jje-bi} [5-5-1]

2d. eong-meo-gu-ri（青蛙）{˥əŋ-mə-gu-ri} [5-5-1-1]

⋮

3b. na-ra（国家）{na˥-ra} [5-1]

3c. a-ji-mae（伯母）{a-˥ji-me} [5-1-1]

3d. go-seum-do-chi（刺猬）{go˥-sɯm-do-ci} [5-1-1-1]

⋮

4b. beo-beo-ri（哑巴）{bə-bə˥-ri} [1-5-1]

4c. jɯi-myeo-neu-ri（鼠妇）{jü-mjə˥-nɯ-ri} [1-5-1-1]

⋮

5b. ddag-da-gu-ri（啄木鸟）{ddag-da-gu˥-ri} [1-5-5-1]

5c. a-gga-si-a-ggoch(洋槐花){a-gga-si˥-a-goc} [1-5-5-1-1]

⋮

6b. beo-ri-jang-meo-ri（礼节）{bə-ri-jaŋ-mə˥-ri} [1-5-5-5-1]

6c. mu-reu-seu-reum-ha-da（黄色的）{mu-rɯ-sɯ-rmm˥-ha-da} [1-5-5-5-1-1]

⋮

7b. ggo-jang-ju-ga-raeng-i（西裤）{ggo-jaŋ-ju-ga-reŋ-i}［1-5-5-5-5-1］

4.4.2.2 单音节两短音节的音调

庆尚道方言中，除上述调型外还有一种。据崔铉培教授说，构成低音组的还有gi［g̊i:］（螃蟹）、do-chi［d̥o:ts'i］（斧头）、ji-ji-gae［d̥ʒi:dəigɛ］（呵欠）等含长元音的词。这一组词不受后续助词音调的影响：

gi ga（螃蟹—主格）［5-5-1］

gi e（螃蟹—处格）［5-5-1］

gi e-seo（螃蟹—处格）［5-5-1-1］

gi bu-teo（从螃蟹始）［5-5-1-1］

gi jo-cha（连螃蟹也）［5-5-1-1］

gi bo-da-a（比螃蟹更）［5-5-1-1-1］

由于显示出与第2组名词相同的音调，仿佛看作第2组音调型也行。但在双音节词里，却有下列音调对立的词：

{ do-chi（斧头）［d̥o:tʃ'i］［5-（5）-1］
{ jae-bi(燕子)［d̥ʒɛ:bi］［1-（5）-1］

{ jo-rae（竹篓）［d̥ʒo:rɛ］［5-（5）-1］
{ gae-mi（蚂蚁）［g̊ɛ:mi］［1-（5）-1］

于是不能说长元音词都是第2组型了。jae-bi(燕子)或gae-mi（蚂蚁）的音调，如上所示与第4组一致（后面即使接助词，也不受影响）。从而，先在这里设一个韵律上的单位——短音节（mora）。把长元音音节看作在韵律上相当于两个音节的单位，就其语音拼写的外观来看也可以解释成，长元音音节具有多一个节拍的词所承担的音调。那么，jae-bi（燕

子）或gae-mi（蚂蚁）的音调模式可以如下分析：

{ jae-bi（燕子） [1-(5)-1] {je-e ˥-bi}
  sa-ma-gu（悲） [1-5-1] {sa-ma ˥-gu}

{ gae-mi（蚂蚁） [1-(5)-1] {ge- ˥e-mi}
  mi-na-ri（芹菜） [1-5-1] {mi-na ˥-ri}

不过，这样分析，同样具有长元音，音调便和第2组型一样的词里，词音调从高向低降落时，只是晚起一个短音节，构成如下列中的空位：

{ gi（螃蟹） [5-(5)] { ˥gi-i}
  i-mi（母亲） [5-5] { ˥i-mi}

{ su-geon（手帕） [5-(5)-5] { ˥su-u-gən}
  ha-rae-bi（祖先）[5-5-1] { ˥ha-re-bi}

{ geo-meo-ri(蛭虫)[5-(5)-5-1] { ˥gə-ə-mə-ri}
  gu-reum-da-ri(旱桥) [5-5-1-1] { ˥gu-rɯm-da-ri}

因此，长元音词出现在第2组调型时，不得不把它们看作以音节计算（syllable-counting）的模式；出现在其他调型时，则必须看作以短音节计算（mora-counting）的模式。

此外，对于长元音词里具体音调的细微调质，也许有人会作出不同观察，觉得gi（螃蟹）{ ˥gi-i}的第1短音节比i-mi（母亲）{ ˥i-mi}的第1音节起点低；同时感到jae-bi（燕子）{je-e ˥-bi}延长部分（即第2短音节）的高度也比sa-ma-gu（悲）{sa-ma ˥-gu}或beo-beo-ri（哑巴）{bə-bə ˥-ri}的第2音节低一点。这就是所谓“受定特征”（determined features）：第1音节含有长元音时，其领先的短音节，无论如何要比对应的非长元音第1音节偏低一些，

而不可能相反。同时，在第 1 音节含长元音的词里，也不存在起首短音节与第2组型非长元音的第 1 音节变得一样高的。所以这种语音上的差别在音韵处理时，不会影响分析的结果。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gi(螃蟹)或 su-geon（手帕）这类词在该语言的音调系统中解释成由两个短音节组成，而jae-bi(燕子)或gae-mi(蚂蚁)等由两个音节组成，那么不仅可以使前者合理地列入非长元音词音调系统，而且使庆山方言之所以必须区别音节和短音节这一现象也变得简单明了了。

我们设想，可以把人类的语言分成以音节为单位又在韵律上必须确立短音节的语言（如拉丁语等)，和以短音节为单位同时也必须用短音节计算韵律的语言（如古希腊语等）这两类。于是日语（东京方言）很明显属于以短音节计算的语言，必须把长元音看作两个短音节，把所谓“拨音”和“促音”也分别看作一个短音节。但另一方面，下降的复合元音（请注意，日语的上升复合元音决不能形成两个短音节）第2短音节往往形成音调的下降点：

{ a-i ˥-ka-gi }（配钥匙)(往往也有 { a-i-ka-gi } 的发音）

{ a ˥-i-ka }（哀歌）

反之，拨音和长元音的第 2 短音节则不是这样。因此下列两对词：

{ a^{7}-ɴ-ka }（廉价）— { a-ɴ-ka }（脚炉）
[5-1-1]　[1-5-5]

{ ko^{7}-o-ka }（效果）— { ko-o-ka }（硬化）
[5-1-1]　[1-5-5]

会出现“高低低”、“低高高”的音调模式，但不可能有“低高低”的模式（参阅＜音韵的体系和结构＞，《岩波讲

座日本语（5）》，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28页）。我们不能忽略音节语音的韵律这一侧面，— 若把这一事实考虑进去，上述朝鲜语的音节和短音节的参差，将是十分值得注意并且很有启发性的现象。

4.4.2.3 朝鲜语词音调的音韵功能

在朝鲜语词音调的研究中，由于很早就引进了 un-so（“韵素”，=韵律音位）、un-yul eum-so（“韵律音素”=韵律音位）或toneme（“调素”=音调音位）、prosodeme（“韵律”）这些术语，人们往往产生错觉，以为高度的音韵分析早就形成了。我们绝不能仅仅从术语来判断一种研究。

把朝鲜语的音调现象，如同我们前面论述的那样看作是朝鲜语各个词固有的音调特征，这个看法其实并不怎么新鲜。梅田博之教授远在二十多年前就引进了“重音素”（=重音音位）概念，他在题为“庆尚北道漆谷方言（朝鲜语）的重音”的论文（《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961年3月，第11—28页）里，得出漆谷方言词的短音节的重音素有“平板型”和“下降型”两类。同时服部四郎博士借1967年访问庆尚道的机会，随同全在昊教授考察了大邱方言的词音调，报道了大邱方言的名词有如下“重音素”：

无核词：

1./bi/（雨），/gu-rum/（云彩），/mu-fi-ge/（虹）… [相当于我们提过的第2组型｛o ˥｝、｛ ˥oo｝、｛ ˥ooo｝]

有核词：

2./bi/˥（石碑）[相当于前述第1组型｛o｝]；/ba˥-

da/（海），/bi˥-re-gi/（跳蚤）［相当于前述第3组型｛o˥｝、｛o˥o｝、｛o˥oo｝…］

3./na-mu˥/（树），/,a-bu˥-ʑi/（父亲）［相当于前述第1组型｛oo｝、｛ooo｝…］

4./be-ru-mu˥/（肚脐）［相当于前述第1组型｛ooo｝、｛oooo｝…］

他认为朝鲜语重音在于有没有"重音核"（相当于词音调从"高"向"低"的降落点）；如果有，在哪一个音节上？他认为只有这一点在音位学上有意义。至于其他特征（例如第1短音节高还是低，第2短音节比它高还是低等特征），都根据"重音核"的有无或位置自动确定，只是个语音学的特征（〈朝鲜语的重音·短音节·音节〉，《言语的宇宙》第3卷第11号，1968年11月，第84—90页。上文音位记号据原文，但为了使一般读者易懂，加了连字符表示音节间隔。另外，关于3个以上短音节的词，原作者表明，因调查不充分而存疑。现在作者也希望读者谅解这一点）。

所谓"重音素"，据服部博士当时发表的论文，定义如下：

称之为重音型的，我认为并不是单纯的高调或低调的连续，而是表示由它们所组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应该整个地被叫做"重音素"（prosodeme），看作信封一般扣在普通音位连续体上而形成的一个音韵单位。（〈重音素·音节结构·喉音音素〉，《音声的研究》第9集，1961年，第3页）

这主要是就日语的资料说的。但日语也好，朝鲜语也好，要是把那种词音调分析为"重音素"，看作是扣在词或词组

（严格地说是“音韵短语” phonological phrase）整体上不可分割的超语段“音位”，那么许多地方就显得不妥当了。研究“音位”或“词素”等语言的表层结构时，问题不那么严重。但是一旦全面分析该语言的句法结构，这种分析法就会碰到种种困难。

4.4.2.3.1 构成短语的词音调派生

对此，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梅田教授指出了漆谷方言里非常有趣的现象。他说在漆谷方言里，“单短音节的词没有重音素的区别，但有如下形态音位学上的事实”（第14页）：/be/（肚子），/gir/（字）[相当于我们的第2组型｛˥o｝]等词，即使带了“附属词”（助词）也不显示“重音素”【用梅田教授的话说，是“在整体……加上平板重音素"】；但/be/（梨），/hir/（土）[相当于我们的第1组型｛o｝]等词，一接上助词就显出“重音核”[按梅田的说法，是“加上下降重音素”]。

庆山方言稍微复杂些，但也有类似现象。庆山方言单音节（单短音节）名词有3组：

（1）bae｛˥be｝（肚子），geul｛˥gɯr｝（字），
mom｛˥mom｝（身体），dal｛˥dar｝（升）

（2）jib｛jib｝（房子），ggoch｛ggoc｝（花），
mog｛mog｝（喉咙），sul｛sur｝（酒）

（3）bae｛be｝（梨），heul｛hɯr｝（土），mal｛mar｝
（马），son｛son｝（客人）

（1）不管单说还是接上ga/i（主格助词）或e（处格助词）等助词都发高平调；（2）单独发音时是低音，但一接上上列助词就发高音，整体变成高降调；（3）无论单独还是接上

助词，都发高音。也有如徐在克博士报道的那样，（2）或（3）类单音节单短音节名词单独发音时，是高音还是低音，只根据说话者对带助词的短语整体音调有什么感觉来决定。所以庆山方言的单音节名词的音韵标音，正如前面指出过的，完全可以把（1）当作第0音节标记，把（2）（3）当作无标记（因为根据后续助词的第0音节的重音标记来决定它们的高度）。这在带别的助词时也一样：

{˥mom}（身体）→/˥mom/→[5]

{˥mom}{˥(r)ɯr}（身体—宾格）→/˥mom-ɯr/→/˥mo-mɯr/→[5-5]

{˥mom}{˥man}（仅身体）→/˥mom-man/→[5-5]

{˥mom}{˥man}{˥(n)ɯn}（仅身体—提示格）→/˥mom-man-ɯn/→/˥mom-ma-nɯn/→[5-5-1]

由于名词已有音调标记，故整体发高平调，第3音节以下发低调。相反，在(2)(3)的场合，名词没有标记，助词的第0音节标记移到了名词上，于是必然出现第1音节高，后面低下去的现象：

{jib}（房子）→/jib/→[ ]

{jib}{˥(r)ɯr}（房子—宾语）→/jib˥-ɯr/→/ji˥-bɯr/→[5-1]

{jib}{˥man}（仅房子）→/jib˥-man/→[5-1]

{jib}{˥man}{˥(n)ɯn}（仅房子—提示格）→/jib˥-man-ɯn/→/jib˥-ma-nɯn/→[5-1-1]

以上现象也可以解释为{˥mom-man-(n)ɯn}（仅身体—提示格）整个被"平板重音素"覆盖，{jib-˥man-(n)ɯn}（仅房子—提示格）整个被"下降重音素"覆盖了。当我们

实际给朝鲜语句子标音时，这两种重音素中到底标哪一个，还牵涉到｛˥mon｝（身体）和｛jib｝（房子）这些名词本身的音形差别。所以所谓重音素的分析，或者这里讨论的词（正确地说是词素或形素）的标记方式，在描写的有效性上都差别不大。问题在于后面要讨论的情况。

庆尚道许多方言的助词根据构成短语音调的作用，可分为两类：

（1）｛˥ga/i｝（主格），｛˥(r)ɯr｝（宾格），｛˥(n)ɯn｝(提示格)，｛˥e｝(处格），｛˥e-sə｝（处格）

（2）｛ggɯ˥-jəŋ｝（程变副助词），｛bu˥-tə｝（开始副助词），｛bo-da-a｝（比较格）

朝鲜语短语音调的结构原理，与日语（东京方言）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如下的日语“名词＋助词”的连结里：

｛miyoko｝（京城）｛ma˥de｝（到）（到京城为止）→/miyoko-ma˥de/→［1-5-5-5-1］

｛i˥noti｝（生命）｛ma˥de｝（到）（到生命结束）→/i˥noti-made/→［5-1-1-1-1］

｛koko˥ro｝（心）｛ma˥de｝（到）（到心理结束）→/koko˥ro-made/→［1-5-1-1-1］

｛atama˥｝（头）｛ma˥de｝（到）（到头部为止）→/atama˥-made/→［1-5-5-1-1］

助词的音调模式受前面的名词支配，只有在如下前位名词没

有标记的情况下才实现（如{e}"柄"、{usi}"牛"、{usagi}"兔子"等词）（参看James D.McCaWley: *The Phonological Component of a Grammar of Japanese*, 's-Gravenhase, Mouton and(o)1968, pp.138—139）：

{e} {ma˥de}（到把儿为止）→ e-ma˥de/
（柄）（到）
[1-5-1]

{usi} {ma˥de}（到牛为止）→/usi-ma˥de/
（牛）（到）
[1-5-5-1]

{usagi} {ma˥de}（到兔子为止）→/usagi-ma˥
（兔子）（到）
de/ [1-5-5-5-1]

庆尚道方言的情况也是这样。上述有音调标记的（1）类或（2）类作前置名词时，后面助词的标记不实现；当前置的名词无标记时，助词标记就全部显现出来了：

{˥gi} {˥ga}（耳朵—主格）→/˥gi-ga/→ [5-1]（第2组）

{na˥-ra} {bu˥-tə}（到国家为止）→/na˥-ra-bu-tə/→ [5-1-1-1]（第3组）

{bə-bə˥-ri} {bo-ba˥-a}（比哑巴更）→/bə-bə˥-ri-bo-da-a/→ [1-5-1-1-1-1]（第4组）

{ddag-da-gu˥-ri} {˥e-sə}（啄木鸟—处格）→/ddag-da-gu˥-ri-e-sə/→ [1-5-5-1-1-1]（第5组）

和日语标准语不同的只是（1）类助词。（2）类助词和日语一样，前置的名词无标记时，助词的音调标记照样体现出

来：

{co}{bu˥-tə}（从醋起，→/co-bu˥-tə/ → [1-5-1]

{bo-ri}{bo-da˥-a}（比麦更）→/bo-ri-bo-ba˥-a/→ [1-5-5-5-1]

{de-cu-na-mu}{jo˥-ca}（连枣树也）→/de-cu-na-mu-jo˥-ca/→ [1-5-5-5-5-1]

与此相反，（1）类助词却具有值得注意的音韵功能，就是它在前置名词的末尾音节上加上自己的标记：

{co}{˥ga}（醋—主格）→* {co˥-ga}→ [5-1]

{bo-ri}{˥e}（麦—处格）→* {bo-ri˥-e} → [1-5-1]

{de-cu-na-mu}{˥e-sə}（枣树—处格）→* {de-cu-na-mu˥-e-sə}→ [1-5-5-5-1-1]

因此，这类助词一旦跟第2类名词结合，往往发生很有趣的现象。前面说过，第2类名词第2音节前都发高音，后面各音节变低。故而这一组名词若是单音节，后接助词时，这一规律适用到什么地方为止就很难确定；另一方面，从助词角度看，还要根据前置什么名词来实现自己的标记！因此，第2类名词是单音节时，就有这样的自由变体：

bi e-seo（雨—处格）{˥bi}{˥e-sə}

↗ /˥bi-e-sə/→ [5-5-1]

↘ /bi˥-e-sə/→ [5-1-1]

这是有原因的。这一变体是运用规律时的“游移”或是机能冲突的结果（如果在自然语言的变化里确实有内在原因的

话．我想它就是能引起这样变化的、难得而鲜明的例子）。因而第1组和第2组的名词，只要是单音节，尽管底层形态不同，表层则不管音段语音还是超音段语音都变得一样，成了如下的同音异义词：

{ be } { ˥e }（梨—处格）
{ ˥be } { ˥e }（肚子—处格） [5-1]

{ bi } { ˥e-sə }（石碑—处格）
{ ˥bi } { ˥e-sə }（雨——处格） [5-1-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短语音调结构一旦按上面规定的名词和助词结合的方式产生，便固定下来；即使再接副助词也丝毫不受影响。如：

{ be } { ˥e } { ˥(n)ɯu }（梨＋处格助词＋提示助词）→/b˥e-e-nɯn/→
{ ˥be } { ˥e } { ˥(n)ɯn }（肚子＋处格助词＋提示助词）→/˥be-e-nɯn→ [5-1-1]

{ co } { bu˥-tə } { ˥(n)ɯn }（醋＋开始助词＋提示助词）→/co-bu˥-tə-nɯn/→[1-5-1-1]

{ bo-ri } { bo-da˥-a } { ˥(n)ɯn }（麦＋开始助词＋提示助词）→/bo-ri-bo-da˥-a-nɯn/
/→ [1-5-5-5-1-1]

这实质上恐怕是短语结构的层次（hierarchy）问题和音调标记简化规律（mark reduction）的应用问题。

至于构成短语音调时上述助词所起的作用，我们分析为助词本身有潜在标记，或者解释为它把自己的标记“转嫁”给了前置的名词。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重音素”的替换现象，那将怎样来说明这一切呢？

大郎方言的短语有如下的音调：

/bi/ /ga/（雨—主 格）［5-5］

/bar//ga/（脚—主格）［5-5］

或许可看作是无核词和无核词的结合体被"无核重音素"所包裹。而如下短语的音调是有核词和无核词的结合体被"有核重音素"所包裹：

/bi˥/ga/（石碑—主格）［5-1］

/jid˥//i/（房子—主格）［5-1］

但同样是这些词，一接上bu-teo（从…始），jo-cba（连…也）等助词，就变了样：

/bi/＋bu-teo（从雨始）［5-5-1］

/bi˥/＋bu-teo）从石碑开始）［1-5-1］

这就不能单单认为是由于bu-teo/bu˥-tə/在第1音节带了音位学上的"核"，所以整体被/oo˥o/重音素包裹了。为什么不能呢？因为/bi/（雨）和/bi˥/（石碑）的音调的具体体现不同。/bi/和/bu-tə/都是无核的，不能解释成整体被oo˥o/重音素所包裹。而且/bi/＋/ga雨/(—主格)［5-5］和/bi/＋/e/（雨—处格）［5-1］的音调表现不同。为了区别这种不同的音调具体表现，就把抽象的记号打在/ga/i/（主格助词）或/e/（处格助词）这类助词上，从而有这种记号时（或没有记号），无核重音素（或有核重音素）便包裹整体。也许这样的描写是唯一的方法吧。

坦率地说，为了不使上述问题混乱，我们一直回避了另一个问题的讨论。其实，第（1）类名词，至少在庆山方言里，与e（处格）或e-seo（处格）等助词连结时可再分成两组。一组是名词部分音调高，后面（助词部分）低：

(1a)　be e-seo（在肚子）　[5-1-1]
mom e-seo（在身体）　[5-1-1]
gi e-seo（在旗子）　[5-1-1]
cho e-seo（在醋）　[5-1-1]

另一组就不显示"重音核"：

(1b)　geol e-seo（在字）　[5-5-5]
mal e-seo（在升）　[5-5-5]
mas e-seo（在味道）　[5-5-5]
i e-seo（在虱子）　[5-5-5]

要是维持"重音素"分析法，我们为了区别这两组名词，还需要特别的记号。

上述这一做法，按语言学上的描写方法是不太适合的。因为这样分析下去，我们就不能合理地揭示两个以上词结合后所包裹的重音素和构成该短语词素的重音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即随着结合而使重音型变更的内在机制）。

我们的看法不大一样。我们认为名词的词音调，在音韵范围不过是各个名词音节固有的韵律上的抽象标记，到了语音实现的阶段才决定该名词的音调全体。故而跟上述重音素观点相反，把/bi/（雨）和/gu-rum/（云）等解释为有标记的（｛˥bi｝，｛˥gu-rum｝），把/bi˥/（石碑），/na-mu˥/（树），/'a-bu˥-ju/（父亲）和/be-ru-mu˥/（肚脐）等解释为无标记的（｛bi｝，｛na-mu｝，｛a-bu-ji｝，｛be-ru-mu｝），把ga/i（主格），e（处格），e-seo（处格）看作第0音节有标记的助词（｛˥i｝/｛˥ga｝，｛˥e｝，｛˥e-sə｝），把bu-teo（从…始），jo-cha（连…也）看作第1音节有标记的助词（｛bu˥-tə｝，｛jo˥-ca｝），把bo-da-a

（比…更）看作第2音节有标记的助词（{bo-ba ˥-a}）。附属词（助词）的标记从属于中心词的标记，只有在中心词没有标记时，附属词（助词）才显示标记。

我们用上述这种普通常识的规则来解决短语音调结构的机制，不是更好吗？这样，对于为什么只有前面谈到的bi e-seo（雨一处格）{˥bi}{˥e-sə} $\left\{\begin{matrix}[5-5-1]\\ [5-1-1]\end{matrix}\right.$ 这一类词才形成自由变体，也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了。这一自由变体，纯粹是{˥bi}（雨）和{˥e-sə}（处格）这类词(语音模式上是音节）音韵特征的共时变化结果，是以此特征为基础的短语音调结构原理本身发生冲突而产生的结果。

词的这种音韵特征，当然是以这种语言结构整体中的规律为线索，而被先验地规定的。但一经正式确立，便理所当然地可以纯粹看作是词的音韵特征。就是说，只不过是附在词的某一音节上的音韵标记而已。既然这样处理朝鲜语的词音调、短语音调，毋须再把它还原成重音素这种绝对要素，这当然不必多说，而朝鲜语究竟有几个重音素这类问题本身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在人类语言的形式方面，这样的要素相当多。既不能排列成表，又不能编制目录——这已在别的场合有过专论（服部四郎先生期满退职纪念论文集《现代语言学》，东京，三省堂，1972年3月，第41—55页）。朝鲜语（庆尚道方言）的词音调似乎也可以归为其中之一例。

4.4.2.3.2 构成复合词的词音调派生

音调标记类似的移动，在复合词的形成中也能看到。在此且举一例，以见其规律。na-mu{na-mu}（树）这一形素本身不带音调标记。所以音调标记在复合词形成中有如下

的移动：

（1）前接词的词根若无标记，复合词全体也无标记：

bae{be}（梨）+na-mu{na-mu}（树）=

bae-na-mu{be-na-mu}（梨树）[1-5-5]

po-do{po-do}（葡萄）+na-mu{na-mu}（树）

=po-do-na-mu{po-do-na-mu}（葡萄树）[1-5-5-5]

（2）前接词的词根若在第0音节带音调标记，复合词全体也在第0音节带标记：

tong{ ˥toŋ}（株）+na-mu{na-mu}（树）=

tong-na-mu{ ˥toŋ-na-mu}（圆木）[5-5-1]

ja-jeog{ ˥ja-jəg}（白桦）+na-mu{na-mu}

（树）=ja-jeog-na-mu{ ˥ja-jəg-na-mu}（白桦树）

[5-5-1-1]

（3）前接词的词根若在第1音节带音调标记，复合词也在第1音节带音调标记：

eun-baeng{ɯn ˥-heŋ}（银杏）+na-mu{na-mu}

（树）=eun-baeng-na-mu{ɯn ˥-heŋ-na-mu}

（银杏树）[5-1-1-1]

ggol-bam{ggor˥-bam}（橡子）+na-mu{na-mu}

（树）=ggol-bam-na-mu{ggor˥-bam-na-mu}

（橡树）[5-1-1-1]

如果认为有一个第2音节存在重音核的"重音素"包裹着na-mu（树），那么应该怎样说明上述音调标记的移动呢？由于bae/be ˥/（梨）和po-do/po-do ˥/（葡萄）也都可以认为末尾音节上有重音核，所以一方面似乎可以建立这样一条规则：

有核词根＋有核词根＝末尾有核词

例：/po-do ˥/＋/na-mu ˥/＝po-do-na-mu ˥/（葡萄树）[1-5-5-5]

同时，另一方面由于eun-haeng/ɯn ˥-heŋ/（银杏）和ggol-bam/ggor ˥-bam/（橡子）也都可以假定第1音节上有重音核，于是不得不与上面的规则相反，假设另一条很不自然的规则：

有核词根＋有核词根＝头部有核词

例：/ɯn ˥-heŋ＋/na-mu ˥/＝/ɯn ˥-heŋ-na-mu/（银杏树）[5-1-1-1]

作为应急的措施，可以对这条规则加一个限制："只有当前接词词根的核在第1音节时"才适用。然而可想而知，这毕竟只是个"应急措施"。一到ja-jeog-na-mu（白桦树）这种组合，便产生了致命的破绽。这个ja-jeog（白桦）/ja-jəg/，只能看作是无核词。当然所能期望出现的词音调是/ja-jəg-na-mu ˥/（白桦树）[1-5-5-5]，但实际上却完全被无核重音素包裹了。在这情况下，也许只能再"发明"应急措施了：不把ja-jeog（白桦）作为独立词使用，na-mu在意念上似乎也不能当作词，而是与ja-jeog凝为一体，于是，ja-jeog-na-mu（白桦树）整个被看成了单纯词，因此才被完全不同的重音素覆盖了。——必须承认，这又是一个应急措施；岂止是"应急措施"，不过是"敷衍措施"罢了！因为在跟不折不扣的独立词（比如baeg-yang白杨）结合时，结果也发生与ja-jeog-na-mu（白桦树）完全一样的情况：

/beg-yaŋ-na-mu/（白杨树）[5-5-1-1]

自从30年代提倡行为主义语言分析法以来，语言学家的

主要关心放在了"如何从客观的顺序来提炼出构成语言的根本要素（在词音调里就是所谓'重音素'）"这一点上。然而现代语言学家认为，不仅要提炼某个语言的要素，而且要探求它们如何构成这个语言，从而全面地寻找它们的机制和规律性。前面已讨论了"重音素"是依靠发现哪里有"重音核"这一点来确立的。所以，如果说语言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探求这些短语或句子的结构(广义说"句法")里的规律性，那么与其设立包裹词和词组的"重音素"来说明它们的音调现象，不如寻找"重音核"，并以它为基础进一步去说明词组或句子音调结构中的规律。至少后者将成为当前的中心课题。

如果真是这样，最先提出"重音素"分析来认识"核"的重要性的语言学家，贡献可够大的了。我们这一代有赖于这些语言学家才推进了研究。我们用形素音调标记来说明各种音调现象，也只是对"重音核"理论作了一点改进罢了。音调标记的运用，恐怕是先觉者对这一问题的精辟见解(参阅服部四郎〈所谓重音素是什么？何谓其区别性特征？ 日语的'高重音'是词重音的一种，不是'调素'的简单延续——〉，《言语之科学》第4号，1973年6月，尤其是第31页以下诸页）。

4.4.3. 庆尚道方言的词音调模式

许雄博士有关庆尚道方言词音调的研究发表以后，几年来又有李崇宁博士的汉城方言重音，张泰镇、文孝根两教授的大邱方言重音，郑然粲教授的安东方言重音，（稍迟一点的）金次均教授的全罗方言重音等描写和分析的发表，顿时为朝鲜语诸方言词音调系统的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其中文

孝根教授针对许雄博士庆尚南道方言为中心的研究，调查分析了大邱为中心的庆尚北道方言中词音调系统，摸清了高低对立和与之重合的长短对立的具体情况，进而展望整个庆尚道的词音调系统，试图予以历史性的统一解释，其成就尤为显著。

但是，比较研究和对照研究不同。仅仅描写那个方言有怎样的词音调，相当于其他方言的什么音调，还是不够的。弄清楚各种各样词音调系统中有什么样的特征才是语言学上有意义的东西，什么样的规律在起作用才造成了各种不同的词音调系统。不弄清这些内在的机制，就不能指望有效地构拟词音调的原始系统（proto-system）。（本书无暇涉及这一点；就上述意义讲，在朝鲜语音调研究史上划时代的是前面提过的拉姆塞教授的咸镜方言的研究。）

庆尚南北道诸方言的词音调系统中，不明之处还很多，应该避免急躁而笼统的提法。据目前所知，大致有下列三大方言区。

（1）以梅田教授描写的漆谷方言为代表的一类。仅以名词的词音调而言，分有标记（梅田教授所谓“下降型”）和无标记（所谓“平板型”）两种。就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分布在庆尚北道漆谷、高灵等沿洛东江地区。我们暂时命名为庆西型（它是不是代表古代的伽倻，是不是与下述的庆东型的新罗相对应，尚属未知）。

（2）分布在大邱、庆山、安东等地的一类。仅以名词而言，词音调在音韵层次上分为出现标记和不出现标记两种；出现标记的则根据该词哪个音节承担标记，就有比构成词的音节数多一个的音调模式。且叫它庆东型。

（3）与此相对，在许雄博士金海方言的描写中，和梅田教授灵山方言的调查（〈朝鲜语灵山方言的重音〉，服部四郎先生期满退职纪念论文集《现代语言学》，东京，三省堂，1972年3月，第115—123页）中所代表的，这一类方言分布在梁山、密阳、金海、马山、南海等地，具有用音调高度代替庆东型长短对立的模式。我们叫它庆南型。

这里重申一下，这是根据笔者至1972年12月底现场考察过的资料所作的暂定分类。倘若做进一步调查，或许可以分得再细一些，也可能相反变得更简单些。分类和区域分布的最终确定，需待大江孝男教授"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1）（〈大邱方言重音的类型和长元音〉，《语言研究》第69号，1976年3月，第16—35页）那样的该领域专家们的调查报告的完成。但上面三种类型的比较，亦足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样进行词音调的比较和音韵层次上机能的研究。

4.4.3.1 庆西型单词音调

已如前述，漆谷方言（的名词）有"平板型"和"下降型"两种。我们再引一下梅田教授的话。所谓平板型，是"在两个短音节〔词〕的场合，只有第2短音节发稍高音；而三个短音节及三个以上时，只有除最初和最后外的短音节发稍高音"（只是第1音节长元音时，以中平调开始；三个短音节以上时，最后一个短音节稍稍下降）。若用1表示名词的短音节，用×表示助词的短音节，那么概括一下，就有如下的模式：

CVC… [1-ˣ-ₓ]　　　CVV… [5-5]

[1-5]　　　[5-5-1]

[1-5-1]

[1-5-5-1]

[1-5-5-5-1]

⋮

⋮

[5-5-5-1]

[5-5-5-5-1]

⋮

⋮

所谓下降型是第1音节高而强，以后各音节低的模式。如：

[5-1]

[5-1-1]

[5-1-1-1]

⋮

前者即所谓没有重音核的词，后者即有重音核的词。梅田教授观察的漆谷方言只有这两种模式，而且如果有“重音”，一定在第 1 音节。因而在音韵层次上，漆谷方言名词的词音调只有出现标记和不出现标记两种。只要看一下该方言的单短音节词后接助词时改变音调的情况：

bae（肚子）+ga（主格） bae+（肚子）+neun（提示） bae（肚子）+bu-teo（开始） bae（肚子）+bo-da（比较）	平板型
bae（梨子）+ga（主格） bae（梨子）+neun（提示）	下降型
bae（梨子）+bu-teo（开始） bae（梨子）+bo-da（比较）	平板型

就知道如下解释是合理的：bae（梨子）、mal（马）、jib（房子），heul（土）等词作为不出现词音调标记的一组，而bae（肚子）、mom（身体）、ddeus（意义）、geul（字）

等词作为第0音节出现标记的一组。bae（梨子）和mal（马）加上助词ga（主格）或neun（提示）时，整个变成下降型，是因为这些助词的第0音节带音调标记。要是不这样解释，就无法说明为什么同样是bae（梨子）和mal（马），接在助词bo-da（比较）、bu-teo（开始）、ggeu-jeong（到…为止）前面时，整个没有变成下降型音调。bo-da（比较）、bu-teo（开始）、ggeu-jeong（到…为止）等在庆东型是第2音节后带标记的词，而正如后面将要论及的，在庆西型里全部失去了标记。

ga（主格助词）和neun（提示助词），接于bae(梨子）或mal（马），整个变成了下降型：

bae-ga（梨子—主格）[5-1]｛be˥ga｝

mal-neun（马—提示）[5-1]｛mar˥nɯn｝

而接于bae（肚子）或mom（身体），却停留于平板型：

bae-ga（肚子—主格）[1-6]｛˥be ˥ga｝

mom-neun(肚子—提示)[1-5]｛˥mom˥nɯn｝

这是为什么？原来只有在名词没有音调标记时，这些助词才在第0音节出现音调标记；当中心名词有标记时就完全服从了中心名词。这样便说明了问题。但在这里不易明白的是处格助词e和e-seo。助词e和e-seo不管接在哪一组名词后，都整个地变成了下降型：

bae-e（梨子—处格）[5-1]
bae-e（肚子—处格）[5-1]
mal-e-seo（马—处格）[5-1-1]
mom-e-seo（身体—处格）[5-1-1]

类似这种音调，即发音“游移”（fluctuation）的情形，在

庆东型庆山方言里也能遇到。或许可以假定在e或e-seo里存在这样的标记：

{ ˥˥e }

{ ˥˥e-seo }

或许可以解释成起首的标记抵消了中心名词的标记，于是剩下的标记成了前置名词的标记：

{ ˥mom } { ˥˥e } → { mom } { ˥e } → { mom˥e } [5-1]

也许有人说，这种描写是过于玩弄记号的想法。那么这一现象也可以这样解释，e或e-seo有"特殊功能"(idiosyncrasy)，把前置名词的词音调标记向自身吸引了一个音节：

{ ˥mom } { ˥e } → { mom˥˥e } → { mom˥e } [5-1]

不管怎么说，漆谷方言名词的词音调，在音韵范围可表记如下（0代表单词音节或短音节，×代表助词的音节）：

mal（马）{ mal } [$\frac{1}{1}\times\frac{X}{X}$/x]

na-mu（树）{ na-mu } [1-5]

gga-ma-gu（乌鸦）{ gga-ma-gu } [1-5-1]

ho-bu-rae-bi（寡妇）{ ho—bu—re—bi } [1-5-5-1]

eom-ji-song-gga-rag（大拇指）{ əm-ji-soŋ-gga-rag } [1-5-5-5-1]

⋮

mom（身体）{ ˥mom } [$\frac{1}{1}\times\frac{X}{X}$—x]

⋮

geo-mu（蜘蛛）{gə˥-mu} [5-1]

a-ji-mae（伯母）{a˥-ji-me} [5-1-1]

go—sum—do—chi（蜥蜴）{go˥—sum—do—ci}

[5-1-1-1]

另外，第1音节为长元音的词音调，作为整体，与无标记型相似，同时因为开头部分音调的差别能够从元音特征预测（predict），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无标记型。

4.4.3.2 庆东型词音调

前已述及的庆山方言里，名词首先可以分成出现标记和不出现标记两类。如果出现标记，根据出现在哪个音节。从可能性来说，肯定存在比构成词的音节数多一个的不同的词音调模式。但实际上由于历史变化的原因，存在着"空位"（vacuous）模式，而只有如下的表现：

[1] {0}

[1-5] {00}

[1-5-5] {000}

[1-5-5-5] {0000}

⋮

CV… [5] {˥0} CVV… [5-(ˣ)] {˥0(0)}

[5-5] {˥00} [5-(ˣ)-1] {˥0(0)0}

[5-5-1] {˥000}

[5-5-1-1] {˥0000}

⋮

[5-1] {0˥0}

[5-1-1] {0˥00}

[5-1-1-1] {0˥000}

⋮

CV… [1-5-1] {0010} CVV… [1-(x)-1] {0(0)10}

[1-5-1-1] {00100}

⋮

[1-5-5] {0001}

[1-5-5-1] {00010}

[1-5-5-1-1] {000100}

⋮

其中不带标记的类型，只要不接第0音节带标记的助词(ga{ ˥ga}/i{ ˥i},e{ ˥e},e-seo{ ˥e-sə}等)，就具有第1音节低以后各音节高的模式(自崔铉培教授以来的庆尚道方言研究者，都把son“客人”、cho“醋”、mal“马”、gi“旗”等单词误认为全是“高”调，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这些助词标记的音韵机能)。第0音节出现标记的类型，具有第2音节前发中高平调(因为在音韵上没有与它对立的高平调，所以在图示中仍作高平调)，后面各音节发低音的模式。其他则表示除了起首音节一直到担当标记的音节为止都发高音，而带标记音节之后都发低音的模式。此外，始音节为长元音的词中，第2短音节(长元音的后半节)担当标记的，(申昌淳氏指出)有的如gae-mi [gɛ:mi] (蚂蚁)【<中期朝鲜语ga-ya-mi】那样是从三音节词(在中期朝鲜语中已带上词尾-i而变成了三音节)来的。但大部分是从中期朝鲜语的双音节词来的，如：

bae-mi[bɛ:mi] (蛇)<bɐ-yam

si-mi[ʃi:mi] (胡须)<su-yeom

或者来自“上声”（有两个”旁点”）词，如：

jae-bi[dʒɛ:bi]（燕子）<:jyeo-:bi

之所以这样，当然各自有相应的历史背景（许雄博士把“蚂蚁”的中期语写成gae-ya-mi；如果没有排错，那就揭示了从ga-ya-mi过渡到现代gae-mi的中间阶段，真是很有趣的词。参阅前引论文第182页）。

4.4.3.3 庆南型词音调

许雄博士观察了金海方言的名词，认为有下列词音调：

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三音节词	四音节词
高	中高	中高高	低中中中
中	高高	高高中	高高中中
低	高中	高中中	高中中中
	低中	中高中	中高中中
	中中	低中中	中高高中

具体的每个单词属于哪种类型— 这一点，我们所见的金海方言则有若干不同。还有，下列几个词跟许雄博士所记录的发音稍有差别：

金海	（相当于）	庆山
ggi	——	gi（螃蟹）
bbi-deul-gi	——	bbi-deul-ki（鸽子）
gae-ae-mi	——	gae-mi（蚂蚁）
im-jae	——	im-ja（主人）

除了上述方言形式的细小差别外，我们所观察的（吴钟甲氏的发音）有关词音调的区别，与许雄博士的几乎都一致。其

中“高”、“中高”、“中高高”、“低中中中”等编在一起，成为不带音节音调标记的一组：

mal（马）[高] [5]

ba-ram（风）[中高] [3-5]

jin-dal-re（杜鹃）[中高高] [3-5-5]

jo—sim—han—da（注意〈动词〉）[低中中中] [1-3-3-3]

许雄博士把mal（马）或bae(梨子)的词音调描写成“高”。我们曾指出，他很可能是根据与第0音节带标记的助词结合后的形态作出的判断：

mal-i→ma-ri（马—主格）[5-x]

mal-e→ma-re（马—处格）[5-x]

我们想，他要是以下列短语为基础，根据这一类词与第1音节带标记的助词结合后的形态，也许会得出不同的描写，

mal-bu-tə（从马始）[1-5-1]

mal-jo-cha（连马也）[1-5-1]

接着，“中”和“高高”、“高高中”、“高高中中”等形成第0音节不出现标记的一组：

mal（升）[中] [3]

po-ri（苍蝇）[高高] [5-5]

mu-ji-gae（虹）[高高中] [5-5-3]

eong-meo-gu-ri（青蛙）[高高中中] [5-5-3-3]

这个“中”，要是意念中没有带主格助词i的mal（马）的影响，我们相信许雄博士会判断成“高”（更严格地说是相对的高）。

“低”，和“低中”、“低中中”构成第1音节带低调

标记的一组：

mal（词）［低］［1］

sa-ram（人）［低中］［1-3］

geo-mu-ri（蛭）［低中中］［1-3-3］

"高中"和"高中中"形成第1音节带高调标记的一组：

ha-neul（天空）［高中］［5-3］

ga-mu-chi（鳢鱼）［高中中］［5-3-3］

us-eum-ggeo-ri（笑柄）［高中中中］［5-3-3-3］

"中高中"和"中高中中"形成第2音节带标记的一组：

gga-ma-gu（乌鸦）［中高中］［3-5-3］

ddaeng-ddaeng-i-jung（托钵僧）［中高中中］［3-5-3-3］

ga-un-de-son-gga-rag（中姆指）〔中高中中中中〕［3-5-3-3-3-3］

"中高高中"和"中高高中中"形成第3音节带标记的一组：

jjeol-rug-bal-i（瘸子）［中高高中］［3-5-5-3］

a-gga-si-a-ggoch（洋槐花）［中高高中中］［3-5-5-3-3］

第4音节带标记的一组：

sae-ggi-dong-ga-ri（断绳子）［中高高高中］［3-5-5-5-3］

第5音节带标记的一组：

mo-ji-rang-his-ja-ri（扫帚）［中高高高高中］

[3-5-5-5-5-3]

下略，因为根据同一原理，可知延续到不管哪一个音节。

此外，许雄博士还有“中中”的音调模式。这一模式的词其实就是他所谓的带助词的“中”型名词；不然的话就是“中”型词干带了词尾的动词、形容词。这一类和所谓的“高”型词，由于句法上可明确区别和规定，故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算作独立的词音调模式。至于do-ro（更、比较）这类副词发成“中中”音，是因为大多数副词平常不担负句子重音，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实际上许雄博士也加了注脚，说这类词的发音也可以作“中高”型。

用音韵标记概括上述庆南型词音调模式，则如下例：

无标记

mal（马）{mar} [3]

ba-ram（风）{ba-ram} [3-5-5]

jin-dal-re（杜鹃）{jin-dar-re} [3-5-5]

第0音节带标记

mal（升）{˥mar} [5]

po-ri（苍蝇）{˥po-ri} [5-5]

mu-ji-gae（虹）{˥mu-ji-ge} [5-5-1]

eong-meo-gu-ri（青蛙）{˥(ə)ŋ-mə-gu-ri}

[5-5-3-3]

第1音节带低标记

mal（词）{Lmar} [1]

sa-ram（人）{˪sa-ram} [1-3]

geo-mu-ri（蛭）{˪gə-mu-ri} [1-3-3]

第1音节带高标记

ha-neul（天空）{ha˥-nər} [5-1]

ga-mu-chi（鳢鱼）{ga˥-mu-ci} [5-1-1]

us-eum-ggeo-ri（笑柄）{us˥-ən-ggə-ri} [3-5-1-1]

第 2 音节带标记

gga-ma-gu（乌鸦）{gga-ma˥-gu} [3-5-1]

ddaeng-ddaeng-i-jung（托钵僧）{ddeŋ-ddeŋ˥-i-juŋ} [3-5-1-1]

ga-un-de-son-gga-rag（中拇指）{ga-un˥-de-son-gga-rag} [3-5-1-1-1-1]

第 3 音节带标记

jjeol-rug-bal-i（瘸子）{jjər-rug-bar˥-i} [3-5-5-1]

a-gga-si-a-ggoch（洋槐花）{a-gga-si7-a-ggoc} [3-5-5-1-1]

第 4 音节带标记

sae-ggi-dong-ga-ri（断绳子）{se-ggi-doŋ-ga˥-ri} [3-5-5-5-1]

第 5 音节带标记

mo-ji-rang-bis-ja-ri（扫帚）{mo-ji-raŋ-bis-ja˥-ri} [3-5-5-5-5-1]

这样，具有庆南型词音调的名词，在音韵层次上首先可分为带标记和不带标记两类；带标记的又可根据出现在哪个音节再分类。出现在第1音节的可分为低标记和高标记两类。

这个第 1 音节分出来的高低，醒目地使人想起日语近畿方言重音中所谓“下上型”的甲乙对立（参阅服部四郎〈关

于三重县龟山町地方的双音节词〉，《音声学协会会报》第11号，1928年11月）。比这更吸引人的是，只有在第1音节带标记时才有必要分别高低（参阅尼古拉·包培教授前引书）。然而，尤其有意义的是，在朝鲜，越往南，音调系统越复杂，越往北，变得越简单；一到汉城方言，音节标记就变得很不重要了（咸镜道方言，前已谈到由于历史上有计划的人口迁移除外）。表中低标记的音韵记号，依服部四郎博士作{ ˪ }（〈关于日语琉球方言〉，《文学》第3卷第1号，1968年1月，第13页）。

4.4.4. 词音调系统的变化原理

庆尚道方言的词音调系统，按庆南型、庆东型、庆西型的顺序，与大陆"方言"的音节音调系统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同：从南向东，然后向西北，从复杂的结构转向简单。对应于这一区域分布的模式，朝鲜语有没有"纵"的演变（历史变化）呢？

对这个问题，为了采取明确的理论观点，必须先弄清庆南型和庆东型，或庆东型和庆西型之间的差异是怎样形成的，其实际过程或途径又是怎样。事实上我们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一直对庆尚道方言词音调进行音韵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构成音韵系统的必要而充分的特征——音韵学上有价值的音位要素——为基础的整个系统没有形成为公式（formulation），就不可能毫不含糊地确定产生这些差异的规律。

4.4.4.1 庆东型和庆西型

先从结论上说，庆西型和庆东型的关系可以说是单纯的

简化关系。从庆东型除去标记在不同音节部位的变体，就成了庆西型。现在让我们利用梅田教授的资料（〈庆尚北道漆谷方言（朝鲜语）的重音〉，22页以下），将清晰地看到庆东型及庆西型的词音调模式与中期朝鲜语的“旁点”标记的对应：

单词	中期语	庆山方言	漆谷方言
土	平	heul { hɯr }	heug { hɯg }（下降型）
箱子	上	gwi { ˥gwii }	gi (gii }（平板型）
身体	去	mom { ˥mom }	mom { ˥mom }（平板型）
布袜子	平平	beo-seon { bə-sən }	bo - seon { bo-sən }（平板型）
生命	平上	mog-ssum { mog ˥-ssum }	mog-ssum { mog˥-ssum }（下降型）
昨天	平去	eo-jae { ə ˥-je }	eo-ji { ə ˥-ji }（下降型）
人	上平	sa-ram { ˥saa-ram }	sa-ram { saa-ram }（平板型）
商店	上去	ga-gae { ˥gaa-ge }	ga-gae { gaa-ge }（平板型）
柿子	去平	ggwae-yang { ˥ggwe-yaŋ }	ggi-yeom { ggi-yem }（平板型）
磨刀石	去上	su-teul { ˥su-tɯr }	su-ddul { su-ddɯr }（平板型）
图画	去去	gi-rim { ˥gi-rim }	geu-rim { gɯ-rim }（平板型）

指头	平平平	song-gga-rag {soŋ-gga-rag}	song-gga-rag {soŋ-gga-rag}(平板型)
袋子	平平去	ju-mung-i {ju-muŋ˥-i}	ju-mu-ni {ju-mu-ni} (平板型)
鳢鱼	平去平	ga-mu-chi {ga˥-mu-ci}	ga-mu-chi {ga˥-mu-ci} (下降型)
旅客	平去去	na-geu-nac {na˥-gɯ-ne}	na-geu-nae {na˥-gɯ-ne}(下降型)
呵欠	上平去	ji-ji-gae {˥jii-ji-ge}	ji-ji-gae {jii-ji-ge} (平板型)
瘊子	上去去	sa-ma-gu {˥saa-ma-gu}/{sa-ma˥-gu}(变体)	sa-ma-gu {saa-ma-gu}(平板型)
虹	去平去	mu-ji-gae {˥mu-ji-ge}	mu-jul-gae {mu-jur-ge}(平板型)
寡妇	平平平平	ho-bu-rae-bi {ho-bu-re˥-bi}	ho-bu-rae-bi {ho-bu-re-bi} (平板型)
花蕾	平平平去	ggo-bbong-o-ri {ggo-bboŋ-o˥-ri}	ggo-bbong-o-ri {ggo-bbog-o-ri} (平板型)
蜥蜴	平去去去	do-ma-bae-mi {do˥-ma-be-mi}	do-mae-baeng {do˥-me-beŋ} (下降型)

浏览一下这些对应，立刻可以发现：

（1）庆山方言第1音节带标记的词，漆谷方言也是第1

音节带标记；

（2）庆山方言第2音节以下出现标记的，漆谷方言全部变成无标记（“平板型”）

（3）庆山方言第0音节带标记的单词，在漆谷方言里除单音节词外全无标记。

简言之，只要对庆山方言运用下面这条规则，就成了漆谷方言的词音调模式：

规则　除单短音节的词外，第1音节外的标记全部取消。

这里加了“除单短音节的词外”这一条件，故而象下列词，虽然是单音节，但有两个短音节，于是也可以根据本规则预知在漆谷方言里对应的词音调：

gwi {˥gwii}（箱子）　（漆谷：gi {gii}）
mi {˥mii}（坟墓）　（漆谷：mi {mi}）
sae {˥see}（鸟）　（漆谷：sae {see}“麻雀”？）
nun {˩nuun}（雪）　（漆谷：nun {nun}）

这种关系，只能看作是一方（庆东型）向另一方（庆西型）单纯变化的结果。抽象一些说，就是在某个词音调系统中，单纯地（即不需要考虑下位规则间的应用顺序或别的变化规则的应用顺序）应用单一规则（即不带下位规则）而建立起来的词音调系统，就是一方向另一方的“单向”或“单程”（one-way）演变的结果。

从庆山方言向漆谷方言的词音调系统的推移，并非依照上面的规则一次完成，实际的推移过程，很可能要复杂得

多。只要对印欧语或日语的重音系统也作一番周密的调查，就会发现，不只是单纯地把重音标记移前或置后，而且移到哪个音节（哪个短音节）前，或者哪种类型一律置于某个音节，哪个类型不置于某一音节，等等，发生的变化各种各样。据梅田教授描写，漆谷方言词音调的“平板型”，除了单短音节词和双短音节词外，首尾的短音节都“有发音偏低一些的倾向”。我们不妨设想，该方言里曾经存在过下面的状态：

（a）与第1音节有关的标记照旧不变。

（b）第2音节以下出现标记，就全部转移到“第二尾音节”（penultimate，倒数第2音节）【有点象古希腊语的“倒数第2音节重读”paroxytone】。

（c）无标记词照旧不变。

我们想，今天的“平板型”大概就是（b）和（c）的词对立的中和吧。不作这样的设想，那么双短音节“平板型”词中的第2短音节必须“发音偏高一点”，——而且末尾音节偏低的现象只能出现在三个短音节以上的词里，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自然，这一切都是推测。只得等待将来对庆尚道诸方言做更周密的调查来发现处于上述阶段的方言，否则，就无法证明。目前已经得到的证据，就是如漆谷方言那样的单短音节词中词音调的不规则性（它表现为161页规则所适用“条件”限制的形式）。它的实际变化过程怎样，并不影响上述对词音调系统演变方式的抽象分析。因而上面假定的（b）的状态，与作为（c）的结果产生的音调相中和，先发生还是后发生，在音韵对立上其结果是不变的。

4.4.4.2 庆东型和庆西型

但是，庆东型和庆南型间的关系则颇不相同。比如金海方言和庆山方言，其词音调和中期语的"旁点"有如下对应：

单词	中期语	金海方言	庆山方言
土	平	heul { hər }	heul { hɯr }
箱子	上	gae { ˪ ge }	gwi { ˥gwii }
身体	去	mom { ˥mom }	mom { ˥mom }
牛蒡	平平	u-bung { u-buŋ }	u-beong { u-bəŋ }
生命	平上	mog-ssum { mog˥-ssum }	mog-ssum { mog˥-ssum }
昨日	平去	eo-ji { ə˥-ji }	eo-jae { ə˥-je }
女人	上平	ji-jib { ˪ji-jib }	ji-jib { ˥jii-jib }
雾	上去	ang-gae { ˪ aŋ-ge }	ang-gae { ˥aaŋ-ge }
柿子	去平	ggae-am { ˥gge-am }	ggwae-yang { ˥ggwe-yaŋ }
芝麻	去上	cham-ggae { ˥cam-gge }	cham-ggae { ˥cam-gge }
图画	去去	geu-rim { ˥gə-rim }	gi-rim { ˥gi-rim }
漆树	平平平	on-na-mu { on-na-mu }	on-na-mu { on-na-mu }
袋子	平平去	ju-mu-ni { ju-mu˥-ni }	ju-mung-i { ju-muŋ˥-i }

嫂子	平去平	a-ji-mae { a˥-ji-me }	a-ji-mae { a˥-ji-me }
媳妇	平去去	mae-neu-ri { me˥-nə-ri }	mi-neu-ri { mi˥-nɯ-ri }
蛭	上平去	geo-mu-ri { ˪gə-mu-ri }	geo-meo-ri { ˥gəɔ-mə-ri }
瘊子	上去去	sa-ma-gu { ˥sa-ma-gu }	sa-ma-gu { sa-ma˥-gu } / { ˥saa-ma-gu }（变体）
虹	去平去	mu-ji-gae { mu-ji˥-ge }	mu-ji-gae { ˥mu-ji-ge }
寡妇	平平平平	ho-bu-rae-bi { ho-bu-re˥-bi }	ho-bu-rae-bi { ho-bu-re˥-bi }
蜉蝣	平平平去	ha-ri-sa-ri { ha˥-ri-sa-ri }	ha-ro-sa-ri { ah-ro-sa˥-ri }
蜥蜴	平去去去	do-ma-bae-mi { do-ma-be˥-mi }	do-ma-bae-mi { do-ma-be ˥-mi }

就与中期语的对应这一点来说，上面所列的只不过表示了大致的倾向，一到细微之处则种种例外不少。比如在中期语“平平平”相对应的词中，庆山方言并非没有第 2 音节带标记的情况：

song-gga-rag { soŋ-gga- ˥rag }（指头）

ggo-sa-ri { ggo-sa ˥-ri }（蕨菜）

相反，金海方言并非没有第 3 音节带标记的情况：

bu-si-reom { bu-si-rəm˥ } （疙瘩）

对应于“平去去”的庆山方言里，标记移到第 2 音节的词很多：

neo-gu-ri { nə-gu˥-ri } （狸）

beo-beo-ri { bə-bə˥-ri } （哑巴）

前一词在金海方言里也是第 2 音节带标记：

neo-gu-ri { nə-gu˥-ri }

与“上去去”和“去平去”对应的庆山方言的词音调正好相反。当然化成下面的样式应该也行，但现状却跟它并不相同：

sa-ma-gu { ˥saa-ma-gu } （瘊子）

〔同一庆东型的安东方言就有这一调型〕

mu-ji-gae { mu-ji˥-ge } （虹）

〔参照庆山bu-hing-i { bu-hiŋ˥-i } “猫头鹰”〕

然而这些多音节词的对应，只以极有限的例子为根据。所以要确立严密的对应规则，还希望进行更详尽的调查。这一些我们暂且不管。从仅有的这些例子也可以引出下面的结论：

（a）金海方言的低标记，在庆山方言成了高标记。

（b）反之，庆山方言的长元音音节，在金海方言成了短音节。

由此看来，金海方言和庆山方言的关系，跟一向传信的事实不同，不是父子关系也至少有点象兄弟或表兄弟的关系。——但是，在这些方言的“父母方言”中，比如与“箱子”相类似的词的情况似乎已经清楚：

（1）含有所谓长元音（这一特征，在金海方言里消失

了，但庆山方言还保持着）；

（2）大概还带低标记（这一特征，庆山方言失去了，但金海方言却保持着）。

如果再考虑一下前述多音节词对应的不规则性，人们也许会发现，这两个方言之间的关系比表兄弟关系更远。这一点也急待对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交界地区的方言的词音调系统进行系统的调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十分乐观。就外观看，庆南型方言和庆东型方言的词音调恐怕相差不大。作为语言学上的证明，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设想。

中期朝鲜语的词音调系统里，不明之处尚多。我们暂时解释为：中期朝鲜人就用“平”或“上”这个“旁点”来表示构成中期语词音调在各音节（短音节）中的高低；这些“旁点”虽然抽象，但不妨看作是极符合语音学理论的记号。比较中期语、金海方言、庆山方言，马上可以发现这一事实：现代方言的词音调音位系统，完全是根据中期语的第1音节的音调来决定的。总之，

（1）中期语第1音节若刻上“上”的标记，则金海方言变成第0音节带标记的单短音节词；庆山方言变成第0音节带（高）标记的双短音节词。

（2）中期语第1音节若刻上“去”的标记，金海方言和庆山方言，不管后续音节标记如何，都变成第0音节带高标记。

（3）中期语只有在第1音节刻上“平”的标记的场合，对应规则有点复杂：（a）如果后面不接“平”，则金海方言和庆山方言都是第1音节出现标记；(b)一旦后面接

“平”，则第2音节出现标记，不然便不出现（无标记）。

（4）与中期语对应，讨论四音节以上的词音调类型有点危险，因为我们的例子太有限了。不过金海方言似乎和庆山方言一样，三个以上“平”连续出现，就成了第2尾音节带标记的词。

金海方言和庆山方言的不同，是由于对祖语应用了不同演变规则的结果。总而言之，刻着“上”标记为始音节的词，金海方言可以应用缩长元音为短音节的规则，庆山方言则可以应用把低标记变为高标记的规则。

4.4.5 朝鲜语单词音调系统的区域性推移

前已指出，中期朝鲜语词音调系统的音韵性质不明之处还很多。这里所述的音韵分析，如果是针对现代方言的词音调系统，阐明了它们的结构原理和推移规则，基于这些原理和规则，从而揭示中期语词音调系统的日子，不是为期不远了吗？虽然现状还相当差，但是从我们进行的观察和分析中，可以指出下面几点。

首先，如果考虑一下中期语文献上的“旁点”的种类，和它在词的连续方式中有很强的限制（比如“平上”型，作为词并不存在；河野博士举的“上上”型、“去上”型例子，不能认为是名词），那么就不能把它看作是布龙菲尔德所说的主音位（primary phoneme），而可能是刻在单词上的次音位（secondary phoneme）标记。比较一下也就会知道，它们跟汉语或台语中所说的声调非常不同。如果音调的不同是主音位，那它在词中的体现就不应该受到这么强的限

制。中期语的“旁点”，表示每个词的音调，从它跟前引各现代方言的对比来看，这一点是不该有疑义的。

其次，构成中期语词音调的音韵要素，对名词来说，只要具备下面三点就够了——（i）音节标记的有无，（ii）有标记的话在词的哪一个音节，（iii）只有带首位标记才有高低的不同。这一些，在现代方言的区域分布上反映出从南向北的“横”的推移，越往南音韵要素越多，越往北越少。

最后可以指出，在词首位音节里似乎还有过某种性质不明的音韵要素支配该词音调的实现。这一点既能从中期语“旁点”出现在词首位的方式中窥测到，而且也反映在现代方言的词音调系统里。

这样看来，处于亚洲大陆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其语言类型将显得十分清晰。它形成了大陆情况的精彩的缩影。这一事实，由于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有关词音调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4.5 音高和重音

由以上朝鲜语（庆尚道方言）词音调的音韵性质的调查可知，即使同样是音调语言（广义的音调语言），在音韵范围内，不同的语言，音调会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在这里把音调的运用方法，依程度的轻重归纳如下：

（1）如所有语言里看到的语调那样，由句子决定；

（2）如朝鲜语“庆西型”音调，或日语鹿儿岛方言那样，由各单词有没有音调标记来决定；

（3）如朝鲜语“庆东型”音调，或日语东京方言那

样，不仅由标记的有无，甚至必须由标记在哪里来确定；

（4）如朝鲜语“庆南型”或日语京都方言那样，不仅根据标记的有无及位置，甚至还有必要标出它的高低。

这样，音调运用程度虽然形形色色。但上面所举各语言在音调运用上有共同的特色，那就是：这些音调特征在音韵层次上，作为复音节词固有的特征，是把存在于音节间的相对音调抽象化而得来的模式。因而在语音学上只要把它替换成音节间相对强度的不同，就可以获得象英语那样的所谓“重读重音”。而且，事实是不管朝鲜语还是日语，在语音学上的体现决不仅仅是声音高低那么单纯。它的声学实体尚不能很清楚地说明。但正如早就指出的，它也是包括强度在内各种特征的重叠。

与此相对，高度运用音调就象运用普通的单音一样的广州话或台语，其音调上的特色不仅成为音节间相对高低的特征，而且成为音节内音调时间性变化的特征。有人把它看作是元音的特征之一。但这并不确切。因为在这些语言里，单纯的辅音构成音节时也可以充分带上音调特征。而且，在这样的音节音调（声调）场合，语音学上的体现也不只是声音的高低。用以区别广州话第2声（低平，也记作低降）和第6声（低平）的声门化（第2声），区别海南岛“军话”第2声（低降）和第3声（低平）的声门化（第2声），以及在越南语河内方言第2声（giọng sắc 锐声）和第5声（giọng ngã 跌声）间所见喉头化的不同等，都明确显示出所谓声调的不同不只是声音高低的不同。正如广州话或台语中看到的，韵尾有如下不同的事实：

[-m] ： [-b̚]（普通写作-p）

[-n]　:　[-d̥]（普通写作-t）

[-ŋ]　:　[-g̊]（普通写作-k）

中国传统音韵学把它们看作是"舒声"与"入声"声调的不同。有了这样的看法，比如广州话里具有同样音节音调的下面几对词，它们的区别才被公认为是声调的区别：

{ [ta:n]（旦）——中平调＝"去声"
{ [ta:d̥]（类别词）——中平调＝"入声"

{ [sa:n]（散）——中平调＝"去声"
{ [sa:d̥]（撒）——中平调＝"入声"

{ [lɔ:ŋ]（浪）——中平调＝"去声"
{ [lɔ:g̊]（落）——中平调＝"入声"

我们想，之所以有人把这种声调（音节音调）完全认为是声音的高低问题，可能跟对"声调"实体的传统音韵学解释有关。传统音韵家的说明是极其暧昧的。到了本世纪初才有科尼利厄斯·布雷德利的实验语音学作出说明（The tone-accents of two Chinese dialec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5 (1915), pp.199—206）。他指出，声调基本上是音高的时间变化。布雷德利的说明其实很不完备。但因为他阐明的声调的语音学本质是那么详明，以致世界语言学界从此有了成见：声调完全是音调的高低。这成见是一种对前代模糊说明的"过火"看法。从60年代起就表明，要对它作新的考虑。比如吴南氏把高音调和重音的关系比作腭化辅音和前舌（高）元音的关系（*Prosody and Phonology*, 1969, p.4）；服部四郎博士观察到北京话那样已简化的声调，第1声（高平调）和第2声（升调）在音节内为后部强，第3声（低调）和第4声（降调）为前部强（＜重音素

及其区别特征是什么？ >，第11页）。

不管声调语言还是重音语言，我们认为它们都不是超语段音位的语音实体（语音学上的体观）的不同。关键在于这些要素作用的不同，是它们在各种语言的音形构造上起了什么作用。在声调语言里，五种音节也好，六种音节也好，可以用超语段音来区别，因为音调只不过发生在很短的一个音节里，由于强度变异的变异体有限，所以音调因素才成了主要因素。相反，在重音语言里，因为说这种语言的人在复音节间造成超语段音的变异体，所以重点放在哪个音节，强度就可以造成和音调几乎相同的变异类型。

4.6 从声调语言移向重音语言

现在我们回到本题上来。广州话或台语那样的单音节声调语，移向阿尔泰语那样的复音节重音语．这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有没有这种推移的可能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推移机制吧。

4.6.1 加重重音支配的音调

在北京方言里很早就提出了"重读"或"轻读"的问题，虽然这跟我们所讨论的亚洲大陆语言地理类型学上的推移这一观点和展望完全是两回事，这里指的是朴素的观念。汉语的词是用一个个汉字记录的，但作为语言，在发音时一个个汉字轻重并不相等；有的字"重读"，有的字"轻读"。对这一传统的朴素观念给以科学分析的，首先是俄罗斯出生的天

才语言学家叶甫根尼·波里万诺夫。他说，在汉语（北京方言）里"事实上除了音节音调以外，还有覆盖在词上的一定的加重重音。而且音节音调的实现，正是那个加重重音支配着"。

波里万诺夫似乎考虑过卡尔·阿连德所建立的十三个加重重音规律（*Handbuch des Nordchinesischen Umgang Srprache*，1891、Stuttgart und Berlin：W.Spemann，第135页以下），归纳出汉语词的三级加强重音，把各音节的相对强度，按强弱用1.2.3来表示，区分出了如下三种加重重音（А·И·Иванов и Е·Д·Поливанов：*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ло Китайсколо Языка*，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имениН.Н.Нариманова，XV·Москва：Изд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1930，pp.193—198）：

（1）1＋3型：bái（白）tian（天）
kàn（看）kan（看）
（2）1＋1型：fù（父）mǔ（母）
jiě（姐）mèi（妹）
（3）2＋1型：chī（吃）fàn（饭）
xiě（写）zì（字）

波里万诺夫的这个崭新的观点，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这一著作长期不能在西欧语言学界得以流传，成为西欧读者只是听到过而没有看到过的一种传说性著作；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过早逝世，长期得不到社会重视，因而未得以深化和发展。因此在用他的观点处理词的重音型和形成词组或句子时的加强重音的变移问题上，正如例词所示，还没有分开来进行考察。但这和英语重音的研究情况一样，音韵学上的阐明不能不等到1956年乔姆斯基、哈雷和陆柯夫合著的＜关于英

语重音和连音>(“On accent and juncture in English” . *For Roman Jakobson*. 1956, pp.66—80) 的发表。这一论文发表后，英语的加重重音的本质才明白起来，英语的重音表示词固有的强度在句中规律性缩减（reduction）的各个阶段。有了这种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背景，我们才认识到徐世荣的仅仅三页的小论文（《双音缀词的重音规律》，《中国语文》第44期，1956年2月，第35—37页），确实使波里万诺夫提出的问题更深化了。徐世荣在该论文中分现代汉语（北京方言）的“重音”为“重、中、轻”三级，在双音节词里，有“重＋轻”和“中＋重”两种，并从构词法上把适合它的双音节词分为如下10类：

词例＼格式 结构	加重重音型	
	重轻型	中重型
（1）复音单纯词	葡萄　哆嗦	蚂蚁　滋溜
（2）并列结构	眼睛　练习（动词）	图画　练习（名词）
（3）对立结构	买卖　厉害	大小儿　潮干儿
（4）向心结构	工人　饭量儿	皮鞋　开水
（5）动宾结构	枕头　分水（鱼鳍）	出版　吹牛
（6）复合动词	抓住　打开	捣乱　洗净
（7）重叠结构	滴滴儿　看看	天天儿　轻轻儿
（8）叠字词	哥哥　星星	
（9）词　头		第一　老乡
（10）词　尾	椅子　拿着	

就个别例子来说，这种分法不一定没有问题。比如“江西”作“重轻”，“北京”作“中重”，既是（4）的向心结构，又包括在（1）的复音单词结构里，又把如下的分析

性结构：

出版——出了三版

吹牛——吹了一阵牛

与“卫生”、“注意”（动词）一类单词摆在一起处理。另外，（1）到（10）的构词法分类也有相当的任意性。这可以不管它。重要的是在这里暗示了健全的理性主义方法。至于作者是否了解波里万诺夫的研究，那是没有关系的。在这种分类法里，根本不依靠内在或外在的“标志”，而先验地规定加重重音的模式来描写语法。“北京”，作为与“南京”、“东京”（从前的开封）等相对的名称，似乎可以自然地在bĕi（北）跟jīng（京）之间保有某种词素界bĕi jīng；但“江西”，即使存在“江南”那样与它相对的词，作者在音韵上还是先验地规定作一个不包含词素界的词jiāngxī。如“蚂蚁”，因为“蚂”或“蚁”在现代北京话已不能作为自由形式运用，仿佛一看就知道属于“重轻型”，但事实上就当作“中重型”；相反，“扒拉”因为“扒”（剥去）、“拉”（用力牵曳）都也可以作为独立使用的动词，似乎是“中重型”的，但当作了“重轻型”。这是至60年代为止为现代语言学界所不曾有过的做法。

总之，详细考查徐世荣分类的例词，“重＋轻”型的多数是构成一个词汇项目的词，如：

pútao（葡萄）　　　yănjing（眼睛）

相反，“中＋重”型的当作复合词为主，如：

túhuà（图画）（图画<图和画）

píxié（皮鞋）（皮鞋<皮的鞋）

因而，如果在构成“中＋重”型的两个词素中间，假设有一

个词界（word boundary），而把“中＋重”型词看成是有两个要素构成的词，那么汉语（北京方言）的词基本上是在词头带加重重音的“重（＋轻）”这一阿尔泰语模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如下的音韵规则来预测词组或句子中的重音变形（1.主重音，2.次重音，3.三等重音）。例如：

规则（1）　　1＋1──→2＋1

规则（2）　　2＋2──→2＋3

作为例子，试看下面这一个词组：

芝麻＋粒儿＋大＋的＋烧饼

首先，“芝麻”和“烧饼”作为词汇项目就算是1项。所以它们虽然是“重＋轻”型的词，但都可以看作从具有“1”重音的项目这一词符列出发：

芝麻	粒儿	大	的	烧饼
1	1	1	1	1

因为规则（1）和（2）是有顺序的，须先用完（1）之后才用（2）。这样一直下去，就成为如下样式：

芝麻	粒儿	大	的	烧饼	
1	1	1	1	1	出发点
2	1	1	1	1	适用规则（1）
2	2	1	1	1	适用规则（1）
2	2	2	1	1	适用规则（1）
2	2	2	2	1	规则（1）适用完
2	3	2	2	1	适用规则（2）
2	3	2	3	1	规则（2）适用完

这里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各个词汇项目的强度是在所给予的词符列中决定的。比如上述“粒儿”这个词，有人

也许会认为应该接受更强的重音。但这是因为无意中心里有了如下这一词符列而作出的判断：

芝麻	粒儿	
1	1	出发点
2	1	规则（1）使用完

这类规则在实际运用上还有两种制约。一种是词符列的长短，另一种是句法结构问题。这就恰巧与汉语（北京方言）两个第3声相连，前面的第3声变第2声的规则相合：

$$3+3 \longrightarrow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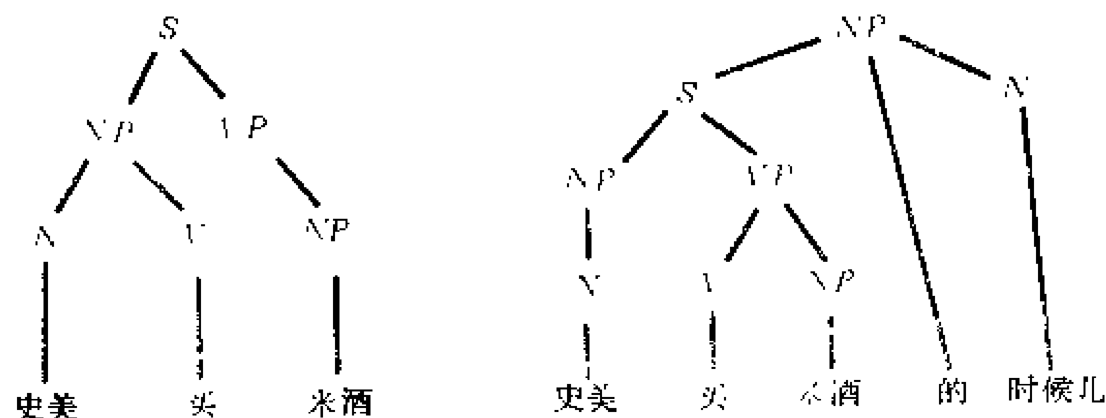
例如将这个规则应用于下面的词符列：

shǐ（史）/měi（美）/mǎi（买）/mǐ（米）/jiǔ（酒）

一般只使用于下面加线的单词，如：

<u>shí</u> měi mǎi <u>mí</u> jiǔ

这是因为shí měi和mǎi mí jiǔ之间，如图11所示，存在着主语和谓语的界线。上述规则一般不越过主语和谓语的界



第11图　上声词句的句式(1)　第12图　上声词句的句式(2)

线。可是图12所示的这种词符列，因为整个作为名词的修饰

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进一步适用同样的规则，除最后一个词外，涉及到全体。例如下面的语符列：

shí měi mái mí jĭu de shíhour

进一步变为：

shí méi mái mí jĭu de shíhour

加重重音的变形也就具有这样的“流动性”！

以上是加重重音与音节音调重叠的例子。各个音节音调的实现，在重音1最明了，2其次，一到3就相当不重视调形（音高时间变化的模式）了。广州话则不是这样。在未经阿尔泰化的广州话里，连名词的后缀甚至也具有清晰的调形发音。比如：

日子［jɐt低平调＋tʃi:升调］

热头［ji:t低平调＋t'ɐu升调］

连附于动词后的“体”的标志，也清晰地具有调形发音：

食咗饭［sek低平调＋tso升调＋fa:n低平调］

食噻饭［sek低平调＋ken升调＋fa:n低平调］

4.6.2 声调和加重重音的相互依存

区域性推移更进一步接近重音语言的是东干语。一到那里，成了声调语言和重音语言的中间状态。在东干语里，加重重音完全可以由声调来预知。反过来，声调也可以根据加重重音来决定两个中的一个。这种富有启发性的语言现象，1936年由龙果夫夫妇首次向学术界报告（Alexander und Katharina Dragunow：“Über die dunganische Sprache”, *Archiv Orientální*, Vol. Ⅷ, No. 1, pp. 39—41）。但对其在地理类型学上的含义，终于没有能理解。

现将它们的组合情况作一简单说明。东干语（作者观察的

是亚力山大罗夫卡方言）有如下四种声调：

第1声—低降调（相当于北京方言的“阴平声”）

第2声—低升调（相当于北京方言的“阳平声”）

第3声—高降调（相当于北京方言的“上声”）

第4声—高升调（相当于北京方言的“去声”）

只是因为第 1 声和第 2 声的对立在词组末了中和而成了一个低平调，所以在词组末了只有三种声调。词的加重重音，其中第一音节是第 3 声和第 4 声，便无条件地由该音节承当。如果第 1 音节是第 1 声或第 2 声，就移向下面的音节。最好的例子是数词。现把东干语的数词的声调用小写数字标记在各音节的右上角，加重重音用 ˥ 记号，描写如下：

йиў^{1}（1），лян^{3}（2），сан^{1}（3），сы^{4}（4），

вў^{3}（5），лю^{1}（6），ци^{1}（7），ба^{1}（8），

жю^{3}（9），ты^{2}（10），бый^{1}（100）

第1音节是第3、4声，就变成：

444 = сы^{4}˥бый^{1}сы^{4}˥шы^{2}сы^{4}˥гə^{1}

999 = жю^{3}˥бый^{1}жю^{3}˥ты^{2}жю^{3}˥гə^{1}

第1音节是第1、2声，就一定是这样：

333 = сан^{1}бый^{1}˥сан^{1}шы^{2}˥сан^{1}гə^{1}˥

888 = ба^{1}бый^{1}˥ба^{1}шы^{2}˥ба^{1}гə^{1}˥

结果出现如下的现象，比如下面成对的词：

{гў^{1}зы^{3}谷子（稷） гў^{3}зы^{3}股子（份儿）}

{тўн^{2}зы^{4}（同志） тўн^{3}зы^{3}（筒子）}

它们在声调上构成这样的对立：

{1 + 3（谷子） 3 + 3（股子）}

{2 + 4（同志） 3 + 3（筒子）}

加重重音方面也构成如下对立：

(0 ˥+0（谷子）　　　0+0˥（同志）
(0 ˥+0（股子）　　　(0 ˥+0（筒子）

也就是说，因为两种不同的超语段音位重叠，所以很难找得出完全的最小音差的一对词（minimal pair）。

另外，因为各个词里加重重音的发生是循环的（cyclical），如果出现下列的单词：

чуон²чуон³зы³（闯闯子〈小窗子〉）

чуон²чуон²зы³（床床子〈床铺儿〉）

它们的加重重音便成为这样：由于"闯闯子〈小窗子〉"的第1音节是第2声，第2音节是第3声，其重音模式就按前述规则变为：

{0+0+ ˥0}

但"床床子〈床铺儿〉"的第2音节也是第2声，重音就移向第3音节，整个词的重音模式变成了下面这样（Мухаме Х. Имазов. Фонетика Дунга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Фрунз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ЛИМ", 1975, pp.132—135）。

{0+0+0 ˥}

这两种超语段音位的重叠，给了语言学很大启发。现在要是有下面两句句子：

му¹жён⁴（木匠）+щə³ли³（写了）+
фў¹зы³书子〈信〉

ва¹ва³(娃娃〈孩子〉)+тин¹жян⁴（听见）+
щын¹йин³（声音）

其强度重音就自动地规定成这样：

00˥（木匠）+0˥0（写了）+00˥（书子）

001（娃娃）+001（听见）+001（声音）

仅此已可看出，音韵标记的类型跟朝鲜语（庆东型）或日语（东京方言）简直一模一样！反过来，一旦带上这种加重重音的标记，其声调是第1声还是第2声，或第3声还是第4声，也就自动规定如下：

1/2 3/4（木匠）+3/4 1/2（写了）+1/2 3/4（书子）

1/2 3/4（娃娃）+1/2 3/4（听见）+1/2 3/4（声音）

特别因为在词组末了。没有第1声和第2声的对立，所以被单一地规定为第 1 声。总之，在加重重音已经确定的音韵标记里，只要已知声调的升降特征，各个音节的声调就能正确地予以预测。

因为东干语长期处于阿尔泰语系中间，我们知道它正是从声调语言移向重音语言的例子。既然理解了声调和重音的这一组合机制，也就不难设想从重音语言向声调语言的推移了。在日语里虽然是局部地存在，但还是能看到这一情况的。例如东京方言的元音［i］和［u］，一出现在清辅音之间，就几乎都变成清音。让我们听一听下列词的发音（其中“鲱”字有两种不同重音）：

[hāʃ（sa-e）]（连“开头”也）<[haʃi̥](-sae）]
[1-5-5-1]　{hasi̥（-sa˥e）}

[hàʃ（sa-e）]（连“筷子”也）<[haʃi̥˥（-sae）]
[5-1-1-1]　{ha˥si（-sa˥e）}

[háʃ(sa-e)](连“桥”也)<[haʃi̥](-sae)
[{hasi˥(-sa]e)}　[1-5-1-1]

[kīs（sa-e）]（连 “鉟” 也<[kisu̥（-sae）]
[1-5-5-1]｛kisu（-sa˥e）｝

[kìs（sa-e）]（连“接吻” 也）<[kisu̥（-sae）]
[5-1-1-1]｛ki˥su（-sa˥e）｝

[kís（sa-e）]（连“鉟” 也）<[kisu̥（-sae）]
[1-5-1-1]｛kisu˥（-sa˥e）｝

这些词本来都是双音节的。但因为i或u在清辅音当中被清化，于是象｛ha˥si｝[haʃi] [5-1]（筷子）这个词变成了[haʃ][5-（1）]，也就是说，本来是两个音节的高低音，现在变成了CVC的单音节而带降调的一个词！｛hasi｝[haʃi] [1-5]（开头）本来没有“重音核”，在实际发音时带微升调；但其升调也不象｛hasi˥｝[haʃi[1-5]（桥）那么显著。这样，我们可以说日语中也有平调词、高降调词和低升调词吧。事实上理查德·皮特曼博士他们也尝试用与此很相似的音韵标记来创立喜玛拉雅地区各语言的声调发生模式，可惜还没有公开发表。

与此相反，重音语言究竟能不能把声调概括在内呢？日本古代传下来的“声明”，可以说忠实地保存了唐代汉语（古都长安——现在的西安——的方言）声调。也可以说是日语概括声调的例子。但它是为了念经而记录的唐代汉语声调调值的形式，所以性质稍有不同。在这一点上真正有趣味的是地理上接近中国的朝鲜汉字念法。据徐在克博士说，在中世纪，当庆尚道方言接受汉语借词时——或至少在朝鲜造“汉字”时——，曾使它们的声调适合于自己语言的词音调类型，至今还存在着整齐相配的痕迹。比如李朝的王名：

王名	汉语声调	庆山方言词音调	
1. 太祖	仄＋仄	{˥0＋0}	[5-5]
2. 定宗	仄＋平	{˥0＋0}	[5-5]
3. 太宗	仄＋平	{˥0＋0}	[5-5]
4. 世宗	仄＋平	{˥0＋0}	[5-5]
5. 文宗	平＋平	{0＋0}	[1-5]
6. 端宗	平＋平	{0＋0}	[1-5]
7. 世祖	仄＋仄	{˥0＋0}	[5-5]
8. 睿宗	仄＋平	{˥0＋0}	[5-5]
9. 成宗	平＋平	{0＋0}	[1-5]
10. 燕山	仄＋平	{˥0＋0}	[5-5]
11. 中宗	平＋平	{0＋0}	[1-5]
12. 仁宗	平＋平	{0＋0}	[1-5]
13. 明宗	平＋平	{0＋0}	[1-5]
14. 宣祖	仄＋仄	{˥0＋0}	[5-5]
15. 光海	平＋仄	{0˥＋0}	[5-1]
16. 仁祖	平＋仄	{0˥＋0}	[1-5]
17. 孝宗	仄＋平	{˥0＋0}	[5-5]
18. 显宗	仄＋平	{˥0＋0}	[5-5]
19. 肃宗	仄＋平	{˥0＋0}	[5-5]
20. 景宗	仄＋平	{˥0＋0}	[5-5]
21. 英祖	平＋仄	{0˥＋0}	[5-1]
22. 正宗	仄＋平	{˥0＋0}	[5-5]
23. 纯祖	平＋仄	{0˥＋0}	[5-1]
24. 宪宗	仄＋平	{˥0＋0}	[5-5]
25. 哲宗	仄＋平	{˥0＋0}	[5-5]
26. 高宗	平＋平	{0˥＋0}	[5-1]
27. 纯宗	平＋平	{0＋0}	[1-5]

看了这个一览表，我们可以承认下面三条有条有理的规律：

（1）平+平为升调（{0+0}，无标记）

（2）平+仄为降调（{01 +0}，标记在第1音节）

（3）仄+其他声调为平调{10+0}，（标记在第0音节）

李朝27代君王名字中，只有一个例外，即“高宗”为降调（虽是“平+平”，标记却在第1音节）。不过，这个“高宗”在庆尚北道的安东方言里（李槿淑夫人的发音），便也完全符合规律，成了升调（无标记）。有了如此规律的对应，我们不得不认为，在与中国接壤的朝鲜，遇到借用的汉字时，不仅语段音位，而且它的音节音调也按适合自己语言词音调的一定类型，齐整地加以吸收（加在中期朝鲜语的“汉格尔”表记上的“旁点”，有人解释为汉语式的“声调”标记，这并不是无缘故的）。而且如前所述，这种吸收是充分可能的。因而随之使人想到，日语既然同样是重音语言，难道在日本就没有发生同样的“吸收”现象吗？残留在现代日语中的汉字词，由于借用的时期很混杂，而且日本自造的汉字词也非常多。所以根据这些资料，想系统地阐明是否发生过这么回事，恐怕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如果有以“汉音”为正音的平安时代（8世纪到12世纪）以来的特定作者著作的资料，或许有万一的可能发现同样整齐的对应。当然，这样的研究要借助于日语重音史的研究，并且将会对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巨大贡献。

第五章　结　论

5.1 地理类型学家所说的"祖语"

在本书中，我们首先谈论了人类语言随着时地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其类型大致分为"牧畜民型"和"农耕民型"。印欧（古代）人和阿拉伯人，因为畜牧和通商，人口急剧移动，形成了"生气勃勃"的区域集团。所以他们的语言比较容易建立起谱系。相反，以定居农耕为主的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渐渐向周围扩展，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只有通过语言结构的区域性外貌变化，同时尽可能与"纵"的演变相对照，才能追溯到这种语言的亲属关系。——至少，这样追溯语言发展的踪迹，来构拟祖语，方是更有效的方法。而且，印欧语在探索谱系关系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有人口移动规模比较大、直接接触比较少的各种下位语言集团的古代资料。如果仅仅凭现代语言材料，事情就大不相同了。

接着，本书第二章着重论述了东亚大陆诸语言句法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性演变；第三章展现了与类型学比较有关联的基本词汇和语法形态的"横"及"纵"的变化；在第四章里，我们对东亚大陆及其周围语言的音形作了同样的考察，并且整理了它们的"横"、"纵"变化以及内在规律。

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到，东亚大陆语言形成一个完整的连贯体。构成这样一个连贯体的各种变异体的原形概貌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就是基本上单音节的、修饰语后置于被修饰语的、富于类别词的声调语言。对此不再赘述。

这些变异体的原形，无论在地理上、时间上，不可能是位于南北两极之间，后来向南北两端发展而变为现代语变异体的。据我们至今所知，在东亚大陆实际发生的民族移动和社会变迁的脉络，一直是从北向南展开的。从地理类型学的观点看，语言的发展是处于南端或北端，从一方向另一方推移，——至少这样假设才更为合理。这样的推移，由于长时期缓慢的同化，或对方民族的渗透，才得到实现。东亚大陆人口、文化、政治中心的所谓“中原”地带，自古以来，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不知反复多少次的入侵。这里是民族交流的重要舞台，是这种推移最容易发生的区域。有名的“黄巾起义”发生在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之前一个多世纪。有位历史学家据史书记载报道说，那时中原人口实际减少到十分之一。我们不知道这个统计可靠不可靠。有些人类学家，考虑到后来人口的发展，不相信当时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破坏。但是，在中国北方自古有过现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大动荡，这是事实。那么，我们也大致可以设想当时“中原”地区语言集团的变动规模了。

另外，过去一千年间的历史，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原”地区被金、元占领了三个半世纪，清又统治了将近三个世纪；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都处在北方阿尔泰诸民族的控制下。又有一位历史学家报告，“汉人”的移殖在唐末就已延伸到了渤海地区。在辽（契丹）、金（女真）等外族进入

中原前，众多的汉人原来大概也在边外活动着。侵入中原的所谓“外族”，很可能至少有一半是汉人。那么这些民族集团，到底说着什么样的语言，这些语言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这也许是将来要研究的课题。

但是我们一定得提醒，尽管发生过金亡、元溃、清灭，但“亡国”或“灭亡”这个词，丝毫不意味着这些侵入“中原”的民族统统“消灭”（extermination）！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的人口，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契丹的遗民、女真的后裔、满族的子孙。于是，产生了相反的说法，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既是“汉”，又不是“汉”。

恰巧，考古学家也报道，大陆南端泰国东北部拥有公元前几十世纪（用碳14的放射能确定为四五千年前）的青铜器文化（Chester Gorman: “Initial settlement and secondary developm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migration”, 1976），从而要求重新彻底考察东亚大陆的文化史。第三章第一节提到的白保罗博士据此提出与至今由北方（中原）语言文化同化南方语言文化的图式完全相反的见解，他想用南方语言文化向北方传播的形式来建立东亚大陆语言形成的学说（“Early Chinese bprrowings”,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1976, pp.60—100）。遗憾的是他的考察方法不很符合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为了能被语言学家接受，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议论在观点方面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了某些相似的地方。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我们在本书中叙述的这一亚洲大陆语言的“原形”，和比较语言学上所说的“祖语”或“祖形”，含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作为我们总结归纳的一个方面，先来看看它们的不同之处。

农耕民型语的发展，如前所述，假设是从文明的中心地向周围极缓慢地同化的过程，那么这个同化过程中应该有各种不同的阶段。

5.1.1 词汇的同化

词汇部分地替换属于初级阶段。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日语、朝鲜语以及现代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现代日语里没有汉字词汇，日常思想交流就会产生重大的障碍。以莫里斯·斯瓦德什的200个基本词汇看，汉语词或汉字词进人日语基本词汇的有下面几个（数字是斯瓦德什词汇表的序号）：

2.animal：动物

4.ashes：灰

70.heart：心脏

76.to hunt：猎ni iku（打猎）

77.husband：主人（“丈夫”）

95.meat：肉

再加上下面几个稍有疑问的，共计13个词（参考服部四郎：〈关于“语言年代学”即“词汇统计学”的方法〉，《语言研究》第26、27号，1954年12月，44—55页）：

4.to die：sinu（死）

47.to fight：kenka－suru（打架）

95. many: takusan（许多）

153. stick: bookkire（棍子）

172. tongue: shita（舌头）

59a. full: ippai（满）

118a. ripe: jukushita（成熟）

但是，不管是日语还是前面提到的其他语言，同化都不只停留在词汇阶段。甚至可以说，日语在广义的形态学上也接受了汉语的影响。很多日本人相信，日语形态学本身没有受过汉语影响。但是，日语说"yama-nobori"(yama＝山，nobori＝登)，用汉词就不能说"*山登"而说"登山" tozan. 普通日本人往往注意不到日语已经接受了tozan(登山)这个汉语的构词法；必须注意，即使日语固有词汇kawaii（可爱），也没有相当于"*爱可"这种说法。因为构词法基本上反映该语言的句法，所以或者可以说，句法的一部分也涉及到了同化。

现代日本人目睹日语里新词构成的例子，是第二次大战后形成的"Rajio Tōkyō（东京电台）"（rajio＝无线电，Tōkyō＝东京）这种同位关系倒装的说法。当时这个词因为是倒装说法，给人们很新鲜的感觉。当时，有多少日本人对这种"新鲜感"想到了为什么，没有确切统计。但日语不说"*Eki Tōkyō(*驿东京)(车站东京)""而说Tōkyō Eki（东京驿）（东京车站）"．不说"*Gasu Tōkyō（*煤气公司东京）"而说"Tōkyo Gasu(东京煤气公司)"，——这是日本人无意识地保持着日语构词法。所以大多数日本人只能把这个"电台东京"看作是不自觉的欧化。我们不知道这种感觉很快衰弱还是相反更有生命力。不管怎样，有了"电台东

京”以后，很快地涌现出了“电台关东”、“电台大阪”等。但请注意，日本还没有“*Terebi Fuji（terebi=电视台，Fuji=富士），虽然已经有“Terebi Tōkyō”（电视台·东京）。总而言之，如果在“tozan（登山）”和“ka-waii（可爱）”中不带这种特殊语感的话，那么可以说，汉语的同化确实已经融入日语的部分句法。

此外，所谓“拨音”的发生，未必没有语言学家认为这是受汉语“影响”的现象，但因未成定论，兹不赘论。

5.1.2 词汇和句法的同化

不仅词汇，甚至句法也被同化。处于海南岛西北的临高话，由于占优势的汉语因素的渗透，原来的面貌只能在部分构词法和词序结构的基本部分里才看得到。但是，这种同化进行得更为彻底的，是粤语的广州话。它只在少数词汇里残留着它的本来面目（岑麒祥教授，前引论文，第10页），如：

諗[nem^{2a}]（认真考虑）
撩[liu^{1b}]（玩弄）
掟[teŋ^{1a}]（投扔）
腩[na:m^{2b}]（肚子）

在句法结构方面，也有不很象汉语（北方语）的地方（参见第2.3节）。但是因其同化过于彻底，以致一般人不得不怀疑，今天的广州或香港所说的语言是汉语的一种“方言”。高本汉在构拟中古汉语（七世纪初北方的一种标准语）的音韵系统时，也把广州音作为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尽管如此，假如高本汉当时对台语方言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或者台语比较语言学更进步的话，我们相信，或许他会用相当不同的

方式来处理广州音。广州话，不仅它的音韵系统、语音要素，甚至音位配列都很特殊。我们相信完全可能是这样，尽管词汇和句法大部分取自汉语（所以说现代广州话的确是汉语“方言”之一），但其语音系统还固守着自己原来的性质。

这种词汇和句法规则取自别的语言，而只有语音系统保持本来面貌的例子还有许多。就以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第二次大战前，朝鲜人因为国土被帝国主义占领而被迫地说日语。词、语法几乎全是日语的，只有发音是朝鲜语的。又如英语，在印度大陆被何止百万的人说着，至今已形成了英语的一支出色的方言。但是它的语音系统，从各个词的发音方法到句子的语调，不是印度人就听不懂。斯大林举出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основной 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作为语言稳定的内核（真理报，1950年6月20日号）。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把音韵系统也加进去”（服部四郎：〈语言学中的非国际性〉，《东京大学学生新闻》第183号，1957年2月）。之所以很快提出这样的意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广州话的语音系统是多么特殊，多么象广义台语。这里举几个特征来说明。其实，这是调查过中央台语和华南汉语方言的人都知道的（例如参看韩应灵博士的意见，Inga-Lill Hansson, ed. *A Symposium on Chinese Grammar*.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6,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1年．第34页）。

众所周知，汉语曾经具有“平、上、去、入”四种音节音调（声调）。从九世纪起到十四世纪光景，以担负声调的音节的声母清浊为条件，各分为两类。浊声母，一般为低调，中国传统音韵学叫做“阳调”；清音不变，或变为积

对地高调的变体，叫“阴调”。于是，在理论上应该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八个声调。然而在多数现代方言里，其中几个合并了。如北京话，只有阳平、阴平、（阴）上、去（包括一部分阳上声）四种声调。分化得最典型的方言之一，是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的方言，其声调为：

（1）阴平声——高降连奏音调
（2）阳平声——低升降连奏音调
（3）阴上声——高升连奏音调
（4）阳上声——低升连奏音调
（5）阴去声——中平连奏音调
（6）阳去声——低平连奏音调
（7）阴入声——高升断奏音调
（8）阳入声——低升断奏音调

因此，在汉语现代方言里所能见到的声调，只要是古代汉语的直系“子孙”，最多也应该只有8类（在北京话里，不一定没有以声母的送气不送气来分声调——至今被认为是台语的特征——的痕迹，因与本题无关，搁置不论）。但是，广州话除去所谓“变音”，就有9类。那是因为广州话入声的声母清：浊与主元音长：短分合重叠而造成的。更详细地说，包含短元音的阴入声音节，带高调（上入声）；有长元音的音节就发中偏高的音调（中入声）；但这种上入声：中入声的不同，与元音的长：短重叠，于是构成了“互补分布”。而且语言发展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一旦出现这样的“空位”，它就会在那里恰好加以填补。广州话也不例外，现在就有这

样的几对：

中　入　　　　　　上　入

tap[ta:b̥]（答）；tap[ta:b̥]（舐）

tsit[tsi:d̥]（螫）；tsit[tsi:d̥]（使发痒）

pok[pɔ:g̊]（驳）；pok[pɔ:g̊]（支）

入声以元音长短为条件而发生音调分化，这种现象确实是台语的特征。现代泰语的曼谷方言，这种入声的分化，以主元音长短为条件，只见于阳入声；但在壮语天保（今属德保县）方言里则相反，阴入声以元音长短而分为二。因而，从下表所示的对应关系，可知台语的入声曾经一分为四，或

台语入声的分化

条件＼方言		曼谷方言	天保方言	祖台语
清	短元音	22	353/55	$4a_1$
	长元音		42	$4a_2$
浊	短元音	55	33	$4b_1$
	长元音	41		$4b_2$

至少具有分化为四的可能性。李方桂博士1944年在云南省东南部的剥隘语（＜古台语喉塞音及带喉塞音声母对于剥隘声调系统之影响＞，《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第59—67页）里，以及玛里·哈斯教授1958年在泰国南部那空地区的

方言里（"The tones of four Tai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XXIX, part 2, pp. 817—826)，果然发现有以元音长短为条件，将阴入声和阳入声又各分为二的语言（严密的分化条件比上述更为复杂）。而且在汉语里发现得更早，1932年王力教授就报道，在广西博白方言（他自己的方言）里的阴入声和阳入声都分为两类（*Un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de Popei (Province de Kouang-si) —Étudiée à l'áide de la phonétique expérimentale*. Paris: Librairie Ernest Leroux, 1932）。

此外，还有音韵系统的细微之处，广州话也与台语相似。例如，广州话和壮语都有元音长短之分。但音位上有区别的只是[a:]:[ɐ]。其他[e]、[o]、[i]、[u]等，虽然语音学上有[e]:[ɛ:]、[o]:[ɔ:]、[i:]:[ɪ]、[u:]:[ʊ]等差异，但这几对长短元音显示的所谓"互补分布"，没有音位学上的区别（请参看"Phonological redundancy and Cantonese vowels"，《言语研究（日本言语学会）》，第53号，1968年，第101～111页）。短元音[ɐ]，在广州话里跟长元音[a:]一样，基本上自由地出现于任何音节。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ɐ]不能出现在没有韵尾的音节里（即广州话没有[cɐ]这样的音节）。连这一点也跟壮语一样。我们所调查的壮语龙茗方言里也没有[cɐ]这一类音节。

最后，我们提一个疑问，请读者指教。粤语和台语不仅在句法和词汇方面，而且在语音方面非常相似。例如粤语博白方言和壮语横县方言，平上去入各声调的分化和调值差不多相同：

博白话·横县话声调调类和调值

条件＼方言			博白（粤）	横县（壮）
平	清		51（454）	45
	浊		34（131）	13
上	清		33（21）	33
	浊		45（45）	22
去	清		32（26）	53
	浊		21（75）	42
入	清	短	55（53）	55
		长	54（54）	53
	浊	短	32（27）	21
		长	43（42）	42

博白声调，括弧里调值系王力教授描写。

粤语广州方言四声分化，跟壮语北部方言特别相象（标准语武鸣方言在内），平上去入四声各分为阴阳调、入声阴调又分为长短二调，但阳调不按照元音长短分为二调。调值特别近似粤语广州话的是壮语普通话（都安方言）。虽然都安方里阳入声分为长短二调——壮语标准语已定为武鸣方言，但因为都安话系南北部方言的中间型，听懂都安方言的人更多，现在似已为壮语普通话：

广州话·都安话声调调值

条件		方言	广州（粤）	都安（壮）
平	清		55/53	42
	浊		21	231
上	清		35	55
	浊		13	13
去	清		33	33
	浊		22	21
入	清	短	5	5
		长	33	33
	浊		22/2	13:21

两个语言声调调值这么相似，绝不可认为是偶然一致。

现在看看汉壮两语声母的历史分化。

在四个声调各自分为二之前，汉语在它的闭塞音（包括塞擦音）间，存在着如下三项对立：

*p（清音，不送气）

*p'（清音，送气）

*b（浊音）

除了吴语（和湘语及广西的汉语方言的一部分），这种声调二分的结果是，浊辅音：清辅音的对立被声调的阳声：阴声所替换而消灭了（也可认为由于辅音的浊：清对立的消灭，声调分化为二作了补偿）。以往的浊音，除客家话（全部送气音）和闽、粤语及湖北、山西的少数方言（一部分不送气）外，在大部分现代汉语方言里，成了送气清音或不送气清音。

不过这些声母的送气：不送气的分化，是极规则的。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因此，原来来自古代浊辅音的平声字，在现代北京话里，就成为送气音：

弹　tʻan（<*dan）　盘pʻan（<*ban）

情　tʃʻiŋ（<*dʒiɛɲ）　同tʻuŋ（<*dʌŋ）

其他一些变成不送气音

上声

断tuan（<*duan）　伴pan（<*ban）

静tʃiŋ（<*dziɛɲ）　动tuŋ（<*dʌɲ）

去声

但tan（<*dan）　办pan（<*ban）

净tsiŋ（<*dziɛɲ）　洞tuŋ（<*dʌɲ）

入声

达ta（<*dad̥）　钹pɔ（<*bad̥）

籍tʃi（<*dziɛj̊）　独tu（<*dʌd̥）

这一规则唯一例外的是广州话（严格地说是指其口语层）。其承担声调的音节，在"平声"和"上声"时，成为送气音：

平声

弹tʻa:n（<*dan）　盘pʻu:n（<*ban）

上声

t'ü:n（<*duan） 伴p'u:n（<*ban）

"去声"和"入声"时，不送气：

去声

但ta:n（<*dan） 办pa:n（<*ban）

入声

达ta:d̥（<*dad̥） 钹pa:d̥（<*bad̥）

这是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给广州话刻上的独特特征之一。

台语浊声母和有关的声调在现代壮语里的分化情况不那么简单。但广州话上述特征在汉语方言里却是独有的，这恐怕跟壮语里的分化有关。我们希望在壮语调查方面有经验和知识的读者不吝赐教。

5.1.3 词汇、句法和音韵系统的同化

在第1.2节里已经看到，越是基本词汇差别大的"方言"，实际上本来是不同的语言，只是后来其词汇的大部分以及句法和音韵系统完全被中心语言同化了；现在作为该中心语言的"方言"，仅仅在非常基础的词汇和部分构词法里还有若干它的本来面貌的残余。如果不这样解释，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为什么基本词汇出现很大不同，这就变得不可理解了。

举闽语为例（数字是莫里斯·斯瓦德什基本词汇表的序号）：

单词	闽北（福州方言）	闽南（厦门方言）	闽西（建阳方言）
10. many(多)	se^{3a}	$tsue^{3a}$	lai^{3a}
62. to kill(杀)	$t'ai^{1b}$	$t'ai^{1b}$	hoi^{1b}
99. dry(干)	ta^{1a}	ta^{1a}	lio^{5}
123. wet(湿)	(sei^{4a})	tam^{1b}	$tsie^{4a}$
127. leg(脚)	$k'a^{1a}$	$k'a^{1a}$	$k'au^{1a}$

别说现代汉语里，就是古代文献里也不能找出跟它们同系的词。这样的词是极基本的，绝对不能认为是借用成分。也许有人会说，《说文解字》、《方言》等古籍里有“骹”字就是k'a（脚）、有“刣”或“治”字就是t'ai（杀），不就统统是汉语词吗？我们觉得这不是很好的解答。我们要反问：难道一个字一记载进汉文古籍，就统统都算是汉语词吗？这样所称的“汉语”到底是什么汉语？我们所要阐明的是，为什么“骹”字、“刣”字分布在中国南半部，在北半都如此之少，正如“江”字在南方而与北方的“河”相对。这正是我们在考虑的，汉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5.2 总　　结

我们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人类语言的所谓“谱系关系”或“亲属关系”。

共同的祖语分为若干种语言时，一般认为是这样的途径：本属同一语言的集团移向各地而相互孤立地发展时，在各个语言里发生相似的变化，但也一定发生相异的变化，这样，就形成了属于同一语族而各自有异的语言。也的确有这

样的语言，日本的现代标准语和美国夏威夷州的日裔美人间说的日语相差无几，便是个很切近的例子。但它们的差别，与其说是基于不同的发展，不如说是东京方言：广岛方言那样基于方言的不同（夏威夷日裔美人的祖先很多来自日本广岛县）。在朝鲜，朝鲜人间曾经说过的日语，在印度，至今还在说着的印度英语等例子，是殖民者以军事、政治、文化的权力来强制实现的东西。如果不是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强权推行，恐怕会成为更缓慢的同化语，正如朝鲜人发展朝鲜汉语、日本人获得日本汉语那样。服部四郎博士指出过，印欧语已经搞清了它们的谱系，“因为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都是从同一拉丁语分化变异而形成的，所以是有亲属关系的同系语”；但是他警告说，“这并不意味着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的祖先，从太古就说的是拉丁语。因此，现代法语或西班牙语所有的词，并非都来自拉丁语，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继承了他们祖先说过的非拉丁语”（《世界语言概说》下卷，东京，研究社，1955年5月，第52页）。印欧语（就是我们所说的牧畜民型语言）的发展就是这样。它若是更缓慢地“同化”作为主体的农耕民型语言的话，即使共存于同一大陆，恐怕至多也只能发展成为象汉语和闽语或粤语那样的关系和现状吧。

如通常所了解的，在比较语言学里，鉴别所谓“同源词”和借词来作为进行研究的第一步。例如，日语的下列数词：

juu＋ichi（一）——11

juu＋ni（二）——12

juu＋san（三）——13

虽说已经日语化了，虽说鉴于今日日语里没有数到10以上的

原本数词，它们只是从汉语来的借用词，跟汉语里的数词（为中古汉语构拟音）比较：

*ʒĭɛb̥-ʔĭed̥，*ʒĭɛb̥-ɲĭɛĭ，*ʒĭɛb̥-sam

（十）（一）（十）（二）（十）（三）

虽然日语数词跟它们的形式非常相似，但我们不能据此而说日语和汉语有谱系关系。这是比较语言学的常识。

但是我们的看法已经跟比较语言学有所不同了。我们认为日语里的汉语借词虽说很多，但基础部分还是本来的同源词。所以日语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而闽语和北方汉语呢？共同来源的词太多，所以闽语被认为是汉语的一个方言，但其基础部分，我们发现有一些找不到同源的词。这么看来，不管说同系语言或异系语言，问题在于研究对象的语言里的同系词与借用词的比率。假如闽语还保存着本地词，跟北方汉语同源的仅仅一半，我们能不能再说闽语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假如东亚的某个语言，越来越增加它的汉语借词，连语法也99%变成汉语式，我们还有必要把它们看作异系语言吗？

不仅在词汇方面，而且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的结构整体，我们都不具备表示这种“同化”程度或借用现象的百分比。如果假定日语中借用汉语的部分为30%，在闽粤语中借用汉语90%，当我们说汉语和日语没有亲属关系时，是把日语其余的70%来与汉语比较；而说闽粤语是汉语的方言时，则无视闽粤语余下的10%，只把借用部分（同化部分）的90%来与北方汉语作了比较。

那么，所谓同系语言到底是什么呢？“同系”这个词往往给人以从同一祖先分得血液的印象，但事实上是指上述借用或同化的部分。例如前面述及的临高话，被汉语同化的部

分假定是70%，萨维那神父收集、安德列．G．奥德里古教授整理的临高话词汇集（*Le Vocabulaire Bê de F.M. Savina*.Pa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 Extreme-Orient,Volume LⅦ.Paris: Adrien-Maisonneve,1965）所包含的单音节词，就超过2000个（复合词也算进去的话，不知要到几千呢）。其中不是汉 语借词的只不过240个。我们今天谈及临高话，就是指这个30%而言的！闽语里这种从北方借用的部分无论如何要达到90%以上，所以说闽粤语是汉语的方言时，就着眼于这90%。于是忽视了上面举的特殊词汇，或第一章讨论的特殊词序结构（不象汉语的部分）。对此，当然有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种种理由。我们并没有不同意把闽粤语看做汉语的方言，只不过想指出，从语言学角度讲，这里面存在着一些矛盾，就是说比较语言学的看法在这里有了这样的矛盾。

其实，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大关系。即使同一血统的人，他们所说的语言，每隔一代都得从头学起。所以不管黑眼睛娃娃学话，也不管蓝眼睛娃娃学话，学汉语就是汉语，学英语就是英语。成问题的是"音韵法则"这个引起误解的术语（这和自然科学的"法则"，性质很不一样）。从两个语言间发现音韵对应，来建立"音韵法则"，再用这个"音韵法则"来证明谱系关系。——这样，比较语言学的看法就成了问题。

现将伦敦知识阶层说的英语，和在印度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说的英语，作如下对应：

单词	伦敦英语	印度英语
箱子	[bin]	[bin]
扣针	[p‘in]	[pin]
喧闹	[din]	[din]
锡	[t‘in]	[tin]

如果我们不知道印度英语发音是固有的印度语音系统，根据上面对应构拟出来的“祖语”将是什么样，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印度人接受英语时，有过很特殊的情况。印度语有四套塞音和塞擦音，如[b]（不送气浊音）：[b‘]（送气浊音）：[p]（不送气清音）：[p‘]（送气清音）。印度人学英语，以其不送气浊音（如[b]）接纳英语不送气浊音（如[b]），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其不送气清音（如[p]）接纳英语送气清音（如[p‘]）。假如后世有人不知道其中的经纬，用伦敦英语和印度英语（请注意，印度英语已成为地道的英语方言之一！）来构拟英语祖语的话，我们怎样严肃地对待这个构拟的试图呢？

印度英语的情况还算好，还不太严重。临高话里的汉语借词，虽然对应的声音有所不同，但很容易找得出这些借词与汉语之间的有规律的音韵对应关系。但是，进入朝鲜的汉语，往往就显著地看出音节的声母辅音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对应关系非常之乱。例如：

单词	汉语	朝鲜汉语
边	[b̥ien]	[b̥iən]
编	[b̥ien]	[p‘iən]
鞭	[b̥ien]	[p‘iən]
篇	[p‘ien]	[p‘iən]

同一个不送气清音[p]，在朝鲜汉语里分为不送气和送气的清音[p]和[p‘]，而不送气和送气的清音在朝鲜汉语里合并为

不送气清音。在外观上与此实在相似的现象，从汉语和闽语、客家话等之间也能大规模看到。例如：

单词	汉语北方话	福州话	客家话
边	[b̥ien]	[pieŋ]	[pien]
编	[b̥ien]	[p'ieŋ]	[p'ien]
遍	[b̥ien]	[p'ieŋ]	[p'ien]
片	[p'ien]	[p'ieŋ]	[p'ien]

北方话不送气和送气的清音合并为福州话、客家话送气音。为了解决汉语和闽语的分歧，世界各国的语言学家试拟了不同样式的“祖语”，以期给予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例外”的对应，为闽语、粤语所共有，所以余霭芹博士假设这都是古代“百越”语言被“汉化”的结果（“Substratum in Southern Chinese—the Tai connection”，*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6,1976,pp.1—9）。我们还没有看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考证。大家知道，印欧祖语的送气浊辅音问题，也是用类似方法解决的。

以上只是关于音韵问题的讨论。一到词的形态，进而到句法问题，即使是印欧比较语言学，也是直到最近才有了些进展。要是构拟其祖形，那么一定要把古代文献中已知的“纵”的变化，与地理类型上被确认的“横”的推移相对照，然后去追寻语言发展的踪迹。

在现代美国，“寻根认祖”（ancestor hunting）非常流行。正好跟日语“探源”的风气相似。象美国那样移民集中的国家，伪造护照或收买身份证而入境这类事是司空见惯的。在那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同裔”人员，拍肩招呼

确认远亲的情景，大概是很常见的。然而，语言学家不能因此而笑它。不管脸的各部分有何不同，也不调查一下在哪里出生，从何地迁来，只因为整体的类似就认为是亲属的话，总可能发生悲剧：认为是亲子（同系语），实际上却是养子（借词）；认为有远缘关系（同一系组不同族的语言），实际却是冒姓祖先的后裔（借词太多的语言）。但是，这也不一定真会造成什么"悲剧"之类的骚动。还有什么比"寻根认祖"更为无聊的！就说是远亲（有谱系关系），而出生的家庭、教育、兴趣、社交各方面完全不同的话（如果已经接受了类型学上的各种变化），纵然天涯相逢，怕也话不投机了。

对于现代的语言学家，最有兴趣的是探讨语言结构发展的原理。因为一个语言里的各种共时（synchronic）的非规律性，都源于这些发展的结果；而语言历史上的演变，大部分都不是由该语言内在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比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周围语言的互相影响，和作为其结果的整个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发展。这便是提倡地理类型学的原因。

主题索引

A

阿尔明尼亚的数词…………（26）
阿尔泰句式的逆行结构…（40）
阿尔泰诸语………………（63）
Aktionsart ………………（51）
安东方言…………（165,183）
安东重音…………………（145）
安邑方言…………………（50）
areal features…………（30）
areal linguistics………（29）
Aux（助词）…………（51,55）
Aux+V 语言………………（55）

B

八重山方言………………（32）
巴纳语……………………（73）
白话文学…………………（97）
百家姓……………………（66）
百越………………………（203）
班图语……………………（30）
北方SOV型………………（54）
北方化……………………（70）
北方型…………………（65,92）
北方语………（22,45,52,110）
北青方言…………………（122）
贝语……（30,41,77,189,200）
被"个"的统一……………（97）
边缘语言…………………（17）
编目………………………（142）
变移性……………………（18）
变音………………………（191）
标准日语…………………（32）
剥隘语……………（111,192）
波形扩散说………………（29）
博白方言…………………（193）
博多方言…………………（81）
布罗语……………………（73）
布依语……………………（77）

C

长崎方言…………………（80）
长沙方言…………………（109）

朝鲜语……………（31,87,108,117,190,202）
朝鲜语的数词……………（16）
朝鲜语庆东型……………（158）
超音节音位……………（134）
超语段音位……………（115）
重复用名词……………（99）
词汇……………（63）
词汇特征……………（19）
词界……………（175）
词音调标记……………（145）
词组……………（134）
次音位（Secondary phonemes）……（117,167）

D

大邱方言………（124,132,140）
大邱重音……………（146）
搭嘴音……………（30）
单音节性……………（91,113）
倒数第二音节……………（162）
倒数第二音节重读……（162）
等语线（isogloss）……（72）
“的”字结构……………（40）
低地德语……………（34）
第零音节……………（127）
电台东京……………（188）
调形……………（177）
定居农民型……………（25）
dog 和 hound……………（84）
东方生产方式……………（25）
东方式停滞……………（25）
东干语…（50,81,92,110,177）
东干语的数词……………（178）
东京方言………（168,180,199）
动物……………（63）
侗·台语族……………（58）
侗语声调……………（110）
都安话……………（195）
短音节（mora）……（129）
短音节计算（mora-counting）……（130）
短语音调……………（136）
短语结构的层次……………（139）
短语音调的结构原理…（136）
短语音调结构原理的矛盾（142）
断奏音调（staccato）（111）

E

二次性派生……………（87）
二项对立……………（31）
俄语的“目”……………（19）

F

发音游移

(fluctuation)…………(149)

反复疑问句…………(53)

反响型…………(102)

方言地理学家…………(35)

非基本词汇…………(17)

非拉丁语…………(199)

非直接否定…………(83)

分离性使役结构…………(50)

汾阳方言…………(50)

佛足石之歌…………(87)

否定词…………(76,82)

附属词…………(142)

复音节化…………(114)

复音节性…………(91,114)

福州话…………(203)

G

高地德语…………(34)

高棉语…………(77,91)

根本要素…………(145)

构拟…………(13)

孤立型…………(34)

古汉语的使役态…………(48)

古孟语…………(73)

古希腊语…………(131)

古英语…………(20)

古藏语…………(73)

古藏语的数词…………(27)

关于英语重音和连音…………(173)

广岛方言…………(199)

广州话…………(42,169,177,191)

国际汉藏语言学会…………(8,30)

过去时…………(52)

H

汉格尔…………(117)

汉民族…………(14)

汉音…………(183)

汉英韵府…………(113)

汉语…………(198,202)

汉语的江河…………(72)

汉语的五大方言…………(22)

汉藏语…………(28)

呵莱语…………(73)

黑傣语…………(78)

横的变化…………(46)

横的推移…………(97,103)

横县方言…………(193)

后置词(PO)语言…………(55)

湖北方言…………(196)

互补分布……………………（ 191 ）
化石化的复合词…………（ 70 ）
化石化的复合名词………（ 59 ）
黄巾起义……………………（ 185 ）

J

甲骨文………………………（ 98 ）
伽倻………………………（15,146）
紧音…………………………（ 31 ）

K

卡涂语………………………（ 73 ）
开封方言……………………（ 50 ）
客家话……（22,28,43,44,52,63,109,196）
库尔斯克·奥勒尔方言……………………（ 13 ）
扩散(diffusion)………（ 29 ）

L

拉丁语………………………（ 26 ）
拉祜语………………………（ 77 ）
类别词……………………（ 85,89 ）
类别词和散量词…………（ 87 ）
类别词和名词……………（ 99 ）
类型推移连续……………（ 63 ）
李朝王名……………………（ 182 ）
历史语言学家………………（ 35 ）
傈僳语………………………（ 77 ）
立陶宛语……………………（ 13 ）
连续体（continuum）（34,92）
连用使动结构………………（ 49 ）
连奏音调(legato)………（ 110 ）
临高话（贝语）……（30,41,77,189,200）
灵山方言……………………（ 147 ）
琉球方言……………………（ 31 ）
龙茗方言……………………（ 111 ）
鹿儿岛方言…………………（ 168 ）
伦敦方言……………………（ 20 ）
伦敦英语……………………（ 202 ）
罗马尼亚语…………………（ 21 ）
罗曼诸语言…………………（ 28 ）
洛杉矶日语…………………（ 32 ）

M

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15 ）
满语………………………（54,92,106）
满语文言……………（40,77,105）
曼谷方言……………………（ 192 ）
marsh 和 swamp…………（ 84 ）
美国英语……………………（ 32 ）

孟高棉语族……………………（ 73 ）
孟加拉亚洲协会………………（ 11 ）
蒙古语……………………（73,77,91）
苗瑶语族……………………（ 58 ）
闽语…………………………(22,52,61,
109,198,200）
闽语祖………………………（ 76 ）
名词否定词…………………（ 83 ）
牧畜民型…………（17,25,28,184）
牧畜民型发展………………（ 22 ）
牧畜民型语言……………（12,199）

N

纳西语………………………（ 102 ）
纳西语的数词………………（ 21 ）
纳西族………………………（ 21 ）
南昌方言……………………（ 109 ）
南方的SOV型……………（ 54 ）
南方型………………………（ 44 ）
南方语………………………（ 65 ）
南亚句式的顺行结构……（ 41 ）
南亚诸语……………………（ 59 ）
南亚诸语的数词……………（ 16 ）
内地方言……………………（ 32 ）
内在意向……………………（ 57 ）
逆行结构（regressive
structure）…………（35,41,
46,49,55）
粘着型………………………（ 34 ）
农耕民型…（14,17,25,28,184）
农耕民型发展………………（ 22 ）
农耕民型语言…………（14,199）
诺曼人………………………（ 21 ）
挪威人………………………（ 20 ）

P

旁点…………………………（ 117 ）
平板重音……………………（ 135 ）
平声…………………………（ 190 ）
平阳方言……………………（ 44 ）
普遍化………………………（ 56 ）
普通话………………………（ 42 ）
普通名词……………………（ 69 ）
谱系关系……………………（ 198 ）
谱系树说……………………（ 29 ）

Q

漆谷方言………（132,146,148）
潜在标记……………………（ 139 ）
前置词的出现………………（ 48 ）
前置词（PR）语言…（ 55 ）
切韵…………………………（ 114 ）
庆东型………………………（ 168 ）
庆南型………………………（ 169 ）
庆山方言……………………（ 120 ）

庆尚道方言……………………（ 168 ）
庆西型…………………………（ 168 ）
轻读……………………………（ 171 ）
亲属关系………………………（ 198 ）
去声……………………………（ 190 ）
区域特征……………………（30,77,78）
区域语言学……………………（ 29 ）
区域语言学家…………………（ 35 ）
全罗方言重音…………………（ 145 ）

R

人体部位名称…………………（ 18 ）
日语……（52,106,180,187,199）
日语的类别词…………………（ 85 ）
日语的数词……………………（ 15 ）
日语的音位配列………………（ 107 ）
日语式的重音系统……………（ 32 ）
入声……………………（170,190,195）

S

撒尼·彝语……………………（ 77 ）
塞当语…………………………（ 73 ）
三项对立………………………（ 31 ）
山西方言………………………（ 196 ）
掸语……………………………（ 78 ）
上古汉语………………………（ 20 ）
上入声…………………………（ 191 ）
上声……………………………（ 190 ）
上升复合元音…………………（ 131 ）
上下型的甲乙位置……………（ 157 ）
尚书……………………………（ 67 ）
绍兴方言……………………（ 49,191 ）
社会经济的发展
模式……………………（ 25 ）
声调……………………………（ 117 ）
声调标记………………………（ 127 ）
声调标记的不实现……………（ 137 ）
声调的调类……………………（ 28 ）
声调的实体……………………（ 171 ）
声调的音高曲线………………（ 28 ）
声调语言……………（ 116,170,171 ）
声明……………………………（ 181 ）
圣谕广训………………………（ 113 ）
诗经……………………………（ 67 ）
时………………………………（ 50 ）
世代交替………………………（ 20 ）
“手帕”和“毛巾”（ 98 ）
受定特征………………………（ 130 ）
舒声……………………………（ 170 ）
数量词………………………（ 85,93 ）
双峰方言………………………（ 109 ）
瞬间记忆………………………（ 35 ）
顺行结构（pregres-

sive structure)…… (35,41,46,49,55)
朔县方言………………… (50)
斯堪的纳维亚化……… (21)
松音…………………… (31)
俗拉丁语………………… (14)
苏联的语言学家……… (18)
缩影…………………… (168)

T

台山方言………………… (60)
台语………………… (10,30,105,169,192,197)
傣仂语………………… (30)
泰米尔语………………… (87)
泰语………… (54,73,77,81)
泰语的数词……………… (16)
特殊功能(idiosyncrasy)………………… (150)
藤县方言………………… (60)
体…………………… (50)
天然语言变化的内在原因………………… (138)
天然语言的变化……… (138)
toneme(调素)……… (132)
同素消除(identity erasure)………… (47)
同化………………… (15,200)
同位名词结构……………… (68)
同系语………………… (199)
同源词………………… (199)
通商民型………………… (17)
通信理论………………… (35)
统计价值………………… (56)
突厥语族………………… (116)

V

V+Aux语言……………… (55)

W

完成体………………… (52)
万(数词)……………… (21)
尾巴…………………… (96)
五胡十六国……………… (185)
五台方言………………… (50)
武鸣方言………………… (194)
吴语……………… (22,31,49,109)

X

锡伯语………………… (77,106)
吸气音………………… (30)
西撒克逊语……………… (20)
西北方言………………… (82)
下位规则………………… (161)

下降复合元音……………（131）
下降重音素……………（134）
厦门方言……………（43）
咸镜道方言………（32,122,146）
现代北方语……………（45）
限定词……………（58,101）
湘方言……………（31）
香港方言……………（59）
新罗……………（146）
性别……………（63）
行为主义语言分析………（144）
寻根问祖（ancestor hunting……………（203）
循环性（cyclicai）………（179）

Y

亚历山大罗夫卡方言……………（112,178）
演变（evolution）………（29）
阳调……………（190）
阳平声……………（191）
阳去声……………（191）
阳入声……………（191）
阳上声……………（191）
意大利语的giorno………（14）
伊尔德克方言……………（50,112）
伊尔·特·法兰西方言 （13）
移位（placement）……（48）
阴调……………（191）
阴去声……………（191）
阴入声……………（191）
阴上声……………（191）
音调标记……………（127）
音位配列（音用法）……（28）
音的对应……………（27,33）
音韵法则……………（201）
音调音位（调素）………（131）
音调预测（dredict） （125）
音调语言……………（168）
音高重音……………（116）
音节单位……………（113）
音节结构……………（104）
音节计算（syllable-counting）………（130）
印度英语……………（202）
印欧语比较语言学………（13）
印欧语……………（11,25）
印欧语的数词……………（26）
印欧诸语……………（56）
英国英语……………（32）
英语……………（56）
影响……………（61,130）
应用顺序……………（161）
与那国方言……………（31）
语法·词汇学范畴………（95）

语言的发展……………………（184）
语言的交流……………………（59）
语言发展的模式………………（29）
语言发展的“为什么”……（32）
语言发展类型…………………（24）
语言史…………………………（20）
原始系统………………………（146）
原形……………………………（187）
乐调重音………………………（115）
越南语…………………………（169）
越南语的数词…………………（16）
越南语河内方言………………（169）
粤语……（22,42,52,59,109,111）
韵律音素（韵律音位）……（132）
韵素（韵律音位）…………（132）

Z

仄声……………………………（196）
直接否定法……………………（83）
中古汉语…………（20,27,189）
中古汉语的数词………………（27）
中国的古语……………………（45）
中期朝鲜语……………………（32）
中期朝鲜语的旁点……………（117）
中期朝鲜语的旁点标记　（158）
中期朝鲜语的旁点表现　（162）
中入声…………………………（191）
中世纪英语……………………（20）
中心词…………………………（142）
中原地带………………………（185）
中重型…………………………（174）
重读……………………………（171）
重读重音………………………（169）
重轻型…………………………（174）
重音……………………………（104）
重音的流动性…………………（177）
重音核……………………（133,145）
重音素（韵律）………………（136）
重音素(重音语位)…(132,145)
重音素的替换…………………（130）
重音型变更……………………（141）
重音语言…………………(115,171)
助撒词…………………………（88）
主音位…………………………（117）
专有名词………………………（69）
壮语……………………（59,60,77,91,
111,192,194）
壮语天保方言…………………（192）
赘言性(redundancy)
（90,114,120）
自动监控器……………………（35）
自由变体……………（127,138,142）
纵的发展………………………（46,97）
纵的变化………………………（97）
最小音差………………………（179）
祖形……………………………（187）
祖语……………………………（187）

人名索引

A

阿连德(Arendt,Carl)（172）
爱梅诺（Emeneau,
Murray B.）……（14,29）
奥德里克（Haudricourt,
Audrc G.）……（81,201）

B

白保罗（Benedict,
Poul K.）……（8,76,186）
白乐天……………………（48）
包培（Poppe,Nicholas
N.）……………………（116）
Bever, T.G.……………（71）
比奇(Beach, Douglas)（115）
博厄斯（Boas,
Franz）……………（29）
波里万诺夫（Поливанов
Евгений Д.）…(20,80,172）
布雷德利（Bradley,
Cornelius B.）……（170）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Leonard）…（117,167）

C

岑麒祥……………（59,189）
陈梦家……………（68）
崔铉培(Choe, Hyeonbe)
……………（118,129,152）

D

大江孝男（Oe Takao）
……………（147）
狄福乐（Diffloth,
Gerard………………（17）
Dragunow, Aleksander
und Katharna（龙果夫
夫妇……………（81,177）
杜甫…………………（47）

Rokuro)…… (7,75,118,167)
黄伯荣……………………………… (100)

F

Forrest, R.A.D.………… (96)
服部四郎 (Hatori Shiro)……… (105,133,158,170,187,190,199)

J

金次均 (Gim, Chagyun)………… (145)

G

高本汉 (Karlgren, K.)………………… (27,189)
格林 (Greenburg, Joseph H.)…… (51,55,69,86)
Gorman, C.……………… (186)
Graham, A.C.…………… (83)
管燮初……………………………… (68)
Gurevich (Гуревич, Изабелл С.)………… (100)

K

卡利莫夫 (Калимов, Абдурахман А.…… (94)
卡谢维奇 (Касевич, Вадим Б.)………… (18)

H

哈雷 (Halle, Morris) (172)
韩应灵 (Hansson, Inga-Lill)……………… (190)
哈斯 (Haas, Mary)…… (192)
哈特曼 (Hartmann John F.)……………… (78)
河野六郎 (Kono

L

赖惟勤 (Rai Tsutomu)…………… (76)
拉姆塞 (Ramsey, S. Robert)……… (32,122,146)
Langendoen, D.T.…… (71)
李崇宁 (Lee Sung Nyong)…………… (145)
李方桂 (Li Fangkuei)……… (41,192)
李福淑夫人 (I, Geunsag)………… (183)
李讷 (Li, Charles N.) (50)

刘克甫（Крюков,
Михайл В.）…………（20）
刘世儒……………………（100）
龙果夫（Драгу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
…………………（88,96,177）
陆柯夫（Lukoff,
Fred）……………（172）
罗杰瑞（Norman,
Jerry）……（17,73,75）

M

马丁（Martin, Samuel
E.）………………（32）
马蒂索夫（Matisoff,
James A.）…（18,31,102）
马尔克尔（Malkiel,
Yakov）…………（14）
McCawley,James D.（137）
梅田博之（Umeda
Hiroyuki
………（132,134,147,159）
梅耶（Meillet,
Antoine）…（12,13,26）
梅祖麟(Mei,Tsu-lin)(73,75)

O

O'Connor,Kevin A.（28）

P

皮特曼（Pitman,
Richard)…………（181）
蒲立本（Pulleyblank,
Edwin G.）……（76）

Q

桥本进吉（Hashimoto
Shinkichi)…………（80）
乔姆斯基（Chomsky,
A.Noam …………（172）
琼斯（Jones,
William）………（11）
全在昊（Jeon,
Jaeho）……………（132）

S

萨皮尔（Sapir,
Edward)…………（29）
萨维耶（Savina,
Fran, Cois）……（201）
山本谦吾（Yamamoto

Kengo）…………………（105）
桑姆索（Samson,
George）………………（90）
申昌淳（Sin,
Changsun）…………（152）
施莱赫尔（Schleicher,
August）……………（29）
施密特·维尔海姆
（Schmidt,
Wilhelm）……………（45）
施密特·约翰内斯
（Schmide,
Johannes）…………（29）
斯大林（Сталин
Иосиф В.）……………（190）
斯瓦德什（Swadesh,
Morris）………（23,187,197）
索弗罗诺夫（Софронов
Михаил В.）………（20）

T

太田辰夫（Ōta
Tatsuo）…………（47,49）
唐纳（Downer,
Gordon.B.）…………（101）
汤普森（Thomoson,
Sandra A.）………（50）
藤堂明保（Todo
Akiyasa）………（67,70）

W

王国维……………………………（100）
王力…（42,47,49,85,99,193）
王士元（Wang, Wiliam
S.-Y.）……………（53）
威廉斯（Williams,
Samuel W.）………（113）
文孝根（Mun,
Hyogeun）………（118,145）
吴南氏（Woo, Nancy）（170）
吴钟甲（O, Jonggab）（153）

X

小仓进平（Ogura Shin-
pe）……………………（124）
徐世荣………………………（173）
徐松石……………………（67,70）
徐在克（Seo, Jaegeag）
…………………………（135,181）
许维（Heo, Ung）
…………（118,145,147,153）

Y

雅洪托夫（Яхонтов Сергей Е.）…………（18）

雅克布逊（Jakobson, Roman O.）…………（80）

叶斯泊森（Jespersen, Otto）…………（20）

Imazov Имазов М.Х.……（179）

Ivanov（Иванов А.И.）…………（172）

余霭芹（Yue, Oikan）…………（203）

俞敏…………（96）

袁家骅…………（50）

Z

詹伯慧…………（50）

张伯伦（Chamberlain, Basil H.）…………（87）

张琨（Chang, Kun）（20, 100）

张日升…………（61）

张泰镇（Jang, Taejin）…………（145）

赵元任（Chao, Yuen Ren）…………（34, 41, 113）

郑然粲（Jeong Yeonchan）…………（118, 145）

译 后 记

《语言地理类型学》是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教授以日本学者为主要对象写的一本专著，内容是介绍作者就这一论题长期研究的成果。

我有幸在1979年底见到这本书，立刻被书中崭新的观点与方法所吸引。该书把语言在地理上表现出的类型推移，看作是语言历史演变各层次的投影，从而把“横”的区域考察与“纵”的历史性比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其中对汉语的论述尤为精详。在许宝华先生、胡竹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着手翻译。1980年3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打印成册，供内部阅读。

1981年秋到1983年春，桥本教授两次访华期间，热情地对我进行学业辅导，帮助我熟悉和了解语言地理类型学，并且反复、订正修改译稿，不少章节还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本书与其说是汉译本，不如说是桥本教授的汉文改写本。我们从书中可以感到作者本人的原意和风格。

我为能翻译这本阐述当代语言学新思想的著作感到高兴，并为翻译过程中得到桥本教授的指导感到幸运。深知自己水平有限，译文种种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我还要说的是，《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4期关于本书的评介和《方言》1979年第3期所刊桥本教授《现代吴语的类型学》一文，对读者理解本书内容不无帮助。至于堪称为本书续篇的《现代博言学》（东京，大修馆书店）更是不可不读的。我愿意引述该书的一段话，以期有助于理解语言地理

类型学的内容，尤期是研究方法：

> 不管语言学还是其他科学，往往只是图解式地表现事物在扩散时的表面形态，对其机制则不甚了了。……要阐明其发展机制，就不能简单地回答"什么"，而必须回答"为什么"。拿语言学来说，就是把存在于人类复杂的语言现象中的规律，用博言学的方法提取出来，——予以系统化。索绪尔曾提出历时和共时的区别。今天的语言，实际上都是历史变化的反映，因而不管现代的共时描写还是历时的研究，阐明语言怎样变化，这才是需要做的最基本的工作。

最后有一点要交代的是，原书中少数带双重附加符号的字母，考虑到排版的方便，省去了较次要的一种符号。这要请作者和读者谅解的。

余 志 鸿

1983年5月